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不悔的合作

—毛泽东与彭德怀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自序

我们熟悉毛泽东，也熟悉彭德怀：一位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位是统率三军的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防部长。他们是新中国的缔造者。

我们也熟悉 1959 年的庐山会议，熟悉当两人的亲密关系即将结束时他们对两人的关系所作的截然不同的评价——毛泽东说：“三十年来，彭德怀和我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说，“我彭德怀跟了你一辈子喽，垮台，自己找的！”

由此我们明白：我们还不熟悉毛泽东与彭德怀的个人性格，不熟悉他们各自经历的成长道路，不熟悉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

彭德怀，一位受蒋介石悬赏十万银洋、在《西行漫记》中被埃德加·斯诺描绘成他所见到的中国最豪爽的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或许还包括美国人、日本人，都不是陌生者。自 1978 年后，每年都要发表纪念彭德怀的文章，提醒着没有忘记他的人们去怀念和思索。但是我们太年轻，头脑中几乎没有他的任何具体形象，可他富有异彩的经历却越来越引起我们的兴趣和冲动：一位革命者，从农村中赤脚走来，战功赫赫而列中国十大元帅的第二位，人民共和国军队的缔造者之一；一位受屈者，因在庐山顶撞权威，为民鼓呼，倍受屈辱。三十年后回首，“他的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证”——庐山会议发言纪录和致毛泽东的信不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狂热的结果。那么，星星为什么会消失在晴朗的夜空里呢？我们想知道，更多的人想知道。

我们想更客观、更冷静地回视和认识历史，尤其是近期历史，历史对人类很重要，却又常常被忽视。一位参加过红卫兵运动的人对我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被世界和历史共同唤醒的中国人身上。是的，在横向坐标上，我们已被世界唤醒，而在纵向坐标上，我们尚没有从历史中充分地吸取经验和教训。横向与纵向的错位导致期望与现实的互相吸取经验和教训。横向与纵向的错位导致期望与现实的互背，日本的《选择》杂志证明：中国的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无法评价毛泽东而且也不知道新中国的开创者是谁。而我们自己的新闻媒体调查也证实我国青少年中很多人不知卢沟桥事变是怎么回事！自问，认识历史否？如何抓住看不到的历史精灵而且为之所唤醒？！

于是，我们感慨史学危机。兢兢治史者艰难而又应者寡，他山取经者多产且和者众。不能指责年轻人不懂历史，不能埋怨历史没有盈盈的媚波和漂亮的脸蛋吸引人们的眼光，必须承认，史学本身及其传播体系和媒介也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刚刚涉入史学的我们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只能是壮大着胆子寻找新生的条件。既然充满竞争又屡屡创新向前的奥林匹克精神中最重要的是不是金牌而是参与，那么我们所看重的无疑也是：身体力行。这本书是我们进行的初次尝试。

当然，我们更重要的目的是重新观看抹不掉的悲剧。确实，人们在思考，在革命危急关头参加共产党，与毛泽东长期合作，战功卓硕的共和国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为什么只因在会上的发言就被夺去职务至含冤而死。把这看作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有意之作显然站不住脚。但我们可以断言这是毛泽东错误判断、错误认识和错误对待同志的必然发展结果。我们不得不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去寻找原因。

坦白他说，我们的兴趣和冲动不等于我们的能力。准确地评价彭德怀、毛泽东和客观地阐述他们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困难的。迄今为止，全面记录或评述毛泽东和彭德怀一生的传记性作品还比较少。但是，我们相信，任何人和事情都处在不断的再评价之中，并且越来越接近真实。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人们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在更阔更远的角度回首历史。但求事与愿不相违。

作 者

1990年初稿于人民大学

1993年春修改于知春里

1996年夏定稿于紫竹院

## 序 言

廖盖隆

众所周知,中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便成为饱受西方资本主义欺凌的国家,众多的仁人志士为此扼腕捶叹,进而奋起救国。为了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中国人民不屈地奋斗了 100 多年,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终于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艰苦的革命和建设历程,锻炼出一批领袖人物,毛泽东和彭德怀是其突出代表。

毛泽东自幼立下宏伟救国之愿,并选择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有理论而不唯理论,以极大的革命勇气和创新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去。尽管他被人骂为“山大王”、“农民领袖”、“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历史证明毛泽东是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领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还会在黑暗中探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与毛泽东相比,彭德怀是从乡村走出,赤脚为穷人打天下的。在此过程中,他找到了共产党,接受了共产主义,并长期与毛泽东合作共事。他对党忠诚,善于作战,是党内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硝烟散尽,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是国内外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可以说,毛泽东和彭德怀这两位湖南老乡,在不同的时间里先后走上革命之路,并因此拥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目标,即争取中国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变中国为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共同的追求使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毛泽东曾两次赠诗给彭德怀,表现了对彭德怀的独特信任。而毛泽东也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高超的斗争艺术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彭德怀的敬佩和尊重。但是,他们也有许多不同,如投身革命时的不同背景,成长过程中的不同经历,不同的文化水平、认识水平,不同的脾气性格等。正是这些不同,影响他们对一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并因此产生分歧。他们的分歧,有的属于正常争论,有的则造成双方误会,还有的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不良影响。正确认识 and 评判他们之间的分歧,有利于我们准确理解领袖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历程。为此,本书作者从他们二人间的相同与不同处记述分析二人的关系,颇具新意。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一分为二的观点,既承认他们间的不同曾给二人的关系带来极大的影响,又承认他们的相同是根本上的一致,是革命者最崇高的标准。因而作者得出正确的结论——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合作是不悔的合作。

应该承认,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是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领导层中风波最多的关系之一。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资料所证明。但是,多年以来,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关系是相互尊重和支持的关系。在很多关键时候,彭德怀都给毛泽东以决定性的支持,如 1930 年至 1931 年的“富田事变”,1935 年初的遵义会议,以及同年早些时候与张国焘的斗争等。在 40 年代初期党与王明主义的斗争中,彭德怀也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可以说,他们两人的主要关系是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当然,从 1928 年到 1959 年,他们

之间也有一些紧张的关系。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把这种紧张关系扩大了，说他们的合作应该三七开，彭德怀和他是七分搞不来，只有三分是合作的。

在他们共处的初期，由于受当时所处环境、文化程度和个性等原因的影响，两个人经常发生意见分歧甚至激烈的争吵，是不可避免的，在为生存而战斗的方法上有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再说，从资历上看，尽管彭德怀不同于毛泽东，但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的高层领导中，每个人几乎都是平等的，他们二人彼此也以“老毛”、“老彭”相称。使情况变得复杂的是，党内的严格纪律使彭德怀不得不追随法定的领导人而反对毛泽东的观点——即使彭德怀有感觉毛泽东可能正确的时候，也因为党的纪律而放弃支持毛泽东，因为这时的毛泽东尚未成为全党的最高领导人。30年代李立三路线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彭德怀与毛泽东发生分歧，并直率地说出他的不同意见，在革命时期并不少见。但彭德怀身上存在的刚直粗鲁的性格也确实给他们二人的关系增添了一种刺激。尽管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大都是从有勇气和忠诚耿直等褒的角度说彭德怀是个直言不讳的人，但必须承认，正是这一点使彭德怀疏远了领导层中的许多人，而毛泽东也恰恰是个不低头、不认输、脾气倔强的人，这注定他们的关系中不时有种火药味，并由此导致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和争吵。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分歧和争执只是他们合作过程中的几朵浪花，更没有阻隔他们两人间的合作与友谊。彭德怀与毛泽东相交带有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而且互相之间以“老毛”、“老彭”相称。在毛泽东面前，彭德怀从不唯唯诺诺，一直保持活的个性。但不畏不等于不敬。彭德怀很崇敬毛泽东，他自己说过：我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三步曲，开始把毛泽东视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位大哥，以后认为他是自己的老师，到抗日战争中逐渐坚定地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可以看出来，彭德怀的话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彭德怀确实没想过与毛泽东抗衡，更没想过超于毛泽东之上。

这种对毛泽东敬而不畏的反差体现在彭德怀身上，是因为他不同于毛泽东而受下层文化的影响，毛泽东则更多地接受了精典文化。所谓下层文化，实质上是自然文化，它的特点就是世俗性与民众性。受这种文化熏陶的人往往忠诚于自己的选择，具有朴素的民主思想。具体到彭德怀，他自幼尝受被压迫者的苦难，以一种为百姓创世界的心理走上反抗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他信奉了马列主义并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领路人毛泽东。渐渐地，他把自己对毛泽东的忠诚等同于对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愿意为此付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但是，他还有民主思想，更何况他信仰共产主义，要解放全世界受苦的人们，要为中国工农大众谋福利。他历来主张实事求是，人人平等，反对搞特殊化。如果总结彭德怀的特点的话，力求使自己象个普通人一样生活也是其中一点。所以。他大骂在抗战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去看望他的妻子浦安修是搞特殊，扰乱军心；他能走上作战最前线，能吃野菜，能与士兵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能去田地收割庄稼、挖井、挑水，吃穿住行上尽量缩小与百姓的差别。当然，他也从不特殊看待任何人，包括毛泽东。这就是他在毛泽东面前毫不掩饰自我的心理基础。

但是，我们不认为彭德怀对民主的了解就完全正确，也不认为他对毛泽东的直言不讳都起好结果。但这足以证明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他们团结合作，打破蒋介石对红军的五次重兵“围剿”；他们共同走过二万五千

里漫漫长征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他们一起指挥打日军、抗美军，迎来了新中国的崛起；他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为中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

1996年9月  
于北京

谨以本书献给所有为中国人民付出牺牲和作出贡献的人们。

不悔的合作  
毛泽东与彭德怀



## 第一章

英国外交大臣在议院会议上声明：“对中国，只能先揍它一顿再说”。  
鸦片战争爆发，西方人强迫中国生下怪胎。  
毛泽东立志救国救民，为自己取名“子任”。  
彭德怀饱尝苦难，讨饭、砍柴、挖煤、当堤工……

1907年。秋天。

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深夜。

满天繁星眨着眼睛俯视大地，万籁俱静。

辛勤劳作一天的农民们，沿袭着几千年来生活习惯，日没而息。

有一个少年，他没有日落而眠，而在油灯下读书。书的名字叫《盛世危言》。为了不被人发现和打扰，他把门窗都遮得严严实实，防止灯光漏出，否则，他那一心想发财的父亲就会冲进来把书夺走，再扔给他几本经书。这位爱读书的少年就是毛泽东。

他虽然没能亲身经历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所描述的一切，但已致力于了解中国并且感受到国运的衰落。

其实，中国的衰落在十四、五世纪时就开始了，直到清朝老将陈化成战死在吴淞炮台，英国人的军舰突破高墙进入黄浦江时，中国人才感受到切肤之痛。

中国社会自此改变了方向。

许多人都熟知马克思哲学中的范畴论，对其“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话更能几乎背诵。但是众多的中国人走上反抗和革命之路却更主要的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贪婪而不是别的原因。为此，毛泽东曾在1949年专门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来反驳美国的白皮书，说美国国务卿艾其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因为他认为中国所以发生革命的原因是人口太多，粮食太少，而且中国人爱斗。

实际上，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不只是改变了中国，想想中国的铁路、银行、机器等源于何方便可以意识到这一点。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全世界带来意义深远的剧变，只是中国人体会到的痛苦更多更深——资本主义国家迫使中国生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怪胎。

压迫便孕育着反抗，因此西方入侵者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面对着一代又一代的反抗者。

英国的触角到处伸展，在它占领的殖民地上可以始终看到太阳，英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

首先是商品贸易——实际上主要是英国一国的对华贸易，在中国遇到了强烈的抵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是由于中国政府的禁止和老百姓的排外，因而英国人在对华贸易上处于入超地位而没有获取巨额利润的机会，为得到中国的茶叶、生丝和大豆等，他们不得不把大批的银元运往中国。

这种状况对追求利润的英国人来说是最糟糕不过的了，她们敦促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于是，英国派往中国的马夏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先后到了北京。

马夏尔尼在北京呆了两个多月，其目的是通过外交方式减轻广州以外各

地贸易的自由，但是在热河行宫万树园接见马氏的乾隆皇帝只把他当成来自远域异国诚心进贡的使者而拒绝了他的所有其他要求。

阿美士德使团再赴北京，他的结果比马戛尔尼更惨。嘉庆皇帝因阿美士德拒绝见他时行跪叩之礼而震惊，将他即日遣回。

英国依然无法达到目的。

令他们高兴的是他们终于有了机会，就在使团赴京前后，鸦片——一种麻醉毒品对改变英方在商品贸易中的不利地位越来越显效果。它不仅换走了中国的大量白银（鸦片战争前 22 年中国共出超白银 5539 万两），而且摧残着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吸食者越来越多，流入量越来越大。

清政府也看到了鸦片给中国带来的祸害。1729 年，雍正发布中国的第一道禁烟令。1821 年，道光皇帝再次严厉重申禁烟令，均因鸦片的巨额利润和多方得益而收效甚微，甚至越禁越多。当道光下决心起用主张严禁鸦片的林则徐赴广州禁烟后，英国以此为借口派出了远航舰队。

仅仅因为林则徐的禁烟，英国就派出军队到遥远的东方对比它的版图大 39 倍的中国开战。

确实，中国创造过文明，拥有过灿烂，但从理性说，它不是唯一的文明，也不是永久的灿烂。

五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给中国带来震动世界的礼物：四大发明，长城，大运河，众多的人口等。然而，在西方工业文明创造的超越个体和群体力量的机器、炮舰和新思想新文化出现在中国沿海的时候，古老的中国失去了抵抗力。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重要性已被历史学者们提到很高的程度，毫无疑问，它是中国社会的转折点。但在当时，中国的普通百姓并没有感到震动性影响，就连眼光先进的文人们也因沉浸在乾嘉以来的论古考据之中，“束发就学，皓首穷经”而视而不见变化，趋而避之国难。

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动荡却愈来愈明显，它终于警醒了一批主张今文经学的人，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姚莹、包世臣、黄爵滋、徐宝善等。他们被认为是地主阶级中主张变革的思想家，也是当时掌握真理的少数派。除林则徐为封疆大吏外，这些人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使他们大谈治国之道。他们承认清政府在君臣关系、上下关系、中外关系中存在的弊病，反对当权者沿用旧的治国之术，要求改变政策和学习外国。尤其是聪明敏锐的龚自珍，言语生动，笔锋犀利，他写的《己亥杂诗》仍为现在的人们熟悉：“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不愿再像热衷于考据的前辈们那样远避现实，厚古薄今，呼吁同行们勿再“避席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还在《古今铤沉论》中巧妙地抨击现实和王权，指责能干的皇帝建国后往往以一人之力而仇天下之士，一人为纲万夫为柔而不尊众人所愿。他警告人们世风动荡，已是秋风将至，日薄西山。总之，他们都力求证明眼前的清朝是“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要倒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

继承他们事业的人究竟是洋务派还是改良派？不论如何，启蒙者们的主张已经变成实际行动，并且扩展了内容的覆盖面：19 世纪 60 年代，西方的机器开始在中国运转。不久，首批赴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者回到中国，他们和国内受西方思潮影响的人一起要求在中国发展商业，改变皇帝专制和实现君主立宪等。

实际上，中国人挽救祖国的情是在英法联合对中国的第二次打击后积聚起来的。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使英国打开中国大门一条缝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才得以进入中国。不过，英国人确实为它的5000名士兵在中国轻而易举的胜利而欣喜若狂。璞鼎查——在汉华利号军舰上与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的英方代表回国后说：整个兰开夏工厂的所有产品都不及中国一省的日常需要。所以，雄心勃勃的商人们运来了大量的钢琴、刀叉、织绒帽等。结果他们大赔其本，中国人不需要这些，确切地说，他们没有这种购买能力。

马克思说：1842年的条约对促进英国的对华贸易丝毫没起作用。

英国要想走入中国，必须扫除三大障碍，清政府对英依然采取的对抗状态、中国百姓的反抗心理和行为、坚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1856年，中西方第二次交锋，法国帮助了英国，清朝再次吞尝失败之苦。

更重要的是，英国人在中国找到了谅解者和朋友，清朝重臣奕訢等为洋人对清朝采取的保留态度而要政府“外敦信睦”，对外妥协。作为回报，英法俄等国公使保证以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维护清朝的权威。1861年，那拉氏——这位在16岁时（1851年）选进宫的妃子以自己的聪明心计屡屡迁升为咸丰皇帝西宫娘娘的女性，发动宫廷政变，垂帘听政。她掌权不久，就借师助剿，华尔率洋枪队加入对太平天国军队的战斗。至1864年，与清政府抗衡14年的太平军终于城破国亡。

洪仁玕临刑前曾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

后来毛泽东也肯定中国的历次革命都为帝国主义所绞杀，而使中国的革命者为此而抱恨终生。他和洪仁玕都看到了同一事实：外国资本主义是中国最凶恶的敌人。

反洋教的案件到处发生。当清政府遵从主人旨意动用军队镇压时，却酿成一场规模宏大的反洋教运动——由八卦教、义和拳等发展而成的义和团运动，它最后的结果和太平天国一样，被中外反对势力联合绞杀了。八国联军的士兵们不仅大量杀死义和团团民和普通百姓，而且抢掠了他们所见到的能够拿得动的中国财富，甚至用刺刀刮下故宫作灭火用的水缸上的镀金层。

以上的内容只能作为毛泽东和彭德怀走向革命的背景知识。因为他们无法对这些事件亲身感受因而亦没受到强烈震动。八国联军绞杀义和团的时候，毛泽东正住在偏僻而安静的乡村，而且只有6岁。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使他无法知道外界的巨大变化，像那拉氏和光绪帝死亡的消息毛泽东两年后才得知。直到18岁时，他才第一次走进40英里外的省城长沙，但他通过书本了解到中国正处在危机中，在劳动和完成父亲规定的记账任务后，毛泽东贪婪地阅读他能找到的除经书之外的所有书籍，为了防备父亲，他到晚上就将窗户遮起，以免被发现受到惩罚。毛泽东的父亲认为只有读经书在中国才最实用，他要儿子熟读经书。

就这样，毛泽东读到了《盛世危言》，到1936年他还对斯诺说他很喜欢这本书，他还读了一本很多人不知道书名的小册子，它开头的话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一点刻在他的脑子里数十年不忘。此后，毛泽东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渴望继续读书，当他表兄告诉他湘乡有一所不重经学的新式学校后，他决定会湘乡上学。

湘乡东山小学的前身是东山书院，对毛泽东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他第一次读到自然科学和西方新学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孩子聚在一起读书；第一次接触留日学生并喜欢听他讲日本的情况。但是，他在这里被人看不起，被人讨厌，因为他不是本县人，而且穿得很穷酸，他自己说：在东乡，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压抑。这一点曾反映在他当时抄写的清古人所作的《咏蛙诗》里：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显而易见，他自幼就有的反抗意识里又溶进了一种极强烈的自尊。

尽管生活上不尽人意，毛泽东却在学习上出类拔萃。他逐渐赢得老师们的喜欢和同学们的敬佩，他因古文功底扎实，写的文章“似黄河之处，一泻千里，”被认为是东山小学的栋梁之才。他开始把康有为、梁启超当作自己的崇拜人物——他们是中国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变法图强，虽奔波多年，收效并不很大。后来他们长期被当作改良主义者受谴责，特别是他们后期的保皇主张，更加重了史学界对他们的恶感。但是，他们变法救亡的主张吸引了毛泽东，他极爱他们主办的《新民丛报》，读了又读，差不多能背诵下来。他曾在上面作批语说：“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订，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专制之国家，法令由君主所制订，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盗窃得国之列朝。”

但是，他和康、梁一样，并不反对三岁登基的溥仪皇帝——后来他的共和国把溥仪送到功德林监狱改造。此时他只是反对君主专制，赞成君主立宪制。武昌起义胜利后，毛泽东仍认为孙中山当大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应该由康有为和梁启超担任，并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投笔从戎，参加长沙起义新军，在25混成协50标1营左队当列兵，前后呆了半年，目标是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并剪掉辫子以示决心。

孙中山失败了，他被誉为“中国的华盛顿”，却没有华盛顿那样的成功。他有明确而远大的抱负、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和不尽的革命热情，而且从西方吸取了反对旧制度的文化，但他缺乏策略，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最后胜利。1912年，他决定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自己的对手袁世凯。他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经验：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农村的大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就在这前后，毛泽东从他的同学肖子暉那里读到了《世界英雄豪杰传》，华盛顿、拿破仑、林肯、彼德大帝等人的事迹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对肖子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不久，他为自己取名为“子任”，立志要救国救民。

年龄的增长使毛泽东实现自己报负的欲望愈来愈强烈，从军队回来后，他继续读书，但众多的招生广告使他难以选择：他本想考警政学校，却被一个不收学费、供给膳食且稍有津贴的肥皂制造学校所吸引，想成为一个肥皂专家。后来，他又渴望做一名清廉的法官或商业专家。毛泽东进入了一个商

业学校，但只有一个月就离开了，那么多的课程用英语讲授使他感到太吃力了，除了字母外，他对英语几乎一无所知。实际上，英语一直是毛泽东的弱项，直到50年代他还在努力学习，后来他终于能够在外交场合说些简单的句子和阅读译成英文的中央文件。

毛泽东最后进入了湖南省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一学期后，他退出了这所课程繁杂、校规苛严的学校。他认为自己读书、自己研究会比学习刻板的课程更有益些，这是他读完一位欣赏他的国文老师送给他的《御批通鉴辑览》后得出的结论。

他退学寄居在湘乡会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日到湖南图书馆，开始了他所说的“自我教育”生活。真是一片新天地！毛泽东像一头闯进人家菜园尝到美味的牛一样，拼命地吃。这种经历很像马克思，马克思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坐位下登出两个脚坑，而毛泽东则是湖南图书馆每天最早进去和最晚出来的人。中午仅仅休息片刻，两块米糕就是午餐。他好像离不开书籍，即使在后来的转战时期也是如此。不过他看的书大部分是史书。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他读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梭的《民约论》和斯宾塞的《逻辑》等，读到了有关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的书籍，还有诗歌、小说及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中国的许多共产党人都走了这条道路——他们通过《天演论》找到了马克思，先学习西方，再反抗西方。先驱者魏源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颇有道理。

对此我们这样解释：西方是侵略者和殖民者，但拥有先进的工业文明；中国的抵抗是正义的，可它又比资本主义落后数百年，这是一种双重逆向，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能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中国既要抵抗、争取和保持独立，又要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这本身就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但是，中国人必须在抵抗、改革、开放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步伐。

在湖南图书馆，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并决心为全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每天，他经过地图前都要仔细看看。1951年，他在北京对他的老同学们说过，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上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看见过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人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毛泽东终于找到了他在中国革命运动轨迹上的起点。

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挽救民族危亡的志士，现在又走来了一个毛泽东，

他要进行历史上最艰苦而又最辉煌、最需要耐心意志而又最激动人心的斗争，他将使中国发生震动世界的变化。

沉睡的雄狮就要醒来。

与毛泽东相比，彭德怀是一个更为贫困不幸的少年。他比毛泽东小五岁。他的家庭只能供他读两年私塾。当毛泽东 1913 年考入长沙师范时，彭德怀刚刚结束小煤窑上做童工的生活，因带领乡里饥民闹崇而被通缉。可以说，他比毛泽东品尝了更多的人生艰辛。

中国农民的生活惨况曾被广泛介绍，尤其是中国最先革命的地区则更穷苦，更悲惨，更绝望。（今天，他们仍然是经济上的落后地区，一般称为老区）。大部分山区使他们的收成很差，没有足够的粮食，即使是平原的北方亦是如此。许多人因借高利贷而几辈子或子子孙孙都还不清，永世为掌握土地的有钱人做牛马。他们的锅里几乎没有一滴油，常常是把买来的一点盐或是从盐碱地里刮来的白硝盐溶在一碗清水里用青菜蘸着下饭。他们衣不遮体，形容枯槁，住的是又黑又脏的小屋，泥墙上往往没有窗户，一扇小门还不一定有好的门板。他们目不识丁，极少人能供起子女读书。对他们来说，人生不过是终年劳累，贫困穷苦，缺乏安全和饱受欺凌。

彭德怀体验了这一切。他 1898 年 10 月 24 日生于湘潭县西南乌石寨的彭家围子，按族谱排坐，他属清字辈，父亲为他取名彭清宗，字怀归，号得华，乳名钟伢子。为了自勉，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十分适合他的号“石穿”。这是他 1916 年堤工闹事后逃跑去长沙投军的路上取的，当时他因躲雨进了个山洞，里面正好有中国谚语“水滴石穿”的事实。

彭的父亲彭民言（号祥顺）是一个极为忠厚老实的贫苦农民，他所创造的财富就是几间茅屋和山坡上开出的八、九、亩地，全家八口人——80 开外的伯祖父和年近 70 的祖母，父亲，母亲（她在彭德怀 8 岁的时候病死），大弟金华，二弟荣华（他们分别在 1940 年 9 月 4 日和 1940 年 9 月 11 日牺牲），三弟因母亲病逝无奶而饿死在襁褓之中。他们的生活全靠种麻作茶和当雇工维持。后来情况更加恶化，为治父亲严重的哮喘病和养家，家中的土地和一切用具、床板门户等一概卖光，几间破茅屋亦作抵押。全家人的衣服破烂不堪，冬天还是赤足草鞋，身披蓑衣。彭德怀说那时的生活就和原始人一样。

《彭德怀自述》第 1 页中记载：我满 10 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花子。

实际上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当叫花子。他受不了屈辱，不愿对富豪之家说贺喜话。后来他饿昏在地，祖母能给他做的只是煮点青菜汤。为了生存，他不得不砍柴、捉鱼、挑煤卖。十三、四岁时，他到离家不远的黄碛岭土煤窑去做童工。

黄碛岭煤矿在湘潭县，它曾被描写得非常凄惨：野草丛里掩着大大小小的黄土堆，如乱坟岗一般，土堆下是黑乎乎的地洞。许多赤身裸体、四肢着地的煤工从里面爬出爬进，因为洞口太小，许多人挤在洞口，赤条湿淋的身子在寒风吹袭中不停地发抖。这里，人与牲口之间消失了界线。

为了多挣钱，彭德怀挑了人们最不愿干的活，即站在深水里摇孔明车，把水从煤洞里抽出来。除此外，他还凭借自己身体的强壮每天到煤窑里挑一、二次煤，这样他每月可多拿好几块钱。结果他变得“又黑又黄，简直不像人的样子了”。彭德怀在这干了两年，没料到煤矿亏损倒闭，厂主破产逃跑，他只领到一年的工资——4 升米。这里的经历给彭德怀的印象很深。五十年

后他还回忆说：我的背也压弯了，到现在还有些驼，但我知道了资本家们对雇工的残酷剥削。

从煤窑回家不久的彭德怀很快又成为“聚众闹崇、扰乱乡曲”的饥民头子。1910—1913年，湖南省连年遭蝗灾。水患，遍地饥馑。富户囤粮积奇，饥民被迫起来“吃大户”。彭德怀成为饥民“闹崇”行列中的年轻一员，他带领着没有粮食下锅的人枪粮仓、吃大户，被团防局通缉追拿。他只好拿着堂叔彭五爷刚刚卖掉小猪崽的800文钱作路费逃至湘阴县的西林围，又干了两年堤工。

当堤工时，彭德怀仍然感受着遭欺压之苦，他还记得伯祖父五十老倌告诉他的话——这位老人年轻时参加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军。他把自己用过的大刀送给彭德怀并教他练习武术，结果彭德怀对付二、三个小伙子不成问题。他还给彭德怀讲太平天国替天行道的故事，什么有饭大家吃啦，女人放脚、平田土啦，人人平等、共享天国啦等。但是彭德怀却从没有感受过平等。他的表妹，一位叫瑞莲的姑娘，和他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并准备结婚，却因地主逼债而跳崖身亡。她曾扒在彭德怀肩上哭着问他世上为何诸多不平时，他无言以对。后来他充满疑惑地求教舅舅：“如今这个世上究竟哪个怕哪个？”

他得到了回答：没钱的怕有钱的，有钱的怕有势的，有势的怕有枪的。

彭德怀决定扛枪当兵去。1916年，他痛打过堤工头子后说：妈的，穷人尽受气，老子不挑土了，当兵吃粮去。为了寻找穷人的道理和穷人的出路，他投奔了湘军。

彭德怀渴望这是他变化的开始。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不久，他和同乡毛泽东都成为了革命者。但年轻时不同的经历影响了他们以后脚下不同的道路。毛泽东广学博览，开辟创新，成为中国革命的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和开国者，而彭德怀在自从参加革命后则从未脱下过军装，历经征战，成为仅次于朱德总司令——毛泽东另一位亲密合作者之后的十大元帅之一，首任国防部长。

但是，他们走过的路却是艰难、曲折而又漫长的。

## 第二章

毛泽东，被斯大林称作“麦淇淋”式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成为中国革命的红色领袖。

战争，把彭德怀从国民党的二等兵变为共产党的军团司令。

考验，来自革命阵营内的李立三、王明、张国焘。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是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习的五年里形成的，并且在这里积累了他最早的社会活动经验。对此人们已给以公认。1913年，他在多次选择之后走进了由徐特立先生题字的湖南第一师范大门。由于老自学，父亲不再寄钱，住的地方也让军队占了，毛泽东决定再考学校，只好选择不收费的师范学校。他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此校1914年2月合并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个学校里许多人抱怨学校条件差，住宿差，伙食差，牢骚怪话不断。但他从不参予此事，别人问他，他说：学习当然要好条件，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努力，没有志向与精神，条件再好也收获不大，古代不有囊萤映雪吗？为了实现他为中国和全世界受苦人谋福利的理想，继续孜孜不倦地学习，同时用洗冷水澡、游泳、爬山等方法锻炼自己的身体，以打下革命的本钱。为此他曾差点葬身湘江。他取得了令人欣慰的结果。1917年，全校400多名同学推选他为品德、自制、胆识、言辞和写作能力等方面的模范，并成为学生领袖。

当然，毛泽东首先面临的还是吸取知识，不过这时他已有了明确选择：他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了学习计划，把重点放在哲学、史地和文学等方面的研读上，即以学习社会科学为主，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专修课。在他看来，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的许多问题，因而对自然科学无多大兴趣也不愿钻研，他在这些课程上分数很低。后来，毛泽东改变了看法，1941年1月，他写信告诫在苏联学习的岸英、岸青：

“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毛泽东从小就有的反抗素质在长沙第一师范得到充分发展。他领导的校友会首先向学校里的繁苛规则发难，28个不得如何不得如何……迫使校方修改；他倡导驱逐校长张干的活动；还多次组织游行示威，抗议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他对国事越来越关心了，救亡雄心日益勃壮。1915年5月7日，他在《明耻篇》（为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第一师范学生集资编印的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扉页上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的良友易咏畦病逝后，他写古体诗悼之，亦见其要负救国重任的情感，其中写道：

东海有岛夷，  
北山尽仇怨。  
涤荡谁氏子？  
安得辞浮贱！



东边是岛国日本帝国主义，北边是吞食中国的沙皇，都是中国的敌人。谁来扫荡这些妖魔，斩断他们的魔爪，就靠我们，我们绝不能以为自己身低平贱就不去担当救国重任，一片雄心昭然若揭。

他还指挥只有几支真枪的学生自卫队抵抗占领学校的军阀傅良佐的溃军，居然胜利了（他当过半年兵！这使长沙免了兵灾）。他贴出招生广告，为工人和店员开办夜校，但报名人数不多，两次广告才有9人报名。到了1917年暑假，出于效仿别人和增加社会知识的目的，他开始在湖南省徒步旅行，附带调查农民，他的计划是如有可能，他要走遍全中国，借此增长知识和克服困难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人这时开始组织“新民学会”这种研究性团体，这是他施展自己领导才能的开端，也使他变得越来越有声望。改造中国需要时间，需要更多人团结起来。他们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等等，而不谈社会地位、金钱和女人。新民学会对中国后来的许多事情和命运有广泛的影响。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做过组织团体的尝试，他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了征友启示，指明要交结坚强刚毅，随时准备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国家的人为友。结果得到三个半朋友：一个是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另两位后来变成了极端反动分子，半个是指没有明确表态的李立三，他听完毛泽东的话后没提出任何明确建议就走了。

此时毛泽东在政治思想上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但他肯定自己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

后来，毛泽东参加了赴法勤工俭学会的工作，北大杨昌济教授写信让他组织有志青年赴法国留学。他本来也可以坐船到法国去，但他还是留在了中国，他觉得他对自己的祖国知道得还不够，在中国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留法勤工俭学简史》的作者黄利群就认为毛泽东未去法国是因国内工作的需要。而毛泽东自己对斯诺说：我另有计划。

为陪送赴法同学学习法语，毛泽东到了北京。和以前的习惯一样，为了多读书，他走进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当然是想得到一些钱，每月有薪金8元。尽管他在这里感到压抑——他试着想和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人物谈谈，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南方土话。他最后遍读了李大钊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并加入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仍然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毛泽东迅速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五四前夕，毛泽东因母亲病重从北京动身回到了湖南。

毛泽东开始研究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他组织了湖南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这非常有利于他后来的建党工作，湖南学生联合会也成立了。不久，毛泽东又筹备《湘江评论》并在创刊号上写了发刊词即《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该刊很快深得湖南学生们的喜爱并对华南的学生运动发生影响，但它只存在一个多月。

毛泽东领导学生发动了反抗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因为他查封《湘江评论》、解散了学生联合会，不准学生响应五四运动。为了扩大反张规模和争取更多人士的支持，毛泽东在1920年第二次到了北京。他在北京时继续去北大图书馆读书，读到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他说：从这时起，我认为自己已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此后，毛泽东开始了建党工作。他慎重考虑后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

救中国，决定踏上一条艰难危险而又漫长的道路。1920年12月，他告诉在巴黎留学的蔡和森，赞成他提出的中国建立共产党并以唯物史观作为共产党哲学根据的主张。1920年从北京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后，毛泽东回湖南筹备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尽管他们人数很少，只有57名党员，而且也太年轻，没有足够的革命实践经验和对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层了解，作为建立新政府和新社会的力量不免显得艰难而又遥遥无期，但它确实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起点。正如著名作家叶永烈所言这是“红色的起点”。毛泽东是这个组织的创造者之一。他为党的目标奋斗了几十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他的领导，再到1949年成为由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的领袖，并继续开辟建设新中国的道路，直至1976年逝世。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就说毛泽东是一个“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意为不正宗）。米夫、王明也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不过是打富济贫、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而已；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和博古竟在毛泽东转身之后说他是无知的乡巴佬，就知道在山沟沟里和落后的县城转，是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的。直至后来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依然如此看法。

这不是他们对毛泽东的成见和咒骂，而是他们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无知。实际上，他们谁也比不上毛泽东更深刻更现实地理解中国。

尼克松说：作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战略洞察力、灵活的战术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把农民阶级当作一个革命阶级，以取代产业工人，从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采用把士兵组成军队的办法而不是组织秘密集团进行武装暴动的办法来进行革命，从而修正了列宁主义。

我们认为还不止如此：他放弃攻打城市而在偏僻的农村点燃革命火焰，以农村武装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城市，更改了苏联城市暴动的经验；他没收地主富农的田地按人口分给无地的农民，弥补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者孙中山没有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缺陷。最关键的是，毛泽东赢得了农民，唤起了农民中贮藏着巨大革命热情，而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真正了解中国。

在中国，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革命，谁就取得了中国。“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3亿6千万农民群众的帮助，他们将一事无成”，“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没有用处”。这是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总结革命经验时说的话。确实，中国革命最雄厚的力量在农民之中，共产党数十年战无不克就是因为他们能准确反映和预期农民的根本愿望，农民们为保卫共产党分给的土地而穿上军服，帮助共产党建立了根据地，建立了武装，战胜了国内外的敌手。

这不过是个结果，毛泽东早就开始了了解农民的工作。当然，他要按照党章中“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共一大规定的任务是首先从工人运动来行事。他先到了安源煤矿去宣传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很快建立了党组织并和他的战友李立三、刘少奇一起鼓动了工人罢工，但他也组织了湖南第一个农工会——岳北农工会，他的堂妹毛泽健和妻子杨开慧曾在这里工作。它比另一位农民领袖彭湃组织的农会要晚一年整。彭湃是出身于地主的留日学生，后来加入了共产党，他手下的农会会员从一开始的6人发展到10

万人，曾对广东革命和北伐起过重大作用，1929年他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此时，国共两党开始酝酿合作，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在他培养的党军——粤军首领陈炯明背叛他后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而中共也要扩大自己力量和阵线，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反帝反封建，结果孙中山决定吸收新鲜血液，把共产党的年轻娃娃们溶进国民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人成了国民党的党员，不过，他们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很有限，没能起到领导作用。但是共产党在工农运动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充分显示了中国新崛起的革命力量和阵势。

在改组后的国民党中，毛泽东担任上海执行部组织部书记。他认为什么事也不做的高级官员太多了，走出首府去的人太少了，这样影响国民党从群众中获得国民党革命的力量。在他的建议下，国民党中央执委成立了农民部，不久农民讲习所开始工作。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工作是彭湃完成的，他是第一、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

毛泽东还向自己党的领导者陈独秀提出警告，要他注意农民问题。在1925年1月举行的中共四大上，毛泽东要求建立工农联盟，以应付突然变化。他还建议共产党应该训练自己的农民干部和发动农民，并把这种训练遍及全国而不是局限于国民党掌权的地方。这确实是一个“自私”但有远见的主意，以至后来的国民党历史学家司马璐在《中共党史暨文献资料》中指责中共是利用国民党的身躯发展自己的势力。

尽管毛泽东的意见未被重视，而且又离开了领导岗位，他还是开始了组织农民的活动。1925年，他回到湖南清水塘，一边养病一边发动农民，开始感受到农民的力量。“以前，我没有充分意识到农民中阶级斗争的程度。五卅运动后，湖南的农民变得很有战斗性了。我离开了我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运动，几个月内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他自己认为他在湖南期间组织了本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他亲自建立了韶山农民党支部，其中有32位成员被蒋介石屠杀，其他人都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共产党在工农运动上的成功加速了国民党内部阵营的分化，新右派出现了，被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护的蒋介石不断强化自己的权利，向共产党步步紧逼。最后不惜实行清党政策，与中共决裂。后来他成为大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国国民党的总裁和中华民国总统。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不得不进行斗争，其武器就是对农民的清醒认识。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国民党部的《政治周报》呼吁人们重视农民问题；他写《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在农运讲习所中主讲农民问题如农村教育、农村革命形势等，不断地强调发动农民的必要性，但均受到陈独秀的否定，陈独秀禁止毛泽东在中共报刊杂志上发表关于农民的“过左”言论，以至毛泽东的最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受此待遇。最后刊登出来，其中有中共另一位领袖瞿秋白的作用。实际上，毛泽东成了共产党内重视农民运动的特殊人物。

他确实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和领袖：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部长、全国农民协会负责人、湖南省第一次农民工人代表大会主席、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然而这些头衔与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造成的影响相比却都显得微不足道了：他到湖南五县作了32天的考察后得出结论说：农民运动好得很，不是糟得很，正是农民们，将推翻几千年来剥削制度

的基础和贪官污吏的墙脚。他号召农民们组织自己的武装和自己的政权，打倒一切豪绅地主，再踏上一只脚。他要求共产党们站在农民运动的前面，领导他们，这样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陈独秀拒绝采纳毛泽东的一切主张。他是毛泽东在自己阵营内第一位对手。他认为中国的农民人数虽多，但散漫，不易集中，而且文化生活简单，倾向保守。发动农民运动吓跑蒋介石，破裂统一战线。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认为陈独秀应该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最大的责任。不过他也承认即使陈独秀采纳了他的意见也不能保证战胜反革命力量，因为没有根据地。

根据地在中国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毛泽东率领几百人占领了井冈山并把它扩大成有21个县300多万人口组成的中央苏维埃地区，进而挫败了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连续“围剿”。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但史诗般的长征之后，根据地在陕北重建，与蒋介石周旋十年而使之无可奈何；后来，根据地又被推广到抗日战争中，借此顽强地阻滞了数十万日本兵的步伐并最终战胜了他们；在与蒋介石决战的解放战争中，根据地同样成为共产党胜利的决定性保证。陈毅说：我们的胜利是根据地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对此毛泽东也深有体会，以至他1959年在庐山严厉批评彭德怀时还提出不行就带兵去井冈山打游击。

可是，根据地初建时却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人们不知道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或者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保证根据地不被消灭。南昌起义失败了，尽管它还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但它没有发动农民，也没有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以致当地老百姓说这支起义部队与蒋介石的军队一样。但它确实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第一次武装反抗，由此创造了红军和解放军的最前身。8月1日也被当作建军节来纪念。周恩来说：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没有根据地，失败也就必然了。广州起义的失败同样是因为没有走向农村，它完全是一次按照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方式实施的暴动，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仍坚守广州，最后大败。

除此之外，革命的共产党人还面临着如何作战的问题、土地革命问题、党的建设问题等，仅凭革命勇气和胆量已远远不够，要达到目标，尚需艰苦的探索。

这一切问题的解决要归功于毛泽东。他的同志们给他过启发、帮助和完善，但他总是最早或最好地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是他首先退向农村，最终找到一条致胜之径。

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领导下的起义军们——他们利用自己设计的旗子——五角星旗，中间有一把锤子和一把镰刀，开始了湖南的秋收暴动。按中央原定指示，毛泽东必须指挥部队进攻长沙。结果非常不幸，不仅长沙未克，军队也损失2/3。他决定向山区退却。此前，他曾在八·七会议上提出过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建议各地革命力量近山的上山、近水的下水。或许他还实地观察过井冈山的地理环境，但是他刚迈出第一步就付出了代价：作战和逃跑使部队迅速减员，由一开始的8000人降到800人，他也受到了中央给他的处分，被免去中央委员会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及湖南省省委委员的职务，但他依然充满信心，用自己富有热情和感染力的讲话鼓舞着残余队伍的勇气，这时的他蓄着二、三寸的头发，套一双草鞋，披一件老百姓的破棉袄。

西方的一些学者常在他们的著作里把毛泽东坚持上山的举动说成是受中

国小说的影响，要学习梁山泊的 108 位好汉。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上山的目的尽管有些被迫的因素，但确实是经过比较后的选择，它不是为了占山为王、打富济贫，而是寻找落脚点，保存实力，再图发展，不断强化自己的力量，等待全国性的决战和胜利。因此，他在山上采取了与历史上的反抗者完全不同的政策。

毛泽东首要的任务是寻找尽可能多的条件使他能够立稳足跟。很显然，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他充分施展了自己的创造性和实用性，把自己信奉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在他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崇拜从心中消失后，他就再也没有崇拜过任何人，也不崇拜任何教条。1930 年，接近不惑之年的毛泽东公开宣布要反对本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包医百病的良药，中国革命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具体情况去取得。”

毛泽东首先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这得益于井冈山地方流窜武装王佐、袁文才的作战经验。袁文才是个中学生，王佐则干过裁缝，他们都是客家人，被逼成土匪，有 600 人 120 支枪，相当于毛泽东当时领导的军队力量。他们能在井冈山生存的原因是常与对手磨围子，能胜就打，不能胜就跑。后来朱德、毛泽东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并发展为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当然，力量还来自于毛泽东创立的新型军队，他特别强调官兵平等和不虐待俘虏，这完全区别了旧军队而大大增强了战斗力。而井冈山本身又是易守难攻，为选此处毛泽东几乎跑遍了罗霄山脉。不过后来彭德怀未能挡住 20 倍于他的敌人的进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指责为不珍惜毛泽东的家产。

更主要的是毛泽东调动了农民的精神世界，他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手段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对中国的农民来说，最重要的和最渴望的是能够得到一块土地，土地在他们心中是至高无上的，这一点从中国庙宇中土地庙所占的分量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到井冈山后，重新分配土地和财富，并把这种政策推广到周围的县城，人们一开始不敢接受这突来的礼物，终于受不住土地的诱惑，贫苦的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而且选出了代表他们的地方政府，泥腿子们也能说话算话了，而且可以到地主小姐们的牙床上去滚他几滚。

为了肯定土地政策，争得更多人们的信任，毛泽东起草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不过它太激烈了，因为它规定没收和重新分配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打击对象不突出，到年底，毛泽东改正了这个错误。后来他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并在中央苏区沿用推广他的政策，实行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走进革命者的队伍。

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没有忘记致力于党组织的建设，同时他也要反击自己的同志对他的指责。他认为尽管党在落后的农村中进行革命，但如能有效地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依然能够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而中央过分强调工人成份的办法，比如把船工出身的向忠发推选为党的总书记而他却被捕叛变，并不是纯洁党的队伍最有效的途径。事实说明这位工人领袖不仅革命意志软弱，而且知识水准和领导能力也很有限。毛泽东的结论是：只要首先从思想上建党，同时在组织上建党，共产党在农村斗争中依然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毛泽东把自己的实践和认识上升为理论，他要向同志们证明他的根据地不仅能够存在，而且将会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时，毛泽东被党内一些同

志指责为“保守主义、农民意识、游击主义、和土匪游民无产者结成联盟”等等。但毛泽东看到了中国反抗斗争的必然性和斗争不平衡性的现实（这一点颇相似于列宁），认为中国反抗力量必须走向农村，这就是他的三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心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反动统治又异常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必须而且只能是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在农民占人口80%的中国，武装斗争又是同解决农民问题，进行土地革命紧紧相联，而土地革命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无产阶级必须走向农村，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由于中国地方农业经济占优势，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革命发展也不平衡，在事实上形成了敌占城市我占农村的对峙局面。外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强化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加剧了白色政权间的不断战争而削弱了其力量，红色割据势力有可能先在农村建立并成为长期而反复的演习。

毛泽东的结论是：中国革命基本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至此，毛泽东的革命道路理论初步形成，他在创造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找到了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他的成功吸引着中国的革命者，1928年4月，朱德、陈毅的部队与毛泽东会师，不久，彭德怀也率部上了井冈山。

在中国的几位主要领导人中，彭德怀参加革命较晚，但历史已证明他是个坚定的革命者。1916年3月，彭德怀到湘军第二师三旅六团当了二等兵，当时他不满18岁。尽管他这种举动是受到那时正流传着的富国强兵等思想的影响，他还是坦率地承认——他从来不说假话，即使在逼供的刑具面前亦是有一说一。他当兵的主要动机是挽救家庭的贫困，做堤工养活不了全家。

必须重视彭德怀扛枪当兵的原因，他贫苦的童年少年和为穷人找出路的思想对他以后的经历有着重大的影响。他屡屡用童年的不幸来表达革命的坚决。他在入党前夕对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段德昌说：为工农大众谋福利最有意思。1939年，他在延安激动地告诉妻子浦安修：“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我彭德怀是个什么人，不能忘记我为穷人打天下的使命，我决不会在战士和人民面前搞任何特殊化。”事实上，正是这种信仰引导他组织救贫会，寻找共产党而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革命开阔了他的眼界，他要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而在这之前，他是不关心政治的。

有意思的是在军队中的彭德怀却和已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当学生的毛泽东有着共同的目标：他们都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傅良佐和驱逐张敬尧的运动，毛泽东领导学生军缴了傅军的械，被誉为浑身是胆的人。而彭德怀则是失败者，他所在的军队被打败，随湘桂军撤退。后来，当毛泽东为驱张一事赴京往沪时，彭德怀所在的军队武装抗击张敬尧获胜，由于彭德怀作战勇敢，任重耐劳，而且练文习武又很认真，成绩也好，渐得长官赏识，先后被提为一等兵，副班长、班长。1920年他被提升为排长。

在当排长之前，彭德怀曾被派往长沙侦察北洋军队的情况，他很不走运，返回驻地时被捕。他后来回忆说，多次受刑审讯使人难以忍受，很想承认自己是侦探，死了就算了。但他很快地改变了主意，认为不值得去死，决定一言不发。最后他被他的同乡，一个叫六十嫂的寡妇以自己集股办的织袜厂的

名义保释出来。后来，彭德怀忘记了这个织袜厂的厂名。

1921年秋，彭德怀又被他的团长袁植逮捕，原因是他杀了南县注磁口的恶霸地主欧盛钦。此人任职税务局长兼堤工局长，他的哥哥又是赵恒惕督军署的少将参议（后因贪污被撤职查办），他因而仗势在家乡强占良田房产、封河禁渔、圈苇地禁砍伐、滥增百货税收，横行霸道，为害尤甚。彭德怀驻兵此地时（任代理连长）常去镇郊农村找人闲谈，一个叫姜子清的农民告诉他欧盛钦强占了他多年淤积起的稻田并要求彭德怀帮他夺回。彭德怀本不想参予此事，建议姜子清组织反欧盛钦的救贫会，因为没人敢参加，彭德怀便命令几个化装的士兵和姜子清一起秘密砍下了欧氏的头，还写了匿名报告宣布欧盛钦的罪状。事隔数月，早已离开注磁口的彭德怀被人告发。在被押往长沙督军署的路上，他用欧盛钦的罪过取得一位沅江口音的青年士兵的同情，暗地放松了捆绑彭德怀的绳子。过捞刀河时，彭德怀让押送他的特务排长过来取他身上的20多块钱，结果排长被撞下水，彭德怀上岸就跑，士兵也不追赶，朝天放了几排空枪。彭德怀趁机逃脱。但他没有去处。疲乏的他躺在地上仰望天空，心里念着：“天地转，日月光，问君往何方？天下之大，岂无容身之处吗？”当一位名叫罗六十老信的渔翁免费渡他过湘江后，他到了他的老班长郭德云家（郭德云是彭德怀入伍时的班长，参加过辛亥革命，富有正义感，因愤恨军阀混战，弃职回家做皮匠，生活清苦，但不失骨气。彭德怀对他十分敬重）。

在此处，彭德怀和郭德云、李灿、张荣生、黄公略等决定组织救贫会。他们长期在一个部队，志同道合，后来都参加了平江起义。救贫会章程规定四条：一，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二，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和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三，发展实业，救济贫民；四，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答责体罚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

它很相似孙中山的民主纲领，也接近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所以彭德怀后来说，救贫会是属于在共产党影响下军队士兵自发组织的团体。这和毛泽东参予筹备共产党的成立时间一样，都发生在1921年，它也是彭德怀走向革命的起点。

杀欧盛钦给彭德怀提供了一次见世面的机会，因他不宜久住郭德云家，便到了广州，投奔粤军许崇智部的独立营，但不久该营被陈炯明部击败，彭德怀见营长胸无大志，便决定回家。他先坐船到厦门、上海、汉口，最后爬乘煤车的一节敞厢回到长沙。因为没钱，他在这些地方都未久留。

此后，他回到家乡种地。不久，娶了刘细妹（他取名为刘坤模）为妻。

1922年6月，湖南陆军讲武堂开始招学员，湘军二师六团团团长袁植想起了胸有大志的彭德怀，在他的安排和建议下，黄公略、李灿先后写信约彭德怀同考湖南军官讲武堂，提醒他要达到灭财主、驱洋人的目的必须搞军队。彭德怀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他改名为彭德怀（原来叫彭德华），顺利考入了讲武堂。他在这里用一年的时间读完了保定军官学校的三年制教材。不过，为听懂军事课程中的地形、筑城和兵器等科目，他不得不花四个月自习文化。实际上，他一生都在不断地自学之中。他深知自己的弱点，尤其是和出过洋的领导人相比。他曾说：别看我是个粗人，可我知道孔夫子的用处（他把孔夫子等同于书）。解放后，他有一个如书屋的家，桌子、床上、箱子里和柜子里到处是书，即使在贬职挂甲屯时仍在精心阅读哲学、政治经济学等。

中国有句俗话：“湖北的将湖南的兵”。意思是湖南人当兵的多而且善

战。他们为争夺地盘相互争夺，尤其在 1922 年至 1926 年间，孙中山的广东政府对它的反对者诉诸武力，他亲率部队北进，更加剧了邻靠广东的湖南境内的动荡，鲁涤平、贺耀祖、赵恒惕、唐生智、叶开鑫等人如波涛浪尖此沉彼浮。唐生智为自保而求救广东，广东政府派出叶挺独立团前往湖南，同时作为即将出征的北伐军前锋。这是共产党控制的第一支武装，主要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陈独秀长子陈延年的功劳。它在后来的北伐中表现了极强的战斗力，被誉为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攻入长沙，彭德怀部被改编，他仍任营长（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一团一营营长），参加北伐，赴湖北作战。在攻打武昌战役中，彭德怀认识了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他介绍彭德怀加入了共产党。

段德昌，湖南湘潭人，1925 年加入共产党。是洪湖、湘鄂西苏区的创始人之一。1933 年 5 月 1 日，他在王明的忠臣夏曦制造的第三次“肃反”中被枪杀。罪名是企图搞分裂。实际上他是个忠诚而坚决的革命者，29 岁的他告诉行刑者不要用枪打死他，用石头砸就可以了，留下子弹打击敌人。贺龙回忆说他当时眼见段德昌被枪决而无法营救，只能双眼流泪。

段德昌和彭德怀一起追击吴佩孚的残部，在当阳县玉泉山一个叫关帝庙的地方宿营时，据彭德怀回忆，他们之间进行了一次最有意义的谈话。彭德怀主张的“耕者有其田”和“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最有意思”的观点被引导到真正的革命者水平。段德昌告诉他：我们不仅要实现耕者有其田，而且要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发展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要为这样的理想奋斗终生，不惜自己的生命。

他深深影响了彭德怀，成为彭德怀人生道路上根本转折的开始。40 年后，彭德怀在被囚禁中还写道：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这次谈话。也影响了彭德怀所在的第一团，当时的共产党员总是充满魅力。但彭德怀仍处在旧军队体系中，归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指挥。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北伐军内部的斗争却逐渐显露出来，并且到了紧要关头。对中国的地方武装首领来说，参加革命的目的是想尽办法扩大自己的武装数量和控制地盘，一旦在这一点上受到威胁，他们就决定背叛革命。国民革命军的军官们也因为他们家庭的财富和权势被农民协会捣毁而产生报复心理。他们带着自己的部队屠杀农会领导人和会员，这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能够看到。旅长戴斗垣、陈光中、许克祥、夏斗寅等纷纷在自己的防区对付反抗的农民，200 万农民为此付出了生命。

对国民革命军的背叛，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拒绝抵抗。他与毛泽东发生了争吵。几乎在同时，彭德怀割断了他对上级、与他共事十多年的周磐的感情，因为他拒绝派兵去长沙平定许克祥的叛乱。而在此之前，彭德怀认为他有爱国救民思想。当时，周磐的第一师对湘赣革命形势有关键的作用。叛军均是何键的部队，从力量上讲，第一师击败他们没问题。彭德怀在率部参加农民们抗议戴斗垣的示威大会后屡屡建议周磐出兵配合叶挺部消灭夏斗寅和到长沙平定许克祥，但都没有得到答复。

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详细记录了他所在的部队 1927 年的活动：1—6 月，从武昌开回湘西北，肃清匪乱，实为保护地主乡绅，镇压反抗；6—9 月，参加唐生智的东征讨蒋行动；9—10 月，在南县、华容、安乡一带休整；11 月，与贵军袁祖铭争夺新洲。这些活动都加剧了人民的苦难，因而刺激了彭德怀。



他组织了救贫会，后又成立士兵委员会，还为部队准备了教育口号。如：吃农友的饭，穿工友的衣，我们要为工友农友服务。每天早晚点名和排队吃饭时必先喊这些口号。这些活动使他在湘军中以“自由派”军官而著名。

由于他在肃匪过程中见到的是大批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被随意屠杀，心起怀疑，渐生反叛意识。1927年双十节前，彭德怀——这时他已被任命为团长，这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位子，完全可以在军队中沿着阶梯登青云，但彭德怀告诉他的排长张荣生（中共秘密党员）、李灿等决心走革命的道路：“走共产党的道路，这是我的关键，我跟你们一起走，决不回头，主意早就定了。”

共产党组织了解了这些情况，六天后，南、华、安特委的代表找到了彭德怀。北伐期间，彭德怀曾向段德昌提出入党要求，但中共为照顾统战关系，决定暂不在第八军中发展党员。这一次，他的入党愿望实现很快，南、华、安特委通过了发展彭德怀为党员的决议并报请省委批准，本定年底举行入党仪式——当时叫入学仪式，因他的副师长来访而推迟。后来某日——彭德怀说他记不清了，我们推算为1928年4月，彭德怀在邓萍（经彭德怀同意，中共南、华、安特委派去任文书的地下党员）画在墙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画像前举手宣誓，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牺牲一切，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永不叛党。

彭德怀在最危险的时刻走进了共产党人的队伍里。

我们无法知道彭德怀何时决定武装起义的计划，因为平江起义是在共产党员黄公略的身份暴露后仓促举行的。到1936年毛泽东还认为彭德怀的红五军是何键部队中的暴动哗变队伍。其实，彭德怀部早已脱离何键的序列而属于独立第五师，也不是单纯的士兵哗变，彭德怀确实在积累着革命力量并且注意到了共产党人进行的多次起义及创立的根据地等问题。1928年2月他写给黄公略的几句顺口溜反映了这一点：

“求知心切去黄埔，夜梦依依我不然，马日事变教训大，  
革命必须有武装，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  
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  
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磐办随校，谨慎争取两年时”。

彭德怀第一次提到毛泽东，就已经怀着一种敬佩和向往。

1928年4月，彭德怀所在独立师全部开往平江帮助闫仲儒的部队剿共清乡，时任团长的彭德怀无法容忍。他们烧杀抢劫，比土匪还坏，彭德怀当面用激烈言辞责骂清乡委员会主任张挺借清乡之名随便捉人杀人、牵牛宰猪，搞得十室十空是官逼民反，逼民成共产党，实属该杀之人。此话出自国民党军官之口，张挺为之目瞪口呆，这实在是替共产党辩护。实际上彭德怀也确实在帮助共产党，他把清剿计划告诉平江县委；命令自己的部队一不清乡、二不扰民；他们在追游击队时只向天上打枪或用纸把子弹包好放在地上送给游击队等。

这时，长沙破获共产党案，南、华、安特委亦受破坏。黄公略因涉及其中身份暴露。一个名叫陈玉成的救贫会会员将此消息报告了彭德怀。陈玉成是独立师师长周磐的马弁，性格文静，人称“玉姑娘”。在随周磐赴长沙时，他送给彭德怀一本新的电报密码，以备急用。当时他决没想到这种举动会造成对今后中国如此大的影响的平江起义。彭德怀和刚来此地的省委特派员滕

代远决定马上起义。由于井冈山朱毛红军称第四军，他们就将起义军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中国又多出一支反对国民党的队伍。

有人说平江起义并没有喊出革命口号，只是一次普通的闹饷。1929年10月，红五军军委的报告中就说“平江暴动是少数长官领导的士兵闹饷而非士兵有觉悟的暴动”。但是起义后的部队确实定名为红军并建立了江西苏维埃。他们采取盘旋战术，在湘、鄂、赣与会剿部队打圈子，打推磨仗。与他们作战的是江西省府主席鲁涤平调动的十多个团的兵力。彭德怀的团长贺纯（共产党员）在战斗中被打死后，越来越多的人战死。加上动摇逃跑者和伤病员的增加，人心浮动。还有彭德怀的妻子登报与其脱离关系，他面临着走向哪里的选择。

他想到了井冈山，他要去找毛泽东。这是彭德怀自己的希望，也是省委的指示。他自己曾说：我在1927年冬至1928年初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与现代化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手段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现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朱毛红军成为红军旗帜。我自己想去取经，想弄清革命的性质，分田怎样分法等问题。

彭德怀上井冈山的计划遭到了他的敌人的沉重打击。先是在万载县，他受到了预先得知情报的敌军的伏击，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20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500人左右，而且军需全失，他不得不退到铜鼓，后又到黄金洞一带进行休整。

彭德怀最终实现了目的，他的队伍在何长工和毕占云的带领下到达宁岗，见到了朱德。第二天，他们到达茨坪，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用和彭德怀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对他说：“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这句话是他们日后30余年共同战斗历史的开始。

双方的队伍都很兴奋，但在12月11日举行的庆祝会师的联欢会却出现了不祥的征兆——台子塌了。红四军军长朱德很机智，这时他已42岁，是革命队伍中的老兵。他说得很轻松：垮了台，搭起来再干嘛。自此，彭德怀和毛泽东为共同的目标一起奋斗，历经艰难困苦，越过万水千山，直到共同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检阅台上。

彭德怀的到来增加了井冈山上割据者们的枪支和力量，也增加了他们的粮食危机。红四军本来已开不出每天3分钱的伙食，现在更是难上加难了，山上和条件变得更差，极缺粮食和冬衣。1941年在延安出版的《朱德将军传》中曾这样描写：四周紧布着封锁的罗网，时节转向寒冷的冬季，山上、树林里都堆着积雪，苦战的褴褛的人们更艰难了。他们穿着单衣，天天吃着南瓜。同志们是坚强的，但不免在寒冷中来了感情的灰色，他们唱着“打倒军阀，天天吃着红米南瓜，敌人来进攻，努力消灭它。”

生存已成困局，而江西和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还在向井冈山聚集，这已是他们的第三次会剿，共有6个旅3万余人。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者毛泽东不得不思考对策，这便是柏露会议的原因。会议决定彭德怀的红五军和红四军的32团王佐部留守井冈山，四军主力突围到外线牵制和打击敌人，并相机开辟新的根据地，围魏救赵。问题是留守井冈山为什么要留刚刚到来、人地两生的彭德怀部呢？当时他能指挥的人数不足一个团，只有七、八百人，而且有半数左右的老弱病残人员，面对强大的敌人围攻，丢失根据地的危险显而易见。这也是红五军领导者们的疑虑之一。彭德怀答应了这次考验，他

用自我牺牲精神说服他的战友们：应该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四军主力安全脱离敌人包围向白区发展。如果红五军不承担这项任务，湘赣边区政权可能受到损失甚至搞垮，要准备牺牲局部，保证主力安全。

可是，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部队并没有能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他们无法摆脱江西军阀李文彬的追袭，被包围在大余，损失惨重。31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28团政委何挺颖负重伤。突围后，毛泽东继续采用他的来自于实际的有效办法，决定向赣南丛山进军，与那里的几支分散的共产党游击队汇合，建立新的根据地。但这却使井冈山上的彭德怀真的成为孤军奋战了。转机出现在大柏地，毛泽东利用这里有10余里长狭谷的有利地形设伏取得一次重大胜利，打垮追敌刘士毅部两个团，俘敌正副团长以下800人，缴枪800支。这次战役中，22岁的林彪立了奇功。他不久前还被文武全才的陈毅指责为胆怯逃跑，此时却率兵绕到敌人背后用枪托和树枝与敌人激战，击溃强大的敌人。实际上他一直受到毛泽东的赏识，自井冈山撤退后，红四军主要是由朱德和林彪二人指挥作战的。一年后，年轻的林彪成为红一军团第四军的军长，接着，24岁的他担任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1933年，毛泽东不忘大柏地战役，作诗“菩萨蛮·大柏地”纪念之：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终于，红四军在赣南又得立足之地。当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消息后，决定会师瑞金。

朱毛走后，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部受到敌人的猛烈攻击，敌人的数量是守山部队的30至40倍，尽管彭德怀预先作了准备并指挥部队给敌人以杀伤，仍然无力守住阵地：全军没有重武器，也没有手榴弹地雷等，没有一寸铁丝网，两挺重机枪因无子弹实为一堆废铁，每人只有十余发子弹。一个仇恨红军名叫陈开恩的富农带领敌军避开红五军一大队的正面防守，沿乱石成堆的小溪右侧上山，攻破了黄洋界哨口。彭德怀无力收回失地，而预先准备在外侧打击敌人的红四军因自己的困境未能按计划行事，红五军伤亡重大，几乎丧失作战能力。彭德怀只能撤退，他带走伤病员，留下熟悉当地环境的王佐部分散打游击。毛泽东用两年半时间创立的第一块根据地从彭德怀的手中失落。

1969年，《人民日报》通讯员著文指责彭德怀从井冈山撤退是违反毛主席指示，不要根据地。而美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在她写的《早晨的洪流》中说得更不负责任：毛离开井冈山后，彭和土匪头子袁文才、王佐闹纠纷，以敌人进攻得逞，彭把根据地断送掉了。

对此，彭德怀在他自述中作过辩护，认为井冈山失守是因为：留守部队

复杂、指挥不统一，兵力单薄，昼夜战斗得不到休息，子弹缺乏。而敌人此次会剿有决心、有计划、悬重赏，其兵前赴后继地攻击。

责任究竟在谁，似乎还是遗留问题。

失利的部队——毛泽东的和彭德怀的，经受着难以描绘的疲劳与艰辛。1929年4月，他们在瑞开会师，这只是短暂的相逢，几天后，彭德怀就率领他新发展起来的部队离开瑞金开赴井冈山，他要重建井冈山根据地。在这期间彭德怀向红四军前委汇报了撤离的经过，当时毛泽东歉意地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三天后，彭德怀主动提出打回去，恢复湘赣边区政权，当即得到红四军前委的同意。

彭德怀回井冈山出乎意料的顺利，除了在信丰消灭靖卫团数十人之外，沿途从未遇上国民党的军队，这是因为蒋介石正忙于同冯玉祥间的中原争战。红五军如同大游行一样，不出十天便到了井冈山，一个半月后，湘赣根据地重新出现。

毛泽东却遇到了新的压力。历史像是有意欲磨难他似的，在他成为建国者的道路上不断设置障碍：要他同意欲消灭自己的各种敌对力量作战，还要他与自己处在同一阵营的人交锋，象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等。他们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不是毛泽东的敌人，但他们确实是毛泽东实现自己主张的对手，他们考验了毛泽东的智力和策略，但在变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的毛泽东面前，他们的主张连续败退了下去，当然，这些主张曾使中国共产党的反抗运动陷于危险境地，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

毛泽东与李立三处在对立地位，他必须否定李立三的洋经验，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李立三主张各地红军向苏联学习经验——放弃根据地，进攻大城市，重建城市工会，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这是典型的苏联模式，布哈林就对中国苏维埃和红军颇悲观。他认为红军在农村会妨碍老百姓的利益，把他们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引起老百姓的反对。他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调朱德、毛泽东赴苏联学习等。

很显然，这不是毛泽东与李立三个人间的恩怨，尽管有人用毛泽东的话“我和李立三的友谊始终没发展起来”作证，它实际上是关系到中国革命以如何形式才能走得通的重大政策选择。即走城市起义方式并很快认识到农村根据地对革命的重大意义。

对于毛泽东关于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时间问题，中共党史学界没有统一的认识，但大多数人肯定1930年1月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标志着他的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即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夺取全国性胜利。正是这条道路使头戴红星的共产党武装历尽劫难而不死，而且在以后抗日斗争和反蒋斗争中显出极大威力。

李立三的冒险主张前后存在了三个月（1930年6月至9月），并以“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而著名。本来，李立三只是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但由于强调党的工人成份而变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文化低、能力差，权力渐渐集中到了李立三手中。他根据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的形势断定蒋介石政权行将崩溃、革命高潮就要到来，命令各地的红军集中整编为红三军团；6月，朱毛部队改编为红二军团，加上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分别进攻南昌、九江、长沙，合攻武汉。

在执行李立三计划的过程中，毛泽东、彭德怀的部队又一次会师，他们联合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在此之前，他们遵照中央命令各自进攻南昌和长沙。

朱、毛部队二万人的任务是攻克有高大城墙和优势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南昌，但他们没有认真地执行命令而是应付了事。毛泽东只派一部分军队到南昌对面与敌军隔江示威。

彭德怀接到的命令是立即进军武昌，但他回电中央拒绝执行。理由是他的部队进攻武昌将腹背受敌，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稳健而富有军事才干的他转而横扫鄂南六县，夺取重镇岳阳。接着，他击败围攻平江的何键部队并乘胜攻进长沙，以 8000 人抵抗 3 万多敌兵，坚守一个星期后撤出。这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红军唯一一次占领的省会。

是否进攻大城市一度成为是否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标准。这纯粹是一种无意义而且也不科学的争论。对红军来说，最主要的目的在于消灭国民党的武装和保存发展自己。只要有利可图，进攻大城市和退却农村都是可以的，依此，就不应否定彭德怀三兵团进攻长沙的作用，也不必拔高红一、三军团从长沙城外撤兵的意义。

第二次进攻长沙的任务是由朱、毛、彭、黄（公略）共同担任的。这时的长沙已调进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他们修筑了坚固的工事。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的军舰也游进了湘江。红军遭到机枪和大炮的凶猛扫射，继续作战无异于等待灭亡，毛泽东命令部队撤出阵地，他得到了朱德和彭德怀的支持。这是李立三主义垮台的信号，一个月后，李立三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尽管他的激进主张控制全党只有三个月，而且他自己也承认犯了错误，但还是给革命和他自身带来重大影响。

毛泽东在和李立三的争吵中，得到了同恩来的帮助。周恩来一直把毛泽东和他创造的根据地当作全军学习的榜样。1930 年 1 月，他在《中央军事通讯》上发表“致红军指挥员的信”说：“从瑞金的独立政权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可贵的经验……它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也是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我们都应该学习这些经验。”这些话出于作为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之口，无疑增加了毛泽东的威信，实际上，李立三下台之后，周恩来接替成为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

从长沙退出的红军占领了吉安，他们已得到消息，蒋介石要动用大量兵力“围剿”根据地。中原大战的获胜免去了蒋介石的后顾之忧，他命令在北方作战的部队调头南下，动用数十万兵力连续“围剿”红色区域。然而毛泽东利用在井冈山时采用的作战原则对付大规模的战斗，竟然连战皆捷，又取得了新的经验。十六字诀增加了内容，如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1939 年，毛泽东更精确地总结说：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且经过了一次大革命。这些特点，说明红军有可能发展战胜敌人，也说明红军不能很快发展和不能很快战胜敌人，如果弄不好，还可能失败。因而红军必须实行依靠群众的人民战争，必须实行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形式，必须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必须实行战略上以少胜多和战役上的以多胜少等原则。

这些是绝对的中国式作战方法，正是它保证了毛泽东指挥部队击破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由于这种方式的关键在于人民战争，因而是外国所没有的也是反人民的军队所无法采取的。这也许是中共军队后来战胜蒋介石、日本和美国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它必须是在常规武器作战条件下。

在中国进行革命，必须采用毛泽东的方式，共产国际向中国派出的军事顾问抛弃了它而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八万红军的大退却。史学界一

直这样认为，的确也是事实。由于李德的行为实质上是共产党内新出现的冒险主义——王明主义的体现，毛泽东不得不开始向以共产国际为后台的王明主义挑战。

王明，一位 18 岁就在苏联中山大学加入共产党的安徽籍革命者，是毛泽东在党内的一个强大对手。他们前后抗衡了 15 年。这不仅仅因为王明是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必须服从来自莫斯科的指令。而且他还被看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家。他在苏联期间和另外一些人组成了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1931 年 1 月，25 岁的王明在苏联人米夫的帮助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他推行比李立三更激进的路线，或者说就是全面更改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的政策。李德不过是在军事上替他完成计划，辅助李德的是王明的挚友博古，他在 1931 年 9 月成为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一切听从王明在莫斯科的遥控。

关于李德简历的介绍有多种不同的叙述。于俊道著《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中这样记载：李德，1900 年生于德国慕尼黑。14 岁时参加巴伐利亚街垒战。1923 年成为德共秘密工作人员，一度与苏联共产党的秘密机关发生联系。在他被德国政府以叛国罪投入柏林莫比特监狱后，因德共营救越狱成功至苏联，不久进入伏龙芝军事学校学习。

李德到达苏区后非常自信，据说他常用拳头擂着桌子对毛泽东和其他人说：你们根本不懂军事，要听我的，游击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后要打正规战。毛泽东就用冷淡他的方式对待他。不过李德很怕上前线，总在室内凭北洋军阀时期留下的一张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指挥作战。他态度很蛮横，上自兵团司令，下至一般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都常挨他的训斥和辱骂。连给他做翻译的伍修权都多次请求调动工作，他对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说：李德简直是个帝国主义分子，我完全是凭着党性才给他做翻译工作的。

不过并不是这些使李德给中国红色力量带来巨大损失。他把毛泽东创造的作战经验统统丢在一边而命令红军与人多器精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他忘了他的对手是德国著名的元帅、希特勒最好的将军汉斯·冯·塞克特，而他自己的最高职务不过是骑兵师参谋长。他导致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这时人们还没比较出毛泽东的宝贵。李德能言善辩，常引用著名军事家的话反驳别人，而且又来自共产国际，许多人景仰他的威望，也被他的热情所鼓舞——他表示要拒敌人于国门之外，决不丢失根据地一寸领土。结果一批又一批的年青战士为着他们的理想倒下了，红军减员迅速，指挥官们开始抗议。刘伯承和彭德怀是最坚决反对李德做法的人。当时，彭德怀的三兵团人数最强，有三个整师组成，正规训练好，战斗力很强。常常被作为攻坚战主力，承担最艰苦的任务，因而首当其冲，损失巨大。1934 年 4 月，三军团在进攻广昌的第一天就损失了 1000 人，派出守卫“永久性”碉堡的一个营被蒋介石的飞机大炮炸得干干净净，前线作战部队的连长几乎全部死伤。加上其他部队红军共伤亡 24000 人。这是三军团历史上没有过的。彭德怀极为恼火，大骂李德是坑害红军的教条主义者。只会纸上谈兵，是瞎指挥，是“崽卖爷田心不疼”。不过这对李德已够客气了，因彭德怀一向粗鲁，急起来就骂娘。所以，他做好了去瑞金被撤职、公审、杀头的准备。

毛泽东处在无权地位，他所创造的红军和苏区的一整套机构逐渐被来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所接替。1933 年，在上海站不住脚的中共中央

迁到毛泽东的苏区。此后，他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巧妙的拒绝来自上级却不正确的指示了。他与党中央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而导致他红军总政委和红军总前委书记职务的被撤销。毛泽东只好以“病假”为借口离开军队。支持他的人也受到打击，即毛泽覃、邓小平、谢唯俊、古柏等人的被撤职和被批判。

毛泽东并不甘于寂寞——他虽然指挥不了红军，但还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他据战局的变化不断提出自己的建议，主张红军与蔡廷锴将军指挥的福建革命人民政府部队联合作战。使红军主力突进到苏浙皖赣地区，威胁沿海大城市等经济中心，迫使蒋介石分兵在无堡垒地区作战，而且也可使江西、湖南的国民党军队回援其控制地，从而粉碎他们对江西苏区的围攻。这个建议被博古否定了。后来，毛泽东又提出红军主力进军湖南，把敌人调动到湖南消灭，依然是对牛弹琴，无人理睬。

据统计，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共动用兵力 60 万，飞机 200 架，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推进政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竭泽而渔。

根据地 and 红军的人数都不断缩小。当年的参战者曾回忆说：战后，我们的同志尸横遍野，因为夏天到来，气味难闻。错误的指挥使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走过同一地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名存实亡，它能控制的地区只有六个县了。红军被迫采取牺牲局部利益的行动，派出小股部队冒险向国民党统治区推进，逼蒋介石分散兵力：打着北上抗日先遣队旗帜的红十军团在方志敏、寻淮舟率领下突围北上，但没走多远就被国民党将领王耀武的军队包围，寻淮舟战死，方志敏被俘在怀玉山上，1935 年遭枪杀于南昌。他在狱中曾给后人留下 10 多万字的记录，即著名的《可爱的中国》、《清贫》和《狱中纪实》等。他们指挥的红十军团吸引了 20 万国民党士兵，余下残部在粟裕率领下继续坚持山区斗争。

同时，任弼时、王震的红六军团和徐海东、程子华的红 25 军也分别向国统区作战，幸运的是他们虽然遇到了强劲敌人，最后都保留了部队。红六军团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在湘鄂川黔重新立足，而红 25 军则到达陕北和刘志丹会合，开辟了鄂豫陕根据地。

有人认为，只是毛泽东反对了王明的主义及其执行者李德、博古的指挥（这是事实），而彭德怀则没有，证据是毛泽东受到连续打击而彭德怀却没有被撤职，而且他还批评过毛泽东是“游击主义”。然而伍修权和杨尚昆的回忆都证明了彭德怀是反对过李德、博古的。除开他与李德的争吵外，他也提出过中央应该实行留红五军团在中央根据地，集中红一、三、七、九军团闽浙赣对付蒋介石“围剿”的方法，这与毛泽东的意见分歧——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别，这点必须承认。即使毛泽东在被排斥的过程中也能让人感觉到他在战略上的洞察力日益敏锐和深邃，而彭德怀更习惯于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他是时时刻刻要指挥作战的兵团司令。这种差别的长期存在，是他们后来发生多次争吵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4 年 10 月，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或者说是一次大败退。对此，周恩来很坦率：“万里长征，就是因为在江西打败仗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但红军最后保存了自己，取得史诗般的胜利并成为共产党真正影响中国的开始。

长征的部队包括林彪、聂荣臻的一军团，彭德怀、杨尚昆的三军团，董

振堂、赵博生的五军团，周昆、黄苏的八军团和罗炳辉的九军团，共 87000 多人，其中半数以上是新兵。退却中，一、九军团在左翼，三、八军团在右翼，和殿后的五军团构成三角形把中央纵队紧紧地围在中心。他们从整个包围圈中最有可能成功的地方突击。有材料证明，周恩来、朱德在长征前已派人和广东军首领陈济棠秘密谈判，达成停战反蒋协议。因此广东军稍作抵抗后便向后撤退。他们还故意把大量的武器、弹药、食物等丢在路上。红军用几天的时间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

长征考验着每一个战士和军官：时时刻刻都在战斗，时时刻刻都有危险。但这支充满灾难的队伍却拥有无数坚决的革命者，他们就象满天的繁星一样，夜夜闪耀着不屈之光，而彭德怀则是一颗耀眼之星。他们经历了长征的全部过程，是跋涉者中最勇敢、最忠诚、最坚定的卫兵。1935 年 10 月，担任陕甘支队司令员和副司令员职务的彭德怀、林彪保护毛泽东走完长征的最后路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德怀是第一任国防部长，排在十大元帅行列中第二位。

彭德怀性格刚硬、勇猛，生就一副倔脾气。他训练出来的三军团最擅长正面作战和短兵相接，喜打硬仗，常常是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可谓是红军中的一把利刀。不过，湖南军官讲武堂的生活使彭德怀在运动战方面丝毫不比别人逊色。

红一、三军团从两翼保护着红军，像两个轿夫抬着中央纵队，按彭德怀的话说是典型的逃跑队形。他们在 25 天内越过了蒋介石重兵布置的三道封锁线（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损失较大），但在过第四道封锁线时却不那么容易了。红军的对手是统率 40 万大军的何键，他把军队布防在湘江及其附近地区，形成一个口袋等待红军来钻。1930 年，他曾被彭德怀追逼得只身渡过湘江逃命。对此彭德怀极为懊丧，30 年后还在遗憾“没活捉这贼，此恨犹存”。但这一次何键却差点把数万红军网在他的口袋里，即 1934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的湘江浴血大战。

大战前两天，红一、三、五军团已经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间的湘江两岸，中央纵队完全有足够的时间过江——如果他们扔掉笨重的行李、如果他们急行军的话。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不舍得丢弃任何东西，以每天 20 多公里的常规速度行军，结果四周的敌人越聚越多，红军不得不为过江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确实是一次关系全局的战斗。12 月 1 日凌晨，中央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下达紧急命令，要求一、三军团坚决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深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以保证我野战军的全部通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战斗进入白热化，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都亲自到前线督战。彭德怀自率二个团连续三天三夜没下火线，两个团长和指挥员大部分战死。林彪的一军团也损失惨重，四团政委杨成武负重伤，五团政委易荡平丢失阵地自杀。七天的苦战之后，红军终于渡过湘江，在他们身后，飘流着层层尸体，文件和钞票。

战后部队不足 4 万人，博古深感自己责任重大，痛心疾首，拿着一只手



枪朝自己比划，被聂荣臻阻止。

确实，红军的条件坏得不能再坏：他们没有时间休整；没有充分的粮食、药品；也没有主动消灭敌人的既定计划。更令人奇怪的是他们还带着大批的辎重物资——几千名挑夫和一部分战士挑着印刷机、制弹机、印钞机、X光机、文件柜、银元、金条、备用枪炮等。这都是李德和博古的主意。埃得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认为红军是拉着整个国家走上征途。彭德怀曾气愤地质问：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象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简直胡闹！人们已经开始怀疑博古、李德指挥的正确性了。

然而红军必须为自身生存而战，激越的精神使战士们产生了超常规的威力，他们奋不顾身，克服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竭力摆脱敌军烦人的追扰。湘江大败后，红军队伍更怀念毛泽东的指挥，他的意见逐渐得到领导成员们的重视。毛泽东反对红一方面军继续谋求与贺龙、王震二、六兵团会师的计划，主张进军贵州省机动作战，重新建立根据地，在随后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毛泽东都坚持这种观点。

他渐渐得到了同志们的支持。大多数军事领导人和一部分政治领导人，包括与博古关系密切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都同意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这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原因，也是毛泽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基础。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生死转折点。回头看历史，几乎每个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它更是毛泽东本人的转折点，当时的决策者们包括毛泽东本人的作战方式代替了博古、李德的作战方式，他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围而歼之，打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战。这些因此取得了决策权。尽管凯丰质问毛泽东：“你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还是取得了一系列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委员、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也许职务并不重要，中国的长征史研究专家李安葆曾发表文章反驳“毛泽东在遵义没有获得最高领导”的观点，他的文章中引用了邓小平的话：

“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确实，遵义会议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显著地位不仅在于毛泽东重新成为领导人，而还在于他的主张赢得了胜利，他再次取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机会。他厌恶教条而以独立的态度和实用的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决不像李立三、王明那样顺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他懂得中国社会，了解中国革命的规律，因而总能把进攻和退却巧妙地结合起来，以一种准确的战略引导革命。

当然，他也必须面对实际，十天后，他直接指挥的第一场战役就使他处在严峻的境地。1935年1月28日，毛泽东指挥红三军团在青杠坡投入战斗，目的是渡过赤水河。但这是一次错误的指挥，他使彭德怀的部队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整个红军危亡于旦夕之中。因为对手不是原先估计的贵军——他们都是“双枪兵”，不堪一击，而是训练有素的川军精锐，包括郭勋祺的“模范师”，兵力也超过原来推算的二倍，后来又增加到四倍。朱德、刘伯承到前沿督战，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指挥战斗，连干部团也动用了，结果仍然令人失望，军委召开紧急会议——这是军委战斗中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紧急会议，它决定红军撤出战斗，已过赤水的林彪部队返回西岸，急行军至土城。这一仗，红军损失近万人。

下一步，重返贵州，再渡赤水，毛泽东开始牵住蒋介石的鼻子，夺回失

去很久的主动权，他命令红军忽而前进，忽而后退，一会走路，一会绕山行，令人晕头转向和迷惑不解。他们翻山越岭、架桥过河，以世界上所有军队没有过的速度强行军，连留学过日本军事学校的蒋介石也无法判定红军的意图，连他的情报人员也不能及时准确地为他提供帮助。红军终于取得长征后的第一个胜利，他们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消灭贵军王家烈部八个团。毛泽东十分兴奋，挥笔填写一首《忆秦娥·娄山关》抒发压抑已久的心情：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据解释，这首诗反映了毛泽东深感革命艰难而又对前途充满希望的心情。

红一、三军团依旧是作战的主力，他们一路上抢占渡口和要地，筑起保护红军的屏障，给刚掌权的毛泽东得心应手的速度和勇敢。特别是彭德怀率领他的士兵跑步前进只比对手早几分钟占领娄关山的行动，给新的领导者送来了捷报。这意味着红军的转折。尔后，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扬眉吐气的部队乘胜作战，再击溃黔军三个团。此战役国民党损失 5000 人，蒋介石自己也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同样功勋卓著。他们的急行军保证了红军及时地渡过金沙江和大渡河。林彪亲率部队佯攻昆明，竟使对手信以为真，蒋介石收缩金沙江兵力增援云南，结果毛泽东赢得了时间，红军用了九天九夜的时间有条不紊的越过金沙江。林彪还指挥部下杨德志团、耿飏、杨成武团分别夺取安顺场和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此后，红军跳出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大圈子，长征已快迎来曙光。

在长征中，林彪、彭德怀曾从各自不同角度提出不同于毛泽东的意见而受到严厉批评。林彪被毛泽东指责为年幼无知，而彭德怀则被说成不满毛泽东的右倾主义，在以后屡受责难。

林彪抱怨毛泽东让部队尽走冤枉路，他说红军不走捷径、只走“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彭德怀没有如此激烈的言辞，但他确实有类似的看法，他对战局提出过自己的意见，认为红军的急行军影响了战斗力。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埋怨情绪，如对青杠坡战斗的看法。

只是年轻气盛的林彪胆子太大了，他公然打电话、写信，说毛泽东指挥军队作战是不行的，应当解除其指挥权，要求毛泽东和朱德下台，让彭德怀指挥中央红军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随之召开的会理会议批评林彪，确定下一步方针。毛泽东点了林彪的名：“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走弓背路是必要的。”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

表现了他的果断和自信，这是他的个性和魅力所在，没有这一点，很难驾驭混乱到极点的中国，也正因为如此，他能战胜对手，击败敌人，抵住共产国际权威们的压力。

毛泽东在批评林彪的同时，也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他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要承担重大责任。连发高烧的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也被用担架抬着参加会，可见会议气氛之紧张。问题是。为什么他后来对林彪没有过多介意，而对彭德怀却耿耿于怀，以致在以后的合作中四次提到这件事？这还是一个历史的疑问。

不管怎样，彭德怀坚决执行了中央军委的指示——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指示。他是个称职的指挥员，也是个忠诚的革命者。在不久出现的毛泽东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他坚决支持了毛泽东并亲率部队保卫毛泽东的安全。

这次分歧看起来是关于红军行军路线的争论。毛泽东主张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但实质涉及革命的前途和张国焘要分裂中央的问题。最后，毛泽东从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那里得到他们准备分裂和危害中央的电报，决定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从彭德怀的三军团司令部迈出脱离危险的第一步。

张国焘，共产党成立时曾分管组织工作，是十二位中共创始人之一。后来，他连续当选为中央第二、四、五、六届中央委员。1931年，他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总负责人。在蒋介石大规模地围剿行动后，他指挥红军撤出鄂豫皖，新创川陕革命根据地。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是拥有8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

至今为止，尚没见到张国焘命令他的政委陈昌浩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原件。据当时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后来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吕黎平回忆：9月9日，张国焘给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发密电，要他劝说毛泽东等人南下，如不听，监视其行动，若再坚持北进，彻底解决之。吕黎平看到此电后，立即告诉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立即转告了毛泽东。党史界为此一直争论，但张国焘确实想吞并红一方面军和控制中央。

彭德怀和聂荣臻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它确实是毛泽东遇到的新危险，朱德在后来回忆长征时认为长征中最可怕的并不是蒋介石指挥的数十万大军和令人却步的自然障碍（如雪山、草地和江河等），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企图几乎消灭掉这支走过近万里的红军。

他派秘书黄超给彭德怀送礼，也亲自请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等人吃饭，希望他们能站到他的阵线上；他仗恃自己的军队要求补选中央委员，改组中央，要中央总书记或者军委主席的职务，毛泽东和中央为顾全大局把病中的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他。

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碰到的最困难、最残酷的事件之一，也是最黑暗的时刻。

1935年9月9日夜两点钟，已得到叶剑英密报的毛泽东命令部队紧急出发，两天的急行军后到达俄界，与先期到达的一军团会合。9月12日，中央在这里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

在毛泽东北上后，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哪有红军自己打自己的道理”阻止了陈昌浩的追兵，但李特的特务连还是追上了，毛泽东对他说：“你回去吧，我们不久还会再见的。”历史像故意承认毛泽东的预见性似的，1936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到达会宁与红一、二方面军会师。1938 年夏天，张国焘——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副主席，背弃了自己的信仰投奔了国民党。他没能带走一兵一卒包括警卫员。尽管他当时受到特务头子戴笠的优待，后来却一名不文。1979 年 12 月冻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座养老院里。

红一、三军北上时的主要的将领是彭德怀和林彪。这时的军队人数，包括老弱病残不足 7000 人，而且还时时有危险相伴，张学良、毛炳文和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一直尾随追踪。在红军到达吴起镇，与红 26 军的先期到达的红 25 军会合后，毛泽东建议“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并找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商量打不打和如何打的问题。讨论了一个晚上后，决定打，由已任陕甘支队司令员的彭德怀指挥。21 日红军利用吴起镇西南的高原深沟地形击溃了马鸿宾部 25 师骑兵团、东北军白凤翔部的骑兵团和另外的三个骑兵团。这是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的最后一仗，它结束了敌人对红军的追剿。

战后，毛泽东赠彭德怀诗一首：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战后写诗赠给军事指挥员。这是对彭德怀勇气和才能的赞赏，是同志间感情的流露，也反映了毛泽东走入根据地，远抛危险的兴奋。

### 第三章

日本历史学家认为：日军侵华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发展机会。

“领袖不是委任的，也不是能抢得来的，而是在实践斗争中锻炼成长受群众信赖而产生的。我与老毛共事十年，他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是彭德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过的话。

延安，领袖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

在中国，能成为革命领袖的人既不是单纯的理论家，如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也不是象朱德、彭德怀、林彪等能独挡一面、叱咤风云的军事指挥家，而只能是文武兼备的战略家，这就是毛泽东。他以坚实有力的实践击破外来教条，又以高超的指挥才能折服军事家们，从各方面来说，毛泽东都是众望所归的领导人。

虽然如此，他仍受到挑战——来自王明的挑战。“墙上芦苇，头重脚轻很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毛泽东就是以这种辛辣而又聪明的手法拉下王明理论家的外衣。更重要的是，他力拒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多次压力，开始摆脱共产国际中心的指挥而使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

现在，他要制定新的战略，为即将到来的大发展阶段作好准备。日本占领东北已经5年多，中国的内部纷争仍未停止，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停止内战。历史正给毛泽东提供机会，这就是动员全国的先进力量一致抗日，并通过这种方式设法止蒋介石放弃对红军的“围剿”，使根据地和红军得到新的扩展。

这就是最大限度地鼓动全中华各民族力量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政策。也许它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确立的，但毛泽东3年前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做出了行动：1932年4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后又发表宣言，愿意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但由于后来他的职权被王明派剥夺，其主张也就无人问津了。

1935年11月，张浩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新指示。随即，中共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议即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它规定共产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是首先建立起中国西北地区的合作局面，蒋介石被排斥在外。不过，他在根据地和红军中确实没有一点美好印象。这是两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直到张学良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扣押蒋介石时，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连续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讨论和比较各种可能性，最后决定和平解决。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于12月16日赴西安。同时，共产国际也发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放蒋回宁的指示。此后，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共产党人得以出入蒋介石统治区，一部分人开始公开工作，但根据地始终禁止国民党势力踏进一步。

统一战线虽然是后来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也确实增加了共产党人的困难：昔日交战的对手成为今日合作的朋友，而且双方的力量又很悬殊。在如此迅速多变的情况面前，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人手足无措。有人认为这是阶级投降，以至去江南传达中央指示的陈毅差点被共产党的游击队处死。尽管人们一直赞扬毛泽东像艺术家一样用又合作又斗争的微妙的手法成功地保持主动，甚至一些国民党人也这样看，但在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干部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带来一套抗日方案，他和毛泽东

发生了分歧，但却得到许多中央委员的赞同。

王明是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帮助中共中央加强贯彻国共统一战线政策的。行前，斯大林告诉他：“不要害怕共产党人会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去，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战争中去。”言语背后，暗含中共在特殊条件下可以放弃独立自主、迁就国民党、全心全意支持蒋介石政府抗日等右倾倾向。这样，中国就能更有效地拖住日本，减轻苏联对日、德两线作战的恐惧。

彭德怀没有反对王明的主张，也没有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他与毛泽东在对日作战的方式上有不同意见。毛泽东把作战方针的重点放在游击战上，而在彭德怀看来，要阻止日军的进攻，特别在国共两党合作之初，需要表现自己的实力、诚意和抗日的坚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因此必须打几个大仗。他虽然对毛泽东的分兵进行山地游击战有异议，但也拒绝八路军打阵地战，主张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他的愿望和想法是有道理的。与毛泽东不同的是，他没有把蒋介石在抗日中削弱共产党的打算看得很重，或者说他也过分相信了蒋介石及其军队的力量。彭德怀一度认为太原能守得住，西班牙小小的马德里还守那么长时间，坚守太原两年没问题，还可以借此反攻，成为华北抗战的堡垒。他没有打持久战的明确认识，也确实没想到要打那么久，那么残酷，或许还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直到1938年彭德怀才改变看法。

这就是1937年10月华北军分会指示的背景，因为在此前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大家对红军作战方针存在不同看法。为此毛泽东还找彭德怀个别谈话，并在此后多次电告彭德怀，可这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实际上彭德怀没参予军分会指示的制定和下发，当时他正随周恩来在保定、石家庄做统战工作。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是在“自述”里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不相信蒋介石，他知道国民党固然开始了抗战，但它是片面抗战，中间包含极大的危险性，抗日的胜利最终要靠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和武装。但是红军目前只有几万人，在数量、装备和技术上都不如国民党军和日本人，八路军暂不可能在正面战场取得大的军事成绩。亦绝不能集中进行运动战和阵地战。红军一要估计到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二要估计到蒋介石借刀杀人的可能，三要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包括阶级革命的使命和民族解放的使命。因此，红军应以保存实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为中心任务，争取在战争中巩固和扩大自己，逐步取得实力领导地位。作战方针应是避免打硬仗，依山傍地，独立自主地进行山地游击战。

应该说这是长远和明智的考虑，蒋介石确实想在抗日过程中除掉八路军。他常常这样坐收渔人之利，曾成功地让许多地方军阀的部队损失在对红军的战斗中。此时，他的目的是在抗日过程中至少耗掉共产党军队力量的五分之二。

但是，八路军还是打了大仗。平型关战役鼓舞人心，却因为双方的伤亡几乎为一比一，对于只有几万人的红军来说这种仗不宜多打。这可能也是后来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不断地发出警告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必须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整个华北必须以游击战为唯一方向，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是游击战。

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挑战来自王明而不是彭德怀，他和王明之间的分歧日见尖锐。

不过，毛泽东自己一开始也没有否定王明的主张，至少他没能有效地抵制住王明的优势。王明满足了军事指挥员们和部分中央负责人的愿望——他们都主张和国民党一起进行大规模统一的正规战争。同时王明的主张没受到怀疑和抵制还因为他的身份不凡，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带回的主张基本上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见。

毛泽东受到孤立，中央领导成员几乎一致赞同王明的主张。

年轻的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专家杨奎松认为毛泽东处在无力还击的地位还因为他的统一战线理论尚不成熟，虽然他已强调独立自主和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但中共毕竟只有三、四万武装和陕北一隅之地，如何既能保持与国民党合作又能保证自己的力量不受损失，却是毛泽东的难题。王明关于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的建议给毛泽东暂时同意采用“抗日高于一切”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选择了与王明合作的道路，这也说明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依然有很大权威，要确保自己在党内的领导，与共产国际保持一致甚为重要，但他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时刻警惕着蒋介石可能制造的不测，毛泽东主张统一，却没有忘记斗争。这一点早在洛川会议上已有表现，当时他说：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和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

1937年12月的会议没有形成决议，据说是因为负责起草决议的王明忙于统战工作没有时间来做。很显然，王明的意见占了上风。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批评洛川会议以来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会议认为国共两党的目标基本一致，决心同国民党进行亲密的合作，不仅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为抗战胜利后共同建国。毛泽东提出了与王明相反的意见，重申并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刘少奇也保留看法，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他在1936年就提醒人们注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常委会会议最后接受王明“一切均服从于抗日战争，一切为了民族统一战线，一切通过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但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

十二月会议后，中央批准成立三个局，即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项英负责的东南局和王明、周恩来、博古主持的华中局。他们的管辖范围内分别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聚集地。华中局——素有第二政治局之称的重要工作是处理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

忽视毛、王二人之间的分歧是错误的。毛泽东并不完全同意王明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在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同时，不能忘记斗争，要以斗争求团结，不能团结而不斗争。只是他还无法说服对方。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仍然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毛泽东在致力于阐明自己的主张，他开始更精细地研读马列著作——“有人说我是狭隘的经验主义，逼得我多读书”。这些著作由博古按毛泽东的需要圈定顺序后交给新成立的翻译小组。翻译小组的负责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吴亮平，当时他近30岁，经常面带笑容，他机敏聪明，在苏区内都享有优秀党员的声誉，而且在党内已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名望。毛泽东还非常看重于理论写作和普及他的战略策略观点。1938年前后是他写成自己代表作最多的时期之一，如《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他的分析是冷静和客观的，得出的结论也是令

人信服的：中国不能速胜，也决不会亡国，中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必定经历极为痛苦的过程。这期间，中国只能靠艰难的持久战来支撑危局。这种想法出自上过几年师范的毛泽东，却令军事家们叹服。它不仅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作战的指导，也为国民党将领所注目。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仔细研究，将《论持久战》的主要观点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连赞高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也建议将《论持久战》作为必读书下发到国民党军队中的中高级官佐，蒋介石加以采纳，当然，作者的姓名被划去了。不久，《论持久战》被译成英文。

毛泽东的观点得到现实的有力支持，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和兵力迅速扩大，到1938年底，根据地（包括新四军在内）已有6块，兵力近20万，而无能的蒋军向西南的退却更使中共领导的军队成为华北抗战的主体。毛泽东为共产党带来的新希望使他重新赢得同志们的支持，也终于得到共产国际的肯定。实际上，共产国际并没有忘记毛泽东，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共产国际已怀疑它的顾问李德在中国所作所为的正确性，认为毛泽东有丰富经验，“是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当今闻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七大上，毛泽东被颂扬为和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等一样“是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共产国际的刊物和苏联《真理报》专文介绍毛泽东，称他为“中国人民传奇式领袖，来自于人民，深深懂得老百姓的心理”，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在党、红军和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显然，共产国际认为毛泽东是中共领导人的合适人选。所以，当王明回国后造成凌驾于张闻天、毛泽东和中央之上的局面后，共产国际警告王明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问题：“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等，不要再争了。”

传递这个意见或命令的是王稼祥。

王家祥参加了长征，他拖着长征前就已受重伤的身子勉强到了陕北。由于红军当时医疗条件差，医生们没有把握保证他的生命，王稼祥不得不辗转赴苏医病，同时承担党中央委托给他的一项任务——与共产国际接上关系，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他也谈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领导人的看法，在与共产国际的实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讨论中，王稼祥极力赞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实行一种与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因为只有统一战线中国才能经得住日本的冲击，而毛泽东又坚持党的独立性，所以也不会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右倾错误。

王稼祥的回国帮助毛泽东克服了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错误主张。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认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共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但蒋介石没有忘记自己打击中共军队的目的。他知道“日本仅为中国身上之跳蚤，而共产党则为心上之毒疮”，不消灭共产党他死不瞑目。他试图



把共产党合并掉（实际上他一直对外宣传共产党投降了他），在中国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和一个领袖。不久（1939年），他的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山西新军即抗日牺盟军和决死队、八路军总部施加压力并发生武装冲突。毛泽东也不轻言退让，他在对《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中警告国民党：不要太横行霸道了，要收敛一点。他命令各地武装反击自卫。这个事件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共关系的紧张恰恰验证了毛泽东的预言，共产国际与王明设想的国共两党间亲密合作的关系化为泡影。毛泽东重新坚持自己的看法，放弃争取在组织上与国民党结成密切关系的努力，开始在军事、政治、根据地及民众领导权等方面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共产党来说，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不在于同蒋介石相处的好坏，而在于能否扩大自己的力量，借此实现和拓展对全国大多数人的领导而成为民族领袖，把抗日的胜利与人民胜利连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获得惊人的成功。

斗争的成效不仅在于阻止蒋介石进行大规模分裂，而且还在于找到了日后的对付办法。著名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原则便是其中之一，“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有理、有利、有节”等也是斗争的结晶。从这里看，称毛泽东为策略家一点也不过分。但是，蒋介石也确实给共产党造成威胁，他控制的新闻机关指责毛泽东的部队医院里没有伤员，对日军是游而不击，而且专打友军。这种说法惹恼了延安的革命者们，数月之后，彭德怀负责发动的百团大战成为反驳蒋介石最有力的证据。

但是，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却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一直定论不一。

1940年前后，德国成为世界的横空独马，它迅速吞并大半个欧洲，并有继续前进的趋势，这使与它的盟友日本作战的中国首脑蒋介石身价倍增，更得美、英、苏等国的看重。蒋介石在得以从容对外情况下，施加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压力，说他们不打日军专打友军，默许自己的军队制造摩擦事件，消灭小股的共产党武装；而日本也不失时机地加紧华北治安强化，以“三光政策”反复“扫荡”，到使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日子越过越难。对此，朱德、彭德怀负责的八路军总部决定实施强有力的反击，组织大破袭战役（由于朱德赴延安，百团大战是彭德怀指挥的）。总部一面电令各军区准备，一面以“十万火急”的电报方式报告延安的军委。

开始投入的兵力是22个团，但参加的部队越来越多，共计105个团，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听取作战情况汇报时脱口说出“百团大战”，没想到成为了历史名称。此后，大破袭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这次大战在敌后抗战史上是空前的，它取得的战果足以振奋全国人民，对日本和蒋介石也都是有力的反击。1940年8月，彭德怀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百团大战为华北创造一个新局面。当时他绝没料到随之而来的将是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人好像刚刚认识到共产党军队的厉害，本来就进行的“扫荡”更残酷了。虽然毛泽东早在他的《论持久战》中已预言到相持阶段到来后的艰难，人们还是有一种埋怨情绪，说彭德怀暴露了共产党的力量，使日军把重点转向华北，八路军作战中损失了许多兵力，造成根据地的巨大困难。

事实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地的吃穿医药等都成了问题。黄薇，当时根据地唯一的华侨女记者，曾采访同情中国抗战并亲率医疗队援华；进入八路军作战区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告别时，黄薇问他有什么要求，白求恩的回

答很简单：快向海外侨胞呼吁，捐些药品送到前线，这是我的最大要求。彭德怀则在1941年初把游击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作为当年度的中心问题，命令各地完成自给自足状态。那时，他自己正在吃野菜、野果和树皮。他还建议部队把好吃些的榆树皮留给老百姓。

但是，对彭德怀的指责还是越来越多。彭德怀的指挥固然让日本人吃了苦头，许多人还是认为他加速了困难的到来，也增加了日本兵对根据地的压力，实际上是帮助了蒋介石。1943年他到延安后，又被围批（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发言者的声音很刺耳：你目无组织，自傲抗上，一贯站在毛主席的对立面，自作主张，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彭德怀不服气，心里有情绪，他想发火骂人：这样做算什么！共产党人应该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更不能借此打击自己的同志，不然还叫什么共产党人，老子不服！

据长期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师哲回忆：彭德怀在中共七大上作的军事问题的专题发言中，除了总结八路军抗战的伟大成绩和经验教训外，还深刻地解剖了自己，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就百团大战等问题承担了责任，承认了错误。但毛泽东却不太满意，说彭德怀“承认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也难说是心悦诚服的！”

中共七大之后，中央军委又召开座谈会，对彭德怀继续进行了批评，但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革命。

尽管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至今尚有争议，却没有人否认他对抗日战争作出的巨勋。他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前线指挥官，当时在延安学习的人都感觉前方实际负责指挥的是彭德怀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朱德总司令1940年回延安就留在延安指挥）。他们来去延安总是匆匆而过，甚至连见夫人的时间都不留，浦安修为此还大病一场。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正与彭德怀下棋的警卫当即以水代酒，恭恭敬敬地递到他手里说：彭总，头上是天，脚下是地，你为抗战出了大力，这些天地共知，如今胜利了，我和小刘代表我们的爹妈和村里的父老兄弟们敬您一杯水酒吧！彭德怀接过去，双眼含泪，一饮而尽，说：我彭德怀有么子能耐，一个穷娃子出身，人称我是有功之臣，“信得过的将军”，哪里担当得起哟，我只能一辈子做人民的上马石。

毛泽东的倔强世人皆知，他决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甚至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据说这是一种喜挑战爱冒险的心理。由于他和王明的冲突在组织之外尚无定论，而共产国际又同情王明，劝告毛泽东顾全大局（实际上是顾全苏联利益），改变策略，毛泽东心生厌烦，硬性勃起：“这些人，不知中国国情，便要指手划脚。”他决心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抑制王明在党内的影响。皖南事变即是这个巨大工程的契机。

事变之前，国共两家正闹分歧，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反投降，警告人们不可过分相信蒋介石。毛泽东也屡屡要求新四军负责人项英执行他的指示，要敢于在联合统一战线中执行自卫原则，但一直不见实际行动。毛泽东十分生气：“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这是指赞赏王明的项英不东进日占区发展根据地而向国统区扩展，而在向国统区发展时又不坚决地执行自卫原则反而欲与国民党交好而丧失壮大新

四军前途的心态而言的。毛泽东认为，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新四军——作者注）不应向友党（国民党——作者注）后方行动，而应向敌后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在战争区域，特别在敌人后方，我方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反共顽固派。

共产国际的看法与毛泽东相反，苏联也是如此。它当时的最大恐惧就是日本和德国对它实行两线作战，中国若能缠住日本，当是解除苏联之忧的有效办法。朱可夫将军被急选为赴华军事总顾问，他的任务是全力支持蒋介石，劝说中共保证统一战线的不破裂，必要时不惜让步，以维持全中国的对日作战。这与王明主张同出一辙。

后来，毛泽东亦或自豪亦或不满地说：“我们从苏联得到的援助除马列书籍外，一无所有。”言外之意，苏联援华物资全给了蒋介石。

但蒋介石对苏联的援助并不领情，皖南事变使新四军九千人被围，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六千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份被俘。毛泽东十分恼怒，坚决主张回击：“蒋介石已把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不能怕分裂。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而季米特洛夫、朱可夫和苏联驻华大使均要求中共要保持冷静，不可主动破裂两党关系。毛泽东激动地说：“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就是要与国民党打。”他大胆地直接抵制和否定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对国民党针锋相对。首先，以不怕决裂的态度对国民党实行全国性的政治反攻，在严正抗议国民党行为的同时，通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等进行宣传，揭露蒋介石反共面目；第二，重建新四军军部；第三，做好相应军事布置，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全面破裂国共合作的行为。在中共强硬态度和有效反击面前，蒋介石被迫妥协，在全中国和全世界输了理，中共赢得了广泛的同情。这是中共力量上升的真正开始。对此，毛泽东十分兴奋和满意，连续发表文章要求全党总结成功经验，尖锐讽刺某些人“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指导革命，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

1941年5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诉他“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6月9日，毛泽东再告彭德怀：“我军仍须在不可不打（即必须打）又不可打得太凶（如百团大战那样）的原则下部署远后及近后方之配合。”这正是当时复杂时局下所要求的正确对策。

对共产国际意见的拒绝意味着对王明观点的否定。实际上，当时王明在延安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虽然季米特洛夫警告过他不要与毛泽东争权，但并没有批评他，也没否定他继续做中共的领导人。六届六中全会后，他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他一直参加中央会议，也提出重要的意见。人们固然佩服毛泽东，他总能面对实际提出正确的策略，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做法很聪明。但他没有留过学，人们心目中仍视王明为了解马列主义理论最多的人，有马列主义理论的解释权。1940年3月，延安第三版印刷王明六年前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准备作为延安各校的党史党建教材。同时，他的报告也很受欢迎，在苏联时他就具有这种演讲才能并因此在莫斯科工人中有一定名声。至1944年延安整风之后，毛

泽东才比较轻松地说如果没有整风运动他就不敢来中央党校作报告，这是毛泽东的谦虚之词。确实，王明在苏联学习多年，又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很多，又有共产国际在后面的支持。而毛泽东则一直从事中国的实际斗争，环境紧张而艰险，无法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列著作。相比之下，王明的本本主义十分盛行。不彻底清理党内的思想不行了。

1941年，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整风学习，毛泽东与王明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尽管王明拒绝承认自己犯有错误，但他在党的会议上逐渐受到孤立，这情况完全不同于1937年他刚回国的时候。他以生病为借口退出争论，据说是心脏病和慢性汞中毒。这也是王明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开始。

整风运动由此发端，并给以后的中国革命带来巨大影响。整风运动使全党认识到，应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以教条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全党在这样一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毛泽东思想逐步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全党的团结首先是领导集体内部的团结。这一团结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的考验和选择，终于在延安形成，中共七大的召开确立和巩固了这一团结。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等一大批革命的领导人，像众星拱月似地团结在毛泽东周围，把他视为自己和全党的领袖，也无疑增添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必须承认，中国最终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不应该把一切功劳都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决不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

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在1927年至1949年的22年中，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了使中国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策略。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毛泽东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中国革命长期斗争实践的选择和必然结果。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以他在革命实践里表现出胆略魄力、领导才能、理论素养和个人魅力，吸引着中国革命的人们，团结了一大批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和坚强支柱。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彭德怀等是其突出代表。他们在参与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亲身体会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和据此作出的正确战略策略选择，从而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拥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首要领导地位。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坚决抵制和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批判。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这是中共中央的一次扩大会议，到会的中央委员及中央各部门和各地领导干部共56人。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阐明了党的正确路线，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问题，要求全党充分认识和认真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对于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决定了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王明

的右倾投降主义被击败，他表示今后定要像星星拱卫月亮般拥护毛泽东。这仅仅是语言而不是行动，刘少奇在会上批评王明提议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他也许有批判的权利，因为他一开始就对这种观点保留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当时插话说：“少奇同志说得对。”

在这次会上，彭德怀也讲了支持毛泽东的话：“领袖不是委任的，也不是能抢得来的，领袖是从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是在艰难困苦、错综复杂的斗争实践中证明其坚强正确因而受到群众信赖而产生的，我与老毛共事十年，他基本上是正确的。”

会后，王明的长江局书记被撤销，增设中原局，由刘少奇接任书记，重新确立新四军的指导思想，即主动、放手、发展。这时刘少奇已认定中共的领袖只能应该是毛泽东。

“我们共产党员要成为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就要学习毛泽东，不要学王明。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解决中国问题的金钥匙。王明却是披了外衣撞骗，是江湖上的狗皮膏药，唱来好听用了不灵。”

这是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开宗意旨，它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当时所有重要文章必须交毛泽东审阅，一般约一星期才能退回，但他只用了二、三天就阅完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批示说此书写得很好、很重要，提倡正气，压倒邪气，应尽快刊登。

刘少奇真诚地树立毛泽东的形象，尤其是在华中指导新四军工作时。据后来成为国防部长当时任新四军师长职务的张爱萍回忆：刘少奇在淮北经常以报告、谈话等讲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和毛泽东对党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他反复阐明对比，证明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向人们解释说：“党的工作要一些人在那里动脑子，否则不行，虽然共产党的干部很会做实际工作，但要把马列主义应用到中国，并把丰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就要靠毛泽东。他是从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为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我们要向毛泽东学习，他在中国革命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师哲说，在延安时，毛泽东十分信赖刘少奇，少奇也十分尊重毛泽东，他在自己的一切工作和活动中，总以毛泽东的思想为原则，许多问题和事情，少奇都是事先向毛泽东请示，事后汇报。他不管事情办得如何，一旦发现毛泽东有不同意见，总是回过头来严格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设想去尽力办好。他们紧密配合，团结了全党同志。

思想、意志和权利正在集中。领袖集团正在形成。

延安的革命者都已经认同，在中央领导人中，刘少奇是较年轻、较成熟、较老练的最有发展前途的一位，大胆点说，公认他是毛泽东的坚强助手和将来的继承人。

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毛泽东把1931年至1934年说成是错误路线统治时期，但越来越多的人争相颂扬毛泽东，包括与他出现过巨大分歧的来自于苏联东方大学的布尔什维克们：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

李维汉说，选择毛泽东做领袖是有所比较的，同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等相比较，毛泽东显然高于其上。到1943年，毛泽东已确立领袖地位，除他和刘少奇、任弼时之外，其他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都被取消了。

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人都极大地支持了毛泽东。

王稼祥，第一位从教条主义宗派中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人。因为他在苏

联学习五年而踏上王明开的班车。1931年，他自苏回国的第二年，被任命为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时他才25岁，他很快为毛泽东的魅力所征服，对其深表敬佩。1932年，毛泽东在宁都被解除军事指挥权时，王稼祥是积极的反对者，他为毛泽东陈词辩护。毛泽东很感激，反过来安慰王稼祥：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到后方去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的。

王稼祥确实与解职后的毛泽东保持密切联系，虽然没有确切资料说明他们关系的程度，但许多领导人的回忆都肯定王稼祥对毛泽东很亲近。在随后的长征中，他率先批评博古，躺在担架上下定支持毛泽东上台的决心，他对聂荣臻说：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我看，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据说，聂帅同意他的提议。

六届六中全会后，王稼祥是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938年—1943年间，他和毛泽东联名发出了数以百计的指示和文电。

但是他知道自己在毛泽东面前处的地位，他的脑子很能思考问题，一脸的真诚意味着不爱出风头。他先后处理了大量的党、军、根据地的事务，提出过重要见解，不论大会、小会或个别谈话，他总是强调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作用，讲毛泽东是思想家、战略家，是全党的领袖。

1943年“七·一”前夕，毛泽东走到王稼祥的窑洞，告诉他是否可以写篇文章纪念党的生日，同时提醒他注重针对现实、总结经验。不久，王稼祥抱病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令人注目的是他在文章中开始论述毛泽东思想，他是正式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第一人。此时，他已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到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他竟也落选了。毛泽东认为这太过分，亲自向代表们解释，无论如何要选举王稼祥为中央委员：

“大家知道，遵义会议是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如果没有洛甫、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也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作用很大。”

最后，王稼祥当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中央委员。1947年，他病愈重新工作，出任东北局城工部长，他再没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与王稼祥不同，江南才子博古一开始就和毛泽东发生激烈冲突，他不相信穿山沟的领导者能弄懂马克思主义，他依恃李德完全改变了毛泽东的做法。但他最终还是倒向了毛泽东一边，在长征中，他激烈地反对过张国焘，支持毛泽东的北上主张。在延安整风中他改变了自己，重新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1946年，他因飞机失事而成为著名的四·八烈士。毛泽东称他们“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这是中共第一批因飞机失事而牺牲的高级领导人。

尽管博古在抗战后又和王明一起对抗毛泽东，但他敢于承担责任，正视和痛改自己的过去，因而得到毛泽东的宽容，他在中央委员会中一直处于受信任的地位。丁玲曾说毛泽东很爱惜博古。博古先后担任过中央组织部部长、长江局、南方局组织部长，他还是新华通讯社第一任社长、中共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1941年他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的负责人。他埋头干自己的事业，但因和王明的关系，他的工作还是在整风中受到指责。说他没有贯彻党的路线、对群众活动登载太少、没能担负起整风中的组织者责任等。纵有过分之词，博古还是作了自我批评，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

事实上所有拥护赞扬毛泽东的文章都刊登在博古负责的《解放日报》上。

张闻天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者，他在 19 岁时就走进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行列，那时他还在文学创作、翻译方面颇有名气。后来，张闻天长期担任中共重要领导职务，1935 年至 1942 年间，他是毛泽东的主要合作者。

张闻天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他在苏联学习和工作五年多，曾习惯于按苏联模式来思考和实践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但在长征中面对毛泽东时，他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身边，他帮助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自己的地位，这一直是让人瞩目的功绩。虽然他在此之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但他却没有权力欲望，这恰恰给毛泽东提供了他在与对手斗争时最需要的自由。因此，毛泽东虽然不是总书记，却取得了中共的实际领导地位。正是这种地位使毛泽东能在张国焘造成的危险面前镇定自若。他精思熟虑，否定张闻天和朱德愿把自己职位让给张国焘的建议，只允许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职务给张国焘，这个职务控制不了党也指挥不了红军，而周恩来本人正患重病，已无法担负重任。

王明回国后曾不满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一手控制局面，指责他滥用中央名义（当时，多数中央书记处成员不在延安，中央的决定实际上是毛泽东的决定）。对此，毛泽东改用与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人联名的办法发布指示，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无疑增加了毛泽东的力量和合法性。

后来，毛泽东高兴地承认张闻天是个开明君主：“洛甫这个人是不争权的，是个好同志。”对此，张闻天说：“这是对我的最好评价。”

1935 年 12 月，张闻天在自己的窑洞里主持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讨论刚从苏联回国的张浩带来的指示和国内形势及对策。领导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争吵激烈。博古不满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并引用斯大林的话证明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不喜欢这种教条式的争论，他态度强硬，反驳博古：斯大林说，难道我们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孝、对祖先不孝吗？！张闻天的总结发言支持了毛泽东，他主持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体现了毛泽东的主张。会议还决定刘少奇去北方局。

张闻天的个人品质换来一个又一个的职务，在延安，他先后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日常工作的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主编、马列学院院长、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非常尊重毛泽东，所有重要事情都要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反复领会其意图，为此他得到一个受讥讽的称呼“墙头草”。据研究张闻天的专家们证明，他辩白的方式是常写对联：根深不怕风摇动，身正何愁月影斜。“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这是他一生的至真追求。

毛泽东一点也不放松寻找对王明要害的批评活动。1941 年 5 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王明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他还坚持认为 1931 年—1934 年间党的领导人犯的是“左”倾路线错误。张闻天深知自己应负的责任，他在 9 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检讨，并请求辞职。不久，他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召集人和中宣部长职务。

他在整风运动中肯定受了批判，他的地位急剧下降，就连他那篇在党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论待人接物问题》也被说成不讲阶级观点，遵义会议上鼎力支持毛泽东的功绩亦被抹煞，不为人提。1942 年 1 月至 1943 年 5 月，他因缺乏实际经验而到陕北和晋西北补课，实地调查。

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党史教授认为：张闻天对整风的某些方面不太理解，似乎有点逃避，但他确实体会到了毛泽东提倡的调查研究的重要和正确。此时，正是整风的高潮。

不过，张闻天并未忘记向人们宣传毛泽东。在中共成立二十一周年纪念日，他在陕西省神府发表纪念讲话，不急不慢娓娓道来讲了几个小时的。全部内容都是歌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无可比拟的伟大作用。他反复强调，20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如果离开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反之，今后的中国革命，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不管目前多么困难，最后一定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20年来的最大收获和最大成就。就是形成了经久考验的、英明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这是中国革命必然会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在纪念党的生日时全党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

然而，17年后，他却又警告毛泽东：滥用权威必然导致个人崇拜，给党和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恶果。“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提意见的局面。”

在张闻天发表讲话的同一天，朱德的文章《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出现，他说：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和在他培养教育下的大批富有战斗经验和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忠诚勇敢的干部，我们已经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支持者和负担者。我相信中共的胜利将是必然的。

一个人的作用只能体现于某时、某地或某种环境中。整风后，张闻天虽然还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不再担任中央职务，以后，他一直从事地方工作至1955年任共和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他在这个位子上干了4年，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他被撤职罢官。

显然，还有更多的人赞扬支持毛泽东，翻开1941年至1945年的《解放日报》便可一目了然。他们说毛泽东是正确方向的代表，总能在革命遭到损失的时候挽救革命挽救党，使革命取得新的胜利。这些话是出于真心，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革命的选择，人们佩服、肯定和欣赏他的正确和远见。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任弼时在会议一开幕就直言毛泽东的伟大：“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已有二十四年了。二十四年英勇奋斗的最主要收获是我们党的主张获得中国广大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他们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身上，寄托在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身上。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旗帜，也是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

作为大会的秘书长，他的话应该很有分量。

大会的另一位主要人物刘少奇负责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它对原党章的最重要的修改是把毛泽东思想加进中共的指导思想中，整个报告中出现“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的地方约100处，所用语言亦或空前，他说：“我们党的领袖与革命斗争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万岁……以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他把我们民族的思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



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完全明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

朱德的报告同样承认了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伟大……

受人尊敬的老将林伯渠、吴玉章等人也在交口称颂毛泽东。

历史注定要毛泽东开辟自己的世纪。

彭德怀很崇敬毛泽东。他自己说过：“我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三部曲，开始把毛泽东视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位大哥，以后认为他是自己的老师，到抗日战争中逐渐坚定地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他的话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他从没想过超于毛泽东之上。

这种反差体现在彭德怀身上，是因为他不同于毛泽东而受下层文化的影响。毛泽东则更多地接受了精典文化。所谓下层文化，实质上是自然文化，它的特点就是世俗性和民众性，受这种文化熏陶的人往往忠诚于自己的选择，具有朴素的民主思想。具体到彭德怀，他自幼尝受被压迫者的苦难，以一种为百姓创世界的心理走上反抗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他信奉了马列主义并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领路人毛泽东。渐渐地，他把自己对毛泽东的忠诚等同于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愿意为此付出所有的一切。但是，他还有民主思想，更何况他信仰共产主义，要解放全世界受苦的人们，要为中国工农大众谋福利。他历来主张实事求是，人人平等，反对搞特殊化。如果总结彭德怀的特点的话，力求使自己像个普通人一样生活也是一点。所以，他大骂在抗战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去看望他的妻子蒲安修是搞特殊，他能走上作战最前线，能吃野菜与士兵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能去田地收割、挖井、挑水，吃穿住行，尽力缩小与百姓的差别。当然，他也从不特殊看待任何人，包括毛泽东，这就是他在毛泽东面前毫不掩饰自我的心理基础。

我们不认为彭德怀对民主的理解就完全正确，也不认为他对毛泽东的直言不讳都起好结果，但这足以证明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

有人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本身就造成了领袖崇拜，以家庭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宗法体系像无数排列无序的马铃薯，他们无法代表自身的利益，只能依靠别人，绅权和皇权成为一种最普遍的崇拜对象，尤其是中国近代的屈辱使人们有一种恐惧感和希望感，盼望有人站出来代表中国、拯救中国，制止中外压迫者的残暴，带领人们走上富裕之路，这就是救星心理。

毛泽东正是人们所盼望的人，他是老百姓的解放者，深得人民尤其是解放区人们的爱戴，歌曲《东方红》、《绣金匾》都是为他唱的。因此，中央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权威的认可和宣传在人们心中既有基础，又能建树。

这就是 1945 年的毛泽东：神采奕奕，面色红润，笑容中透着非凡自信，不像在井冈山和长征中那样长长的头发、瘦削的身材，也不再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东躲西藏，经历种种艰难。他已是数百万武装和一百多万党员的指挥者，被认为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已使中共取得空前的团结，他使自己获得从未有过的威望。

然而毛泽东谨慎于自己的威望。曾任他秘书的周小舟、胡乔木等都认为他在延安很谦虚，不耻下问，秘书们可以无顾忌地提意见，甚至可以改他的文章。1944 年 4 月，《延安日报》发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把它列为整风文件，警告全党也警告自己不能骄傲，不能大意：蒋介石不是弱者，尽管他的政府和军队已经腐败，但他还控制着全国 3/4 的地区和 400 多万的军队，没有四、五年是战胜不了他的。外国还有个斯大林，他多次粗

暴地把自己不正确的意见加给中国，但他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尊重他、尊重苏联。必须作充分的准备，今后与蒋介石建什么国的斗争并不容易。

抗日战争胜利了，人民渴望和平，而蒋介石欲发动内战，武力消灭中共军队和政权。但因他在抗日战争中采取保存实力的逃跑方针，使其军队散布在西南大后方，蒋军军事准备不足，一贯致力于剿共的蒋介石突然 180 度大转弯，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表示极愿与毛泽东谒谈，共同建国。他先拨好了自己的算盘：你来谈，好，我有更多时间用美国人的飞机、军舰送部队去东北。不来谈，也好，等仗打起来后别怪我师出无名。据蒋介石估计，毛泽东不会会谈。

毛泽东心里当然明白，多年的老对手了：你打三封电报，很催人，不过装装样子，收买人心，我偏要去，你有两手，我也有两手。这叫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1945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去重庆，他们乘坐赫尔利张治中前来迎接的飞机于 28 日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毛泽东下飞机时，身穿朴素的灰色制服，头带一顶遮阳帽，边走边向人们挥手。

“毛泽东的到来，使整个重庆改观，不只是在表面上，即在人民的心上也起了剧烈的变化……大家认为毛泽东的到来，是民主中国的曙光……”这是《华西晚报》的报道。

国民党方面负责接待的张群老脸啡红，满面尴尬。他们为中共代表真的来谈所做的准备太少了！

重庆谈判桌上，周恩来和王若飞极力周旋，毛泽东则在住处与各界名流畅谈。在延安，代行中央主席的刘少奇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军事方针，他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日夜向北疾进，跑不动，就轻装，可以把枪扔下嘛，人到了就是胜利。九十天后，东北冒出十多万不带枪的八路军。

“少奇同志做得对，有了东北，我们的胜利就有了保证。”后来，毛泽东这样说。

谈判的双方都清楚，战争总有一天要打响。实际上，自谈判一开始。双方的军事摩擦就没有停止，“关外大打，关内小打”。

1946 年 7 月，中共公开应战。在蒋介石看来，他有 430 万军队，有足够的钱和枪，而且有美国作后台支持，对付只有 120 万正规部队的共军不会有有多大问题。他估计三个月至多半年就可以结束中国内战。然而毛泽东并不急于让自己的军队与蒋军决战、甚至允许军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丢失防守阵地，不与敌人争夺一城一地，“失人存地，人地两失；存人失地，人地两得。”解放军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气势汹汹的蒋军处处扑空，如重拳击棉花，徒唤奈何。而当他们稍有松懈时，几倍于他们的解放军便围上来将其吃掉，至 1947 年 2 月，国民党军队已损失了 71 万。

蒋介石意识到要改变作战方法，他重新布置战场的兵力。在他看来，蒋军在东北没有问题，那里有两个美式装备的王牌军，实在顶不住的时候，可以收缩至华北地区。全局的关键是与解放军争夺华东和打击中共首脑，最好是能把毛泽东消灭掉，使其群龙无首或者赶他到黄河以东，这个任务可以让西北虎胡宗南来完成。为了对付延安，1938 年时就让他脱离了抗日前线，率第十七军团驻陕甘地区，包围和封锁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现在该派他显显身手了。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急电胡宗南赴南京，要他率西北防区34万人进攻延安。蒋介石手拿彭德怀的卷宗，警告胡宗南要好好研究自己的对手：他这个人有两大优点，一是忠于信仰，二是有帅才。我要是有了彭德怀，共产党的军队就不会这么壮大了。毛泽东很精明，他手下的一批猛将都能独挡一面，你要小心呢！

早在30年代，蒋介石就想变彭德怀为他的将军。他写信给彭德怀许诺。只要愿意放弃共产党的事业，就保证其荣誉和报酬。他也给叶剑英、周恩来等人同样的保证，但均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这些共产党人继续从事反蒋的革命行动。实际上，蒋介石从来未争取到重要的红军将领。

蒋介石特别向胡宗南说明了攻占延安的重大意义：攻占延安，则可“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削弱其国际地位。”

1947年3月11日，蒋介石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蒋本人则亲赴鲁中指挥蒋军进攻山东陈毅和粟裕的部队。

毛泽东在考虑，谁有能力率领延安不足二万人的部队抵挡几十倍于自己的敌人的进攻。虽然是老解放区、老部队、老将领，但条件差、装备差、部队少，所谓三老三少。搞得不好，勉强维持现状，搞不好，只得重新打游击。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已经作了研究，决定了基本的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人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次加以消灭。钳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帮助其他战场的解放军打击与消灭敌人。要实现这个计划，必须有一位勇敢善战的指挥员来统帅军队。当时诸位将领都在前线指挥作战，贺龙虽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但他不在延安。只有彭德怀是最恰当的人选。但毛泽东对彭德怀愿不愿承担这个任务没有把握。不久，彭德怀被周恩来叫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当着任弼时（时任中央秘书长）三人之面交谈由彭德怀指挥军队抵抗胡宗南军的问题。彭德怀很痛快地临危受命，为党分忧。可以说是彭德怀主动请战的，结果他的准备没用上，白忙了一个晚上的构思。

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3月2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彭德怀成为西北野战兵团的统帅。胡宗南和彭德怀分别是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得力将军，他们在西北战场的较量亦可以说是中国两个政权前途的较量。毛泽东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汤恩伯兵团已经占领老根据地临沂和沂蒙山大部，参谋总长陈诚肯定说：“共军如虎离山，已无凭籍，不难予以个别击破。”3月19日，胡宗南进驻了中共占据13年的延安城，国民党上下一片欢呼。“延安经国军克服后，共匪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已失去重心，无异受一致命打击”。胡宗南预言陕西之战5月份即可结束。蒋介石则悠闲地回奉化老家扫墓，议订族谱。他根本没想到他的胜利缺乏实际价值。贝尔登在他的著作《中国震撼世界》中说蒋介石去拿延安，等于一个人花了一大部分财产去买一条钻石项链，它光辉灿烂，但一无用处。

不过这确实不是最后的结局。能干的彭德怀没辜负毛泽东的信任，他不断地将胜利的捷报送到毛泽东手中，青化砭、蟠龙、羊马河战役，三战三捷。彭德怀牵住胡军的鼻子，打起了磨菇战。这是彭德怀军事生涯中最得意的时期之一。而毛泽东，这时化名李德胜，虽然遇到过几次危险，仍坚决表示不过黄河。他说：“长征后，我们党像小孩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

和延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陕北问题不解决，我决不过黄河！”

当然。毛泽东也有不愉快的时候，彭德怀总是那么呛人。撤离延安时，毛泽东曾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呢！”3月18日，胡宗南部兵临延安城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还在王家坪找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人开会。彭德怀很着急，几乎是吼着问毛泽东的警卫参谋和警卫排长：“快走快走，一分钟也不要呆了！”毛泽东说：不急，不急，我还要吃晚饭呢。彭德怀耐不住性子：“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部队代你看了，你一分钟也不要呆了，马上给我走！”

毛泽东望望心急如火的彭德怀，固执地继续往嘴里送饭。彭德怀无奈，想夺筷子又忍住了，转脸向警卫人员和秘书发脾气，要他们马上收拾东西。

毛泽东皱皱眉，一声不响地走出窑洞，自言自语说：“我本来还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可是彭老总不干，他让部队代看，我惹不起他，那就这样办吧。”

毛泽东走出窑洞时，对彭德怀说：胡宗南占领延安，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他伸出一个手指头对着彭德怀：你只要1个月能消灭敌人1个团，不用3年就可以收复延安！

3月25日，彭德怀设伏青化砭，首战获胜，歼敌三十一旅2900余人，活捉旅长李纪云，被当时新华社誉为“模范战例之一”。青化砭战役后，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今后要继续采用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方法对付敌人才有效果。彭德怀认真考虑之后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敌人已改变孤军深入而成方阵推进后，像小米碾子一样，三面包围战术已不能奏效，要求毛泽东改变作战计划，对此王震稍有犹豫，被彭德怀抢白一通：只对毛主席的意见讲对、对、对或者是、是、是，乱弹琴。我们不能为了讨好而欺骗毛主席，虽然有人赞誉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我就没听他讲过他用兵真如神，我彭德怀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个老兵，我要对上级负责。

毛泽东最后不仅同意了彭德怀的意见，而且对彭德怀这种根据实际情况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深为赞许，他说：作为一个指导员，就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决断。

3月26日，毛泽东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集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中央一分为二组成两套班子，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会上还分别定了几位领导人的代号，毛泽东代号李德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任弼时代号史林。3月27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留在陕北，给彭德怀增加了很大压力：能否粉碎敌人的进攻，关系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关系着解放战争的全局，甚至也是世界关注的事。彭德怀曾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央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我要是指挥不好，犯了错误，是我彭德怀太无能，是对人民犯罪。辜负中央对我的重托。”

但随后的三战三捷却开了好头。

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地区全歼张灵甫的整编74师32000人，这是国民党军美械装备的五大王牌主力之一，其余四个是整编11师、第五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当时舆论传言“有74师即有国民党”，张灵甫自杀成

仁后，蒋介石十分震惊。他对将领们说：“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此后，蒋军士气大降。

1947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率七个纵队越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成功。蒋介石防御体系的中心出现二位最难对付的对手。在华北，聂荣臻部队攻克了重镇石家庄。

为了配合刘、邓大军行动，彭德怀的部队先后两次北上攻打榆林，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歼灭了钟松的整编36师。钟松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自吹：“共军可以吃掉别的部队，就是吃不掉三十六师。”该师是胡宗南部进攻陕北的主力师之一，曾对毛泽东紧追不舍，而且差点置毛泽东于死地，搞得毛泽东大发其火。为此，他在彭德怀部署战斗时亲自去听取作战讨论，而且抛却自己的化名李得胜，电话指挥作战。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十分高兴，前往彭德怀司令部祝贺：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硬是在侧水侧敌的困境之中出敌不意，仅用短短一天时间，就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这一仗是西北战场我军由防御到反攻的转折点。他磨墨挥笔，再次书赠彭德怀：

山高路险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枪勒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本是长征路上毛泽东在彭德怀指挥吴起镇战役胜利后赠给彭德怀的，此时他将原诗中的“横刀立马”改为“横枪勒马”。

年底，彭德怀开始新式整军运动，即通过官兵的诉苦运动树立明确的为土地而战和彻底打倒蒋介石的思想，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1948年2月，彭德怀指挥整军后的部队转入外线作战，包围宜川，围城打援，全歼刘戡率领的一个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共30000余人，这是西北战场上的又一个大胜仗。战后6天，毛泽东就著文说：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此次向南进攻中，旗开得胜，声威大震，改变了西北敌我对比的形势，今后将比过去更有效地同南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配合作战。4月22日，延安解放。

13个月前，毛泽东撤离延安时曾说：只要你老彭能保证每月消灭敌人一个团，不出三年我们一定会回到延安的。他把困难考虑得很充分，没想到彭德怀仗打得那么漂亮，二万人的部队竟吃掉胡宗南的3.5万兵力，一年零一个月就收复了延安。

其他战场也是捷报频传，真可谓摧枯拉朽，撼天震地。奇迹出现了，毛泽东运筹帷幄，提前组织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消灭国民党军队155万人，创下中国和世界战争史记录。长江以北已无蒋军的影子，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他不愿做怜蛇反被咬的好心农夫，也不想成为沽名钓誉的楚霸王项羽，他欣赏鲁迅的一句话：痛打落水狗。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不停步地前进，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力量。

4月23日，南京解放。

5月20日，西安解放。

5月27日，上海解放。

.....

蒋介石一退上海，再退广州，当他9月份从成都机场乘“美龄号”飞机起飞赴台湾后，他便永远地离开了中国大陆，再也没能回来。

彭德怀依旧战斗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他的任务是消灭精干的胡宗南部和善于流动精于骑术的西北马家军，而他手下的部队仅有十万人，担子显然不轻松，不过，彭德怀喜欢打硬仗。

他先后指挥了澄合战役、荔北战役和冬季战役，并协助太原总前委指挥太原战役。攻克太原。1949年7月，为执行“钳马（步芳、鸿逵）打胡（宗南），先胡后马”的方针，彭德怀组织扶（风）眉（县）战役。此时，华北野战军的第18、19兵团已归属西北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以弥补其人数的不足。扶眉战役共进行了4天，消灭胡宗南军43000多人。使胡几乎成了光杆司令。此后，西北战场解放军已占绝对优势。

接着，彭德怀挥戈西上，进军兰州、西宁、银川，歼灭马步芳、马鸿逵主力。10月上旬，彭德怀和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及新疆省府主席鲍尔汉在乌鲁木齐握手，新疆和平解放。至年底，西北五省已全部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理所当然，彭德怀首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等职。

他和毛泽东合作打下了天下，下一步，便是合作治天下

## 第四章

毛泽东在庐山当着政治局常委们的面说，他和彭德怀共事三十余年，两人是三分合作七分搞不来。这是气话吗？

再回首，看立三路线、会理会议、东征山西和百团大战。

彭德怀说，对毛泽东，我抱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

应该承认，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是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领导层中风波最多的关系之一。一些领导人有时在私下谈到党的主席和他的敢于直言的将军时，称他们是“从湖南来的两个脾气最倔的人”。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材料所证明。但是，多年以来，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关系是相互尊重和相互支持的关系。在很多关键时候，彭德怀都给毛泽东以决定性的支持，如1930年至1931年的富田事变，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以及同年晚些时候与张国焘的斗争。至40年初期同王明主义的斗争中，彭德怀也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可以说，他们两人的主要关系是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当然，从1928年至1958年，他们两人之间也有一些紧张的关系，在庐山会议中，毛泽东把这种紧张关系夸大了，说彭德怀和他是七分搞不来，他们的合作应该三七开，合作只有三分。

在他们共处的初期，由于受当时所处环境、文化程度和个性等原因的影响，两个人有时发生意见分歧甚至激烈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也由于中共领导的军队初创时期的武装斗争是为生存而战，在军事策略和斗争方法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也是意想得到的。再说，从资历上来看，尽管彭德怀不同于毛泽东，但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的高层领导中，大家间相处都是平等的，他俩彼此经常以“老毛”、“老彭”相称。使情况变得复杂的是党的纪律有时使彭德怀有点感觉到毛泽东正确的时候，也因为党的纪律而放弃支持毛泽东，30年代李立三路线和抗日战争王明路线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彭德怀与毛泽东发生分歧，并直率地说出他的不同意见，这在革命时期并不少见，但彭德怀这种刚直粗鲁的性格也确实给他们二人的关系增添了一种刺激。虽然我们看到的材料大都是从有勇气和忠诚耿直等褒的角度说彭德怀是个直言不讳的人，但必须承认，正是这一点使彭德怀疏远了领导层中的很多人。因为毛泽东也是个不低头、不认输的人，他们二人的关系必定不时有种火药味。据黄克诚回忆，毛泽东与彭德怀两人间是有一些成见的。1959年上海会议时，毛泽东说过：“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过去跟我兄弟也是这样。”使局面进一步加剧的是，在毛泽东成为无可争辩的领袖以后，彭德怀比毛泽东任何别的同事都想继续保持同毛泽东在最大程度上的平等气氛。进入50年代时，他还经常称主席为“老毛”（因此彭德怀成为党内改口最晚的人）。这种情况当然不能看成彭德怀后来受贬的原因，但它确实会使人在情感上发生变化。

整个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出现的比较大的分歧是：对李立三路线的认识、会理会议、1936年东征山西和百团大战。

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他先后领导了安源路工人大罢工，上海五卅运动（他当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1928年担任中共

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由于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水平低浅，李立三成了实权握有者，但他不恰当地估计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因而提出了过高的革命要求和计划，史称党的第二次“左”倾路线。

1930年前后的中国正处于大的动荡之中，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加剧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争夺，并导致中国军阀混战的进一步加剧。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1930年中原大战打得不可开交，国民党阵营处于互相消耗的状态，大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创建根据地的斗争。此时，红军已发展到14个军约10万人，拥有15块根据地，遍及十多个省。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也有相当的恢复，全国党员达10万多人。形势发展是令人振奋的。

对这种形势，李立三作了过高的估计，他先后在《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刊物）等杂志上发表《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等文章，认为全国的反动统治阶级正处于动摇与崩溃之势，快要完蛋破产了，“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形成革命高潮”，如果出现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就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对不同意见他这种分析的人，李立三都把他们说成睡在李子树下等候李子落到口中的懒汉。

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李立三在1930年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等。这是中共被第二次“左”倾路线控制的标志。之后，李立三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部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其部署是：以湘赣、湘鄂赣区的红5军、红8军组成红三军团，进攻长沙，并调广西左、右江区的红7军、红8军北上配合进攻长沙（未到达）；以红4军为主体，加上赣南、闽西区的红5军、红12军组成一军团，进攻南昌；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6军、红2军组成红二军团，以鄂豫皖的红1军、红15军组成红四军团联合进攻武汉；以闽浙赣区的红10军进攻九江。同时，准备在上海、南京、广州、天津、青岛、哈尔滨、旅大等中心城市组织工人武装起义，并将党、团、工会等机构合并或取消，成立“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致使正常工作陷于停顿。

这便是立三路线的由来和彭德怀进攻长沙的背景。由于各种原因，李立三以后长期受到压制和批评，与之有关的人和事自然成为危险区域。彭德怀指挥三军团进攻长沙之事亦被当成“立三路线的标本”、“盲动主义的典型”。

不容否认，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彭德怀一度接受和执行了李立三攻打长沙的“左”倾错误主张（实际上是执行了中央的命令）。按照中央要求，彭德怀在1930年6月红5军攻克黄石港后组织了红三军团，然后南下湖南，先后攻取岳阳、平江、金井，7月27日晚8时占领长沙。因为中央主张攻下长沙后立即成立一个苏维埃的中央政权与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对立起来，红三军团在占领长沙后立即成立了李立三为主席的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李立三未到职，由王首道代理）以及各种政权机构，颁发政纲和各种法规，杀掉400多个反动分子，想长期占领下去，作为夺取武汉的根据地。但是，因为红军力量仍然弱小，当何键率兵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反扑长沙时，红军无力抵抗。美国炮舰“派罗斯”号带头攻击长沙，连续炮轰4天，造成红军军民数千人死亡，在何键和中央军联合压力下，红三军团被迫撤出长沙，在文家市和毛泽东的红一军团会师，粉碎了敌军追歼红三军团的计划。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当苏维埃政权在后面还没有稳定的时候，企



图把长沙当作一根据地，这是一种军事和战术的错误。但打长沙从效果上看也是可以认为是有益的。因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红4军也在福建长汀扩编为红一军团。7月11日提出了“进略樟树，窥袭南昌”的命令。但在24日占领樟树后，毛泽东却召集备军负责人开会，作出全军团西渡赣江的决定，不北上去攻打形势对我不利的南昌，只以一部分兵力迫近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打几枪示威，主力向西推进，以求与彭德怀红三军团会合，在运动中歼敌。

1930年8月21日，红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镇会师，成立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全军计4万多人。按照中央的命令，一方面军成立后向长沙发动第二次进攻。此时，敌人已有很好的准备，从南至北数十里都修筑了防御工事。工事分三道，第一道是巨型鹿石，第二道是密布的竹钉，第三道是高压电网。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坚固的碉堡群。

自9月初开始，红军先后向长沙发动了几次进攻，在有些地方也突破了敌人的一、二道防线，但冲破第三道防线却十分困难。为突破电网，红军在夜里实行偷袭，但因天黑，许多战士碰上电网触电而死；继而买了几百条牛，让它们对着电网一字排开，然后在牛尾上绑上沾有汽油的棉花，点着火，使牛群冲向电网。没料到点火后牛乱冲乱撞，四处奔逃，不但没冲破电网，反而伤亡了自己的队伍。此计不成，红军又弄来许多禾桶，在每只禾桶上安两个轱辘，用浇湿的被子蒙在上面挡子弹，战士跟随后面前进，但因敌人火力太大，成效亦小。第三种办法是挖沟壕，想把装着炸药的棺材偷运到敌人城墙下，又因敌炮火密集，根本靠不上去。结果，第三条防线始终未能突破。

敌我双方对峙了半个多月，红军损失严重。面对红军弹药给养日益缺乏，敌人援兵却逐渐增多的形势，毛泽东在长沙郊区白田铺召开会议，说服红一方面军中一些坚持打长沙的干部主动撤离长沙。9月21日以后，红军退兵。

这个决策，按史沫特莱的话说，“是毛泽东和朱德采取了一生事业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

毛泽东自己也说：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避免了李立三所要求的很可能会成为灾难的对武汉的进攻。红军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补充新的兵员，并在新的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尤其重要的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已攻占的地区。为完成这一任务，攻打长沙没有必要，而且还包含了冒险的成分……李立三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地估计了全国政局中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正在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助长他这种信心的是当时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正在进行的旷日持久和损耗很大的内战，这使李立三认为形势十分有利。但是在红军看来，敌人正准备内战一停就大举进攻苏维埃，所以这不是搞这种可能招致惨败的盲动和冒险的时候。这个估计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该如何看待红军攻打长沙和毛泽东、彭德怀与李立三路线的关系呢？这在党史界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必须承认，这个时候，毛泽东确实比彭德怀更先认识到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他们都执行了推行立三路线的中央所发布的攻打长沙命令，区别在于毛泽东执行中有所怀疑，彭德怀执行中没有怀疑。但是，毛泽东也只是处于一种怀疑的程度，还没有深刻认识到李立

三路线的错误，而彭德怀也不是人们常说的那样坚决执行立三路线，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毛泽东执行了攻打长沙的命令，但已对立三路线有所怀疑。朱德曾告诉史沫特莱说：“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我们笼统地知道中国的情况比辛亥革命以前清朝执政时还糟糕。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毛泽东和我认识到这是冒险，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情报资料来反对这项计划；而且像我们这样心存疑虑的人是不多的。”

结果，他们压抑住疑虑，先发布攻袭南昌的命令，继而执行中央指示，第二次进攻长沙。但正因为已有怀疑，毛泽东才果断退兵撤离长沙，并亲自到每一个团去讲话，解释从长沙撤退的原因。

彭德怀执行了立三路线，但在现实面前和毛泽东的说服下，他服从并支持了毛泽东长沙撤退及其以后的命令和计划，不仅没有“顽固地坚持立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而且从军事部署方面认为不应该第二次攻打长沙，因为敌人已坚固设防，同时红三军团本身迫切需要修整。攻打长沙，在政治上执行立三路线，是错误的，但它有利于当时革命斗争的发展，不能全盘否定。首先，红军判断敌情正确，以少数兵力战胜敌人，攻克长沙，在军事上是正确的。彭德怀说：“此役，三天打四仗，行程一百四、五十里，经过待伏战、进攻战、阵地攻坚战，我八千人打败三万有余之优势敌军，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的。”其次，占领长沙沉重打击了敌人，扩大了红军和革命斗争的影响，补充扩编了红军，筹备了大量军用物资和粮弹供应品。

问题在于彭德怀为什么执行了李立三路线？这也很好解释，其一是立三路线统治了中央，是中央的代表，而且其口号本身有很大诱惑性。两次攻打长沙都是以中央名义下的命令，也都是红三军团、红一方面军前委据中央指示作出的决议。彭德怀应该服从中央和前委决议。其二是彭德怀信任和服从中央，没有怀疑，他在自己写的《往事回忆》中说：当时只知道服从中央领导，而不知道为什么要服从。没有真正弄懂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在作战计划方面，只凭自己的经验，认为能够取胜的或者能够打得开的城镇，便取之；认为不能取胜或打不开的，就不去打。总之，以不吃亏或不吃大亏为原则。可想而知，如果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仅仅建筑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那是很不够的，也就难免不犯错误，致使自己犯了错误，自己还是不知道。所以，直到三中全会以前，自己还迷惑在“立三路线”之中，迷惑在红军所取得的胜利之中。在三中全会精神传达到部队以后，我才知道“立三路线”在当时敌我各方面力量对比下，而想要取得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从而也才知道它是一条军事冒险的路线。

尽管彭德怀把他认识李立三路线错误的的时间推迟到三中全会精神传达后，但他在长沙撤兵时已经从行动上支持和服从了毛泽东。红军从长沙撤围后，到株（州）萍（乡）一带活动。总前委在株洲开会，初步总结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接受毛泽东提出的“从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夺取吉安，再回南浔，进攻武汉”的建议，决定首先攻取吉安。1930年9月29日下达进攻吉安的命令。但就在此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到达红一方面军，传达中央《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要红一方面军返回

再攻长沙，为夺取武汉创造条件。这样，一方面军内部围绕是维持原决议攻打吉安，还是回头再攻长沙或南昌等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几乎导致一、三军团的分裂。

总前委又在袁州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张既不回去打长沙，也不马上去打南昌，而是继续执行攻打吉安的命令，但他被主张打大城市的人指责为机会主义，特别是三军团的一些人，说话语气很重，很激烈。毛泽东耐住性子。作了许多解释工作——他分析说：吉安是赣西南中心城市，打下它影响较大；敌人力量较弱，又无外援，拿下它有把握；攻下吉安，会使赣西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也有利于经营江西。这样，毛泽东首先说服了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坚持攻打长沙、南昌的人也同意先打下吉安再说。彭德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态度不甚积极。10月4日，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城。

吉安被克后，问题又出来了，因为原来计划就是打下吉安后再向南昌、九江进攻，争论再次激烈起来。10月1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出命令，向南昌方向进军。为统一认识——毛泽东不希望出现红军攻打南昌的结果，总前委于17日在峡江召开全体会议，对时局和行动等问题再次展开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自己对形势的分析，他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起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容悲观，因为这是革命高潮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反动统治阶级争取改良主义的领导权未解决之前，来一个省首先胜利，继续此胜利的发生与扩大。来冲破消灭反革命的联合进攻。”它第一次冲破了李立三路线对形势过于乐观估计的看法。为一方面军克服立三路线创造了前提。但会议在是否放弃攻打南昌、九江方面仍然未取得统一意见。部队继续向南昌方向前进。

此时，毛泽东、总前委得到蒋介石集团已结束中原大战，正集中数十万兵力准备进攻红军和根据地的情报。面对严重形势，红军该如何行动？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召开联席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主张停止前进打南昌，红军主力集中后撤到根据地，利用老苏区有利条件消灭进攻苏区的敌人，确定诱敌深入方针，主张部队东渡赣江。但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多数干部和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不同意，他们主张攻打南昌、九江，他们指责毛泽东不打南昌是断送中国革命，是违背党中央的路线（立三中央路线）。彭德怀虽然对红军攻打南昌的把握性有怀疑，但仍然赞同了袁国平、李文林等人的意见。通过争论，特别是毛泽东、周以栗个别谈话，彭德怀改变了看法，完全同意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和军队行动方针，维护一方面军的团结。对此，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曾给予高度赞扬。

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埋葬以前，军内曾经历一个危急的时期，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支持李立三路线，要求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来（一军团可以不打南昌，三军团单独干——作者）。但是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持了在他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向上级指挥部的忠诚。

罗坊会议后，彭德怀坚决贯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总司令部下发的所有命令，如三军团一些干部反对毛泽东要一、三军团全部东渡赣江的意见，主张两军团夹江而阵，甚至要求脱离方面军领导单独干。彭德怀则不含糊：“总前委决定了的，不过江不行，我彭德怀是一定过江的。离开湘鄂赣没有关系嘛，过赣江是为了集中力量，更好地打击敌人。”他指挥红三军团

在新余渡过赣江，向根据地退却。又如在富田事变中——江西省地方武装因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而武力对抗，并挑拨毛泽东同军事领导人的关系，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彭德怀态度明朗，旗帜鲜明，和朱德、黄公略一起发表公开信，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要求部队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拥护毛泽东，他还亲自邀请毛泽东参加红三军团的干部会，使大家对毛泽东有了深刻的印象。

对此，彭德怀在《往事回忆》中说：我当时反对分开行动，并且坚决执行了总前委的决定。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仅拥护，而且也是信赖的。

1931年3月18日，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对这一段的历史作了个决议，说：

攻打长沙后的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余的罗坊会议。这样就已经在党的文件上，明确地确定了这个转变。它是经过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许多严重的斗争，才有这个结果。……三军团的前委在立三路线时代，是完全执行了立三路线。……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在整个政治路线上是执行立三路线，……至于第二次进攻长沙，则更是冒险主义了，但长沙之战明显地证明了立三路线是行不通的，宣布了立三路线彻底破产，使总前委的路线得以转变，使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之下，迅速地走上正确路线。总前委在转变路线之后，正确地决定了击破敌人进攻的战略——引敌深入，坚决的反对盲动主义，结果，取得了龙冈东韶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以看出，彭德怀一开始“并没有认识立三路线的全部内容，对立三路线从政治到军事、经济都是一条完全冒险的错误路线，是没有认识的”。但他有个逐步认识和转变的过程。

会理会议是1935年5月12日由毛泽东建议，在贵州省会理城外铁场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和林彪受到毛泽东不客气的批评，被指责为“右倾”和破坏党的团结。毛泽东在以后的一些年里曾几次提到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上又重提此事。显而易见，它在毛泽东头脑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遵义会议的召开，不仅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且重新规划了红军的前进方向——此时的红军已经损失了2/3的部队和几乎全部重武器。虽然仍号称四个军团，实际上只有16个战斗团和1个干部团——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及在遵义周围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定渡长江北上进入四川，同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的四方面军会合。“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其理由是四川在政治、军事（与四方面军更好地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这个计划作为战略目标是可行的，但它仍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敌我情况估计不准确。结果造成红军土城战斗受挫，不仅没完成预定计划，还使红军在实力、士气方面受到损失，一度失去主动权。对此，陈云曾给予批评：这个决议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下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地估计和了解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估计的。

按照既定计划，红军向长江方向前进，准备在重庆上游城市宜宾至泸州一线渡江。红一、三军团、五、九军团和中央纵队呈品字形共同奔向赤水。

一开始还很顺利，红一军团先后攻下习水、土城，进抵赤水域郊，但因赤水域工事坚固和敌兵增援，红一军团和敌人形成对峙，相持不下。与此同时，在红军后面紧紧追赶的敌军已接近土城，为扫除渡江障碍，毛泽东下令斩掉尾巴，由彭德怀统一指挥三、五军团，用迅速、干脆的手段围歼敌人。一军团则继续北上，争取占领赤水。

1935年1月28日，三军团向敌人发起攻击，毛泽东在土城以北数里的青杠坡建立了指挥所。按战前预想，敌人不过两个团3000人左右，而且是黔军双枪兵（烟枪和步枪），战斗力很弱。依据以往惯例，红军将在几个小时内解决战斗。然而战斗进行到中午，敌人仍然没有仓惶败退的迹象，相反敌人越战越强，越来越多。这时毛泽东才意识到正在进行的战斗非常危险——红军判断失误，敌人不是黔军，而是川军。在数量上也不是两个团而是8个团。1月26日早参谋部判断敌人恐系川敌廖泽部约两个团（实际上刘湘川军的旅为三团制而非两团制），27日晨判断敌人参战部队可能有四个团（实际上为郭勋祺旅、潘佐旅、廖泽旅共八个团），加上其他部队共26000余人，直至红军总攻受挫和军事侦察后，才将敌人的情况基本查清。

由于红军在人数上不占优势，而且川军训练有素、指挥有方，战事进行得相当激烈。朱德要求亲自去前线指挥，毛泽东连抽了几支烟都没有答应。朱德再次强调大局为重，个人事小。他把帽子一脱说：得嘞，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点头同意。于是，朱德和刘伯承离开总司令部到前沿阵地督战，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列队欢送。但因敌人投入兵力越来越多，红军前途未卜。

战斗进行到下午4点，仍然很激烈。红军伤亡越来越大，军事委员会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这是红军在战斗中召开的唯一一次紧急会议。大家认为如果敌人再增加兵力，红军不一定能够抵挡住。会议决定黄昏时脱离战斗，迅速炸掉赤水河上的桥梁，取消北上渡江计划。何时渡江，以后看情况，眼下红军只能推迟入川。

28日傍晚，红军撤出战斗。土城之战以红军的失利而告终，敌人则称之为“土城大捷”。川军教导师第3旅旅长郭勋祺被越级擢升为模范师师长。

对于这场战斗，长期缺乏具体记载。但从红军领导人的回忆中能够散见此仗的艰苦。

杨成武著《忆长征》第127页载：在赤水与我作战的川军负隅顽抗，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又有牢固的工事，再加上是以逸待劳，增援部队又陆续赶到，我们越打，敌人越多，打了一天一夜也解决不了战斗……战斗胶着了，双方的伤亡都在不断增加。我们战斗的回旋地区在缩小。看来，突破川军阵地很困难了。

在一军团政治部工作的肖华也批评土城战斗说：我们打得相当不理想，伤亡相当大，军阀的军队反倒没受什么损失。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记述了土城战斗：一月二十八日和敌人在土城东北的丰村坝，青杠坡一带打了一场恶仗，由于我们指挥存在缺点等等原因，这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受挫……我二师的部队曾经陷在一个葫芦谷形的隘口中，来回冲击，部队无法展开，伤亡较大。五团政委赵云龙牺牲，部队处境十分危险。我们和郭勋祺师激战了一整天，虽然给了他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自己却受损失不小。

毛泽东也承认土城之战是个败仗，他在2月份的扎西会议上总结说：“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上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是轻敌，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土城之战，蒋介石判断我军目的是过江与四方面军汇合。为此他调集重兵，围追堵截：川军沿长江布防、薛兵部与黔军在后面紧追不放，滇军也做好拦截的准备。而红军进攻叙永不克，渡江计划难以进行。遂决定向川滇边的扎西集中，机动作战，争取创造新的根据地。“为了有把握地取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移动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2月19日，红军挥师东进，再渡赤水，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北地区进军。先后攻克桐梓、娄山关，乘胜追向遵义、老鸦山、烂板登、刀把水，一直到乌江边上，连续打了几个漂亮的追歼战，18天里横扫1000余里，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人，全军振奋，毛泽东本人也兴奋地写下《忆秦娥·娄山关》诗一首。

此仗获胜，中央军委特别是毛泽东增强了信心，应一些领导人的要求，决定再打一仗——趁薛岳部吃败仗逃到乌江以南的机会，打击西北面的周浑元纵队。为强化领导，中央军委3月4日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指挥攻击鲁班场之敌，以求消灭周浑元部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3月15日，红军向鲁班场发起攻击（敌人共有四个师16个团），此处群山环抱，易守难攻。战斗进行列入夜，不分胜负，双方往复进退，在一些地方齐人深的荆棘茅草都踏成了平地。由于敌人兵力集中，工事坚固，并有大量预备队反击，红军虽多次突入敌阵地，终无大进展，加上敌人援兵逼近，红军被迫撤出战斗，旋即三渡赤水，进入四川古蔺地区，再次陷于被动。

鲁班场之战又是场攻坚战，以己之短克敌之长，红军吃了大亏——因为敌人修筑了大量工事，光碉堡就有70多个。彭德怀回忆说：接到军委命令，三军团归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指挥，进攻鲁班场驻守之敌约一个军。该敌到鲁班场已是第四天，野战工事已完成。我攻击一天未奏效，黄昏撤退，继续西进。到离习水不远之某镇，军委又决定打击追敌潘文华师，该师九个团，系川军刘湘主力，战斗一天又未取胜，我乘夜撤退，渡过习水河继续西进。敌军继续堵击、侧击，比较紧张。

李德《中国纪事》对此也有记载，他说：在这一胜利的鼓舞下（指二占遵义），中央红军又扑向周（浑元）驻扎在遵义东北仁怀地区的另一纵队。但敌人立即退入防守阵地，打退了我们的进攻。我们受到了很大损失，还有一名师长阵亡了。

情况虽然不很乐观，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领导人没让红军死打硬拼，争池夺地，而是及时脱离战场，三渡赤水，准备由被动转为主动的条件。渡赤水后，毛泽东制造部队徘徊不定的假象，干扰敌人的判断。等敌人在长江边修筑碉堡工事加强防御时，毛泽东又指挥红军突然东进，四渡赤水。之后大踏步前进，直逼贵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国民党追剿红军的蒋介石恐惧至极，

命令部下必须保证他的坐机能随时起飞并从云南、四川等地调兵护驾。然而红军只是虚晃一枪，转而奔向云南，以一部分兵力佯攻昆明，主力则向金沙江边迅速推进，用七天时间从容过江，从而摆脱了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

四渡赤水，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以运动战术隐蔽了自己的意图而使敌人捉摸不透，从而不断调动敌军，由被动变为主动。这是毛泽东为首的新领导指挥的得意之作。虽然它未能实现在黔北开辟新根据地的目标，也有一些失误之处，但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使蒋介石聚歼红军的计划归于破产。这在战略上是个奇迹，它的成功，是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但是，毛泽东的这种打法却使红军吃尽了苦头，红军不得不多走路，甚至走冤枉路，连续行军和连续作战，使每个红军指战员都处于极度疲劳的境地。跟随红军长征的德国人李德曾作了下面的回忆。

“为了尽可能地避开战斗，红军在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线上前进。道路漫长，没有尽头，队伍时而并行，时而前进和后退，时而迂回和佯攻，有时甚至在兜圈子。每天行走四、五十公里的强行军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通常比战斗部队少走一些弯路的中央纵队，一下就走了七十公里。行军大多是在夜间，因为白天天气好时，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整天不间断地飞行、轰炸和扫射。特别狡诈的是那些低空飞机，它们从一座山背后贴着地面飞出来而没有一点声响，然后用密集的机枪火力向我军扫射。先头部队、侧翼掩护部队和后卫部队，往往要历经几十次遭遇战，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有时甚至几处同时遭遇敌人。

“当我军翻过云贵边界陡峭的大山时，形势变得更困难了。崎岖的羊肠小路通过直上直下的深谷，许多马摔倒在地跌断了腿，只有骡子勉强能支撑过来。我军越是继续深入云南境内，给养情况也越来越糟，大山里几乎找不到什么可吃的东西。红军战士们从死马尸体上割下一块块肉来充饥，最后只剩下一具具骨骸……

“疲劳现象在队伍中急剧增加。我想说一说自己的经历。如果我们在白天行军，总是以小部队为单位，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树枝和野草伪装起来。如果我们白天在一个村子或场院里睡觉，附近落下炸弹，我也根本不会醒来，即使炮弹在旁边爆炸，我也只是翻身再睡。有一天夜里，当我们穿过一片平原时，我走着走着真的睡着了，路已经转弯，我却一直走到旁边的小溪里去了，当冰冷的水拍打着我的时候，我才醒了过来。

“由此可以想象，部队的情况如何了。病号和累垮的人多于死伤者，损失与日俱增。虽然自年初以来，我军在贵州招募了几千名志愿兵，但许多师团还是明显地缩小了。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值得赞叹的是，尽管如此，部队的纪律和斗志依然没有受到挫伤。”

对此，彭德怀也深有感触，他回忆说：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八、九时从遵义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我们十一时许才接到军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

更为严重的是，红军并不是每战必胜，几次作战失利不仅削弱了红军的实力，影响了指战员的士气，还造成了领导层中的意见分歧，使红军经历了一个极为困难的时期。这一点在周恩来写的《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谈得很清楚，他说：从1月2月出发，到3月5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

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连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争论。

整个四渡赤水间红军伤亡人数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具体数字，但从有关材料中我们能感知一二。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认为土城之战红军伤亡 4000 人左右，占当时红军总人数的 1/8，接近长征以来红军扩军的总数（约 5000 人）。红军渡过湘江、进入贵州时，当时约有 3 万余人，但过金沙江后只剩 2 万余人了。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领导层内出现了不同意见，一些人对直接军事指挥者毛泽东有不满情绪。如鲁班场作战失利后，张闻天就认为此次行动考虑不周。彭德怀也因此烦闷，建议中央军委今后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人决战，不要攻坚乱碰。”在这些不同意见者中，尤以一军团长林彪最为积极。

李德《中国纪事》载：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了几乎要发生一次新的改组和一场新的派别斗争的地步。洛甫（张闻天）和林彪在这以前和遵义会议期间，曾经是毛最热心的代言人和最可靠的支持者，现在却以最激烈的批评者的身份出现了。他们公开指责毛及整个领导小组“在敌人面前逃跑”、“军事破产”。还有彭德怀，也或多或少赞同他们的意见。

应该指出，李德夸大了毛泽东及不同意见者之间的对立，他们决不是在进行旨在让毛泽东下台的派别斗争，而是提醒毛泽东注意军事指挥员的困难，注意部队的极度疲劳。但言语和方式可能过头了，特别是林彪，竟公然打电话，写信让毛泽东把前线指挥权交给彭德怀，以便他能集中精力考虑全面计划。这惹恼了毛泽东。

林彪所报怨的问题主要是部队太疲劳。认为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才对。“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象他（指毛泽东——作者）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到达会理后，林彪更积极活动，把对毛泽东的不满公开化，他打电话给彭德怀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林彪的电话是当着聂荣臻（一军团政委）、左权（一军团参谋长）、朱瑞（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一军团保卫局长）等人的面打的，聂荣臻当即表示了他的反对意见，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如果你擅自命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

林彪打电话的行为受到聂荣臻的批评，也被彭德怀所拒绝，但他继续申明自己的观点，又向中央三人小组写了封信，认为四渡赤水指挥不当，红军损失过大，要求毛泽东和朱德下台，主要是毛泽东下台，让彭德怀指挥中央红军北进。信送出之前，林彪把信念给别人听并要聂荣臻签字，再次被聂荣臻所拒绝，他对林彪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尽管如此，林彪还是把信送上去。

值得强调的是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也依据同彭德怀的谈话内容起草了一个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他加上了自己的意见），强调创造新根据地的重



要性，要求中央军委领导照顾红军中的实际困难，不要让红军太疲劳。

遵义会议时，彭德怀才第一次见到刘少奇，毛泽东为他们作了介绍。会议后，刘少奇接替袁国平的职务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彭德怀向他介绍了部队的情况，说部队现在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遵义会议决定在湘鄂川黔边区建立根据地，大家都很高兴，但传达讨论不深入。……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蒋介石部队也很疲劳，目前滇军和川军还是生力军，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靠近贺龙的二方面军，创造新根据地，实现遵义会议作出的决定。

一、三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但领导人竟和毛泽东意见不一致。为此，毛泽东建议利用合理休整的几天时间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认识和决定下一步行动方针。5月1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城外叫铁场的地方举行，18位中央和军事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杨尚昆、何克全（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洛甫（张闻天）、彭德怀、李卓然、邓小平、董振堂、邓发。会议集中讨论了林彪的意见，毛泽东认为林彪等人代表的是右倾情绪，缺乏革命进取精神。特别对彭德怀很不满，认为是他在背后捣乱，他是后台，林彪的信是他鼓动起来的。会议最后统一了认识，认为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必要的，有好处的。诸位领导有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中央团结的义务，责成林彪向有关人员亲自传达对他的批评。会议也未采取彭德怀的意见，决定继续北过长江，和四方面军汇合。责成刘伯承率先遣队扫清北上道路。

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回忆了这次会议，他说：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如第二次占领遵义的第二天，打吴奇伟军的反攻，一、三军团就完全是自动配合把敌人打败的。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这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心想电报与信和我完全无关，竟落到自己头上，今后一定要注意些，可是事一临头，就忘记了。而且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此事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以避免挑拨者利用（以后张国焘利用会理会议来进行挑拨，我说是小事情，是我的不对）。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

这件事本来是属于领导层之间的不同意见分歧，在那种情况下说过火的

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毛泽东视之为极严重的问题。他刚在几个月前担任军事领导，而现在有人却要他放弃最实质的军事指挥权，这是无法接受的，因此他在会理会议上给予反击并把重点放在彭德怀身上。他认为年轻而又内向的林彪写这封信一定是直率的彭德怀的鼓动。这件事中，个性和出身都对彭德怀不利。林彪属于年轻领导——当时他 27 岁（而彭德怀 37 岁）。他一直视毛泽东为老师，求得毛泽东的教导而没有与其平起平坐，这和直爽而脾气坏的彭德怀不一样，他常同毛泽东进行激烈的争论。正因为如此，林彪成了毛泽东喜爱的人。彭德怀没有解释他与林彪写的信无关，加重了他的困境。由于这种批评对彭德怀不公正，他很苦恼，就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在庐山仍未向毛泽东作出解释。这两件事，虽然都不像毛泽东所想的那样，但实际上他把二者等同起来：彭德怀在这两件事上都是与他对立的。

彭德怀和毛泽东之间第三次较大的分歧是 1936 年的渡黄河东征问题，实际上是关于对陕北根据地是采取“巩固中求发展”还是“发展中求巩固”的不同意见，最后，彭德怀同意了毛泽东的东征主张，共同领导了东征山西的行动。

1935 年 10 月，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的一部分中央红军——它的名称叫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共有 7000 多人，他们本来和四方面军的第 4 军、第 30 军等同属于北上抗日的右路军，后因张国焘制造分裂危险而单独北上——和徐海东、刘志丹等领导的陕北红军在吴旗镇、甘泉一带会师，疲惫的红军终于有了个歇脚的地方，但问题马上提了出来：偏远、贫穷的陕北根据地究竟能给中国革命带来多大的希望？红军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陕西省特别是陕北历来是中国最贫穷而又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多少世纪以来，它只能供养很少且极为贫穷的人口。1936 年周恩来就说：陕北的农民太穷了。他们的土地非常贫瘠……江西苏维埃的人口有 300 万，而这里最多的不过 60 万人口。在江西和福建，人们是打着包袱参加红军的，而这里的人民参加红军连双筷子都不带，再也没有比他们更穷的了。

陕北的荒凉与衰败景象确实使很多人有种压抑和悲观，特别是它所处的不利地理环境，造成党内领导层关于红军战略方针上的意见分歧。例如林彪，他认为在陕北没前途，要带一些部队去陕南打游击。瓦窑堡会议前，中央曾就战略问题征求军团领导干部的意见，林彪便在信中正式提出到陕南打游击，认为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要求中央调出一批干部，由他带领去陕南创立根据地。林彪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说他与中央不一致，要他改变主意。但林彪依然期待中央批准他的计划，直到东征前还坚持他的看法。

彭德怀的意见与林彪不同，他认为陕北根据地来之不易，刚站住脚，不能轻易丢失，同时该地四周自然环境恶劣，不易形成敌人的包围。主张大力巩固，不放心毛泽东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意见。否则会像 1929 年的井冈山撤退一样，不仅没能扩大根据地，而且丢失了井冈山根据地，警告毛泽东慎重行事，丢了陕北根据地问题就大了。这种看法毛泽东也不同意。

彭德怀为什么提出这个意见呢？陕北根据地的面积虽然不算小，但的确太穷了。人口有限，物产不丰，即便是陕北群众都踊跃交公粮，也养活不起这么多的部队。再说，革命力量要向外扩大，不能老蹲在陕北吃老米呀！要北上抗日，也得有巩固的后方和前进的基地吧！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很困难，

向北没有地方去，是沙漠地带。向西去也是沙漠边界，又是回族聚居区，没有多少人口，而且蒋介石正在向该地区集结嫡系部队。向南也没有好地方去，西安是国民党在西北的大本营，若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就有把蒋军嫡系引进西北的可能。向东也困难很大，从清朝末年任山西都督到民国任省主席和绥靖主任的阎锡山，已经统治山西几十年，这个土皇帝有他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军事力量。鉴于此，彭德怀主张先巩固后发展，在巩固中求发展。

毛泽东的意见是在发展中也可以巩固。这种意见很快为大家所接受。接下来的问题是向什么方向、什么地方发展，对此，又有多种不同的主张。想从苏联得到物质援助和技术援助的思想重新抬头，张闻天建议经宁夏过内蒙古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推进，虽有沙漠和草原等障碍，但路程较近，敌人也只是地方军，是与苏联联系的可行之路。他的建议既未被肯定也未被否定；彭德怀、周恩来等人主张向宁夏进军，但不同意推向内蒙古，而在宁夏、甘肃方向扩大陕北苏区，以便建立一个资源比较丰富的大根据地；也有的人提议让四方面军进攻新疆。毛泽东认为红军应争取直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向山西省进军，在那里取得立足点后可以从绥远、河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联系，这样可以一下子解决两大任务：既保证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又能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使红军成为抗日先锋，亦即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军事行动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项任务之上。”

1936年1月17日，毛泽东提出了新的战略计划，主要目的是巩固发展苏区，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他计划的第一步是巩固陕北苏区，准备渡黄河向山西挺进，决定2月中旬东征，并作了人事安排；第二步是消灭军阀阎锡山的省军，在山西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第三步是向北进军，经绥远或察哈尔指向蒙古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取得联系。

这个计划得到了许多人的原则同意，但都又担心黄河是天险，渡过去后有回不来的可能。特别是彭德怀，认为东征阎锡山是以不足的兵力继续长征，如果途中敌人采取措施牵制我军，红军主力可能不能返回，这是对陕北苏区的存在构成威胁。

彭德怀回忆说：1936年，大约是1月中旬，接毛主席电报，决定东渡黄河，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我接到军委这个指示后，是拥护毛主席这一决定的，但是内心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13000余人。如受挫而强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在这一点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复电同意外，还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须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我这种想法，反应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兴，他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对于东征，原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也激烈反对，他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写了一封长信，名曰《对战略的意见书》，认为红军东征将损害苏联的和平政策，客观上成为日本侵略蒙古的借口，甚至导致苏日战争。也会重新点燃内战的火焰，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向华北扩大侵略的借口。据此，他声明拒绝参加东征的红军部队。

为了统一大家认识，毛泽东在1936年1月27日主持召开了东征军事会议，尽管会议上争论很大，但经毛泽东的说服，会议统一了认识，东征行动

如期举行。1936年2月20日20时东征正式开始，装满红军的近百只小船悄悄地划向黄河东岸。东征军被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毛泽东任政委，亲自领导指挥（彭德怀说：毛主席是以军委主席兼抗日先锋队政治委员亲自出征的，一切措施都是他制定的。灵活机动，所耗甚少，收获很大）。

至4月中旬，蒋介石派出嫡系部队10个师，由陈诚率领分两路进入山西。阎锡山也派了5个师和2个旅从7个方向扑向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也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派兵向黄河渡口前进，控制红军的退路。同时，蒋介石下令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陕北，威胁红军根据地。这种情况下，为避免不必要的决战，利于团结抗日，毛泽东下令红军迅速撤回陕北。他带着一部电台，坚持在河东指挥全军渡河到最后。

东征军取得的战果是令人鼓舞的，75天的战斗共歼敌17000余人，自己扩充新兵约8000人，筹备了40万元左右的现金和数量可观的粮、油、盐等物资，大大补充了红军的供应。更重要的是迫使阎锡山把伸入陕北的4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对陕北根据地的压力。当然，最主要的收获还在政治上：它宣传了中共瓦窑堡会议决定的抗日主张，把红军抗日的大旗插到黄河以东，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高潮。彭德怀后来回忆说：进军山西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

红军东征再次证明了毛泽东的战略目光和指挥能力。而彭德怀则强调了军事困难，没能及时跟上毛泽东的认识，对此不应苛求，他毕竟是个军事领导人。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倾向肯定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仍然改变不了百团大战所遭受的在评价上的戏剧性变化，即由开始时的赞扬、肯定性评价变为后来的批评、否定性评价，特别在彭德怀被罢官后，更被指责为“替蒋介石效劳”、“暴露了八路军力量，应该对皖南事变负责，是造成根据地1941年后极端困难的主要原因”等，毛泽东先是在百团大战后不久打电报祝贺彭德怀指挥取得的胜利，后来又有了新看法。1943年时他默认了一些人对百团大战的批评指责，继而认为彭德怀搞独立王国，是搞将在外不受君命那一套。

那么，哪一种评价是符合百团大战实际情况的呢？换句话说，毛泽东为什么改变了对百团大战的看法。

百团大战是彭德怀自己提出来的，这个决定起因于当时的危急形势。换句话说，彭德怀认为当时形势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战役是有充分依据的，尽管这种方式违反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提出的谨慎战略。

彭德怀的依据之一是利用对日作战揭穿国民党的谣言，制止已经出现的妥协投降倾向，争取时局好转。1939年9月，德国人入侵波兰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展开后，法西斯势力一时极为兴盛，法国投降，英国被迫退出欧洲大陆。德、意暂时得势的国际形势给日本服了一针兴奋剂，日本军部迅速制定出“不拘方法以求中国事件快速解决”的计划，为踏向南洋领域准备条件。为此，日本采取了诱降和军事打击交替使用的方式——1940年初，日本政府正式开始了旨在诱降蒋介石集团的“桐工作”，由日本情报机关和国民党情报机关秘密进行。至7月22日，达成了“8月初旬在长沙举行板垣征四郎参谋长和蒋介石委员长关于日华停战问题商谈会”的备忘录。与此同时，日本扩大对华军事压力；在正面战场上发动宜昌战役，6月23日攻占宜昌，并连续以空军向大后方中心城市如重庆、昆明、成都实施空中攻击，对重庆的轰炸是其高潮，造成中国军民伤亡数十万人的惨剧。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

日本军则加紧封锁与扫荡，采取修建公路、铁路、挖壕、筑堡等方式推行“囚笼”政策，封锁、切割我抗日根据地，给抗日部队造成严重困难。

日本的诱降政策得到英、法、德等国的支持纵容。英国政府答应日本封锁滇缅路三个月，截断了西南国际交通线，蒋介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他再次处于动摇之中。

对于日本的诱降政策及其所带来的危险，中共方面是十分警惕的，实际上是自抗战开始后共产党就没有放松过“反对分裂、反对投降、反对倒退”的主张，特别在1939年蒋介石提出限共、溶共、防共政策后，毛泽东也指出妥协投降是1940年中最危险的倾向。他和张闻天、朱德、王稼祥、任弼时等不断发表文章和谈话，警告一切抗日的人们，防止和反对抗日阵营内的投降行为。

百团大战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而作出的军事决策，7月22日战役预备令中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与我国西南国际交通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军于8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可能。因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展开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

可以看出，百团大战的主要目的是秉承中央精神，以军事作战影响全国局势，制止形势逆转和蒋介石的动摇（今天的事实已证明当时蒋介石确实在动摇妥协之中，并给抗战造成极大威胁）。诚然，战役预备令对敌情判断不准，如认为敌有进攻西安之可能等。但在战略和全局上的判断是正确的，而这对于统帅来说是最重要的：“统帅的聪明不在于准确无误地把握敌人的每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而在于明察敌人的战略意图。”

实际情况证明了百团大战实现了这一目的，在当时时局中起了中流砥柱作用，它破坏了蒋介石的和平行动，使日蒋会谈未能实现——当时为了迎接日本方面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到长沙会谈，已开始修缮长沙机场和清除洞庭湖中的水雷。突然出来的百团大战迫使蒋介石缩回了伸向日军方面的手臂，而这实际上挽救了蒋介石本人，使他成为领导中国抗战的领袖而避免了汪精卫的命运。这样，日本迅速结束中国战争的图谋也就完全失去了实现的可能性，对此，日本自己也不讳言，《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第55页载：

“恰好7月10日滇缅通道被封锁，援助物资的运输被切断。美国通信社驻重庆记者毫不讳言地说，由于英国封锁了滇缅通道，中国人中关于对日中和平问题的议论急剧上升，战争将在6个月结束，政府将迁都南京。这在昭和15年（即1940年）6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的时间内，的确出现了似乎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所以，应该说8年的日中战争中，蒋介石感到危机严重的，实际上是在宜昌失守的时候。中共察觉到日中进行和平谈判的危机，突然发动了如下节所谈的百团大战。”

击破国民党制造的“八路军游而不击”、“不打日军、专打友军”等谣言，也是发动百团大战的原因之一。虽然抗日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而成的统一战线领导的，但从一开始双方就进行着限制与反限制的激烈斗争，这事关抗战胜利后双方的力量对比问题。毛泽东目光长远，提出向广大的敌后进军，创造自己的力量，这一方面是抗日举动，能赢得广泛的舆论支持，另一方面又可壮大自己力量，也使蒋介石无话可说。到1939年底，八路军在不到

一年半的时间里于华北建立了上百个县的抗日政权，武装力量近 40 万。对此，蒋介石当然不能等闲视之，他也遣军北上，与中共争夺控制范围；不惜解散抗日政权，残杀抗日军民来“收夏失地”。这乃是平江惨案（国民党第 27 集团军杨森部袭击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惨杀和活埋新四军官兵）、博山惨案（国民党山东省第三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秦启荣部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惨杀八路军团以下指战员 400 余人）、深县惨案（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部袭击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 400 多人）、确山惨案（国民党河南确山县组织指挥部队进攻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杀害新四军官兵及家属 200 余人）、晋西事变（阎锡山派部队袭击抗日决死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及 1940 年 2 月朱怀冰、庞炳勋、张荫梧等联合进攻八路军总部的背景。

中共方面没有忍气吞声，而毫不犹豫地自卫反击，以武装反摩擦，1940 年 2 月，在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等的共同指挥下，一仗消灭“摩擦专家”朱怀冰部 3 万余人，稳定了局势。国民党输了理，又吃了亏，便开动宣传机器上阵，说“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毫无战绩而言”，“未闻八路军有团长为抗战而阵亡者，更未闻八路军的师长为抗战而负伤者！”“游而不击，发展实力”，“八路军判变投降，专打友军，是汉奸、伪军”等等。使很多人对八路军产生误解和怀疑，对此有必要用事实给以还击。

发动百团大战的第二个依据，也是最主要的依据，还是给予日军新的打击。当时，日军已停止正面战场的进攻，将兵力重点转移到华北，对八路军控制的根据地不断“扫荡”。他们依据几条交通线逐步向根据地推进，扩大占领区，增多据点。特别在河北、山西一带实行“囚笼”政策，修路筑堡，封锁河川，分割根据地，缩小抗日力量的机动范围。日军的据点在主要道路上相隔距离仅一里路，大大限制了八路军兵力的行动。另外，八路军的给养供应也因日军“治安强化”政策而感困难。彭德怀在 1940 年 4 月 25 日给各兵团负责人电报中说：日寇现正在拼命修筑道路，……此种阴谋若不积极求得阻止与粉碎，待其完成，将会予我坚持敌后之抗战以极大困难和不利。为此，八路军必须给敌人新的打击，决定发动交通大破袭战，破坏日军的“囚笼”政策——消灭朱怀冰部队后，八路军有必要、也有可能集中力量对付日本军队了。

制定交通大破袭战役计划的任务由彭德怀负责（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1940 年 4 月回延安）。4 月份，彭德怀、左权（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同聂荣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小平（129 师政委）、刘伯承（129 师师长）、陈赓等在 129 师师部驻地——山西省榆社县潭村举行反摩擦战役下一步计划的讨论时，酝酿集两大区主力（晋察冀军区和太行区）合作破袭正太铁路。如果日军丧失对正太路的控制，他们在山西的占领军的一切运输补给将难以保障，使其陷于极大困境而有利于八路军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敌后根据地联成一片。同时，破坏正太路有利于华北抗日军民打破“囚笼”政策，恢复力量，回击国民党制造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等谎言。

为进一步落实作战意图，彭德怀委托左权于 7 月中旬赴 129 师师部，征求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意见。左权传达了彭德怀关于战役的总设想，并说明这次破击战的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但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都要配合行动。参战部队主要是八路军 129 师、120 师、晋察冀军区部队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其他部队可自行派兵。这个计划当即得到刘伯承和邓

小平的赞同，处事一贯明确果断的邓小平说：“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之后，八路军总部制定了大破袭战役的作战计划。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传出的一束束无线电报下达关于大举破击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这封注明“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发到延安，立即被抄送给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张闻天、王明等人 and 作战局。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后，彭德怀曾被指责为背着毛泽东发动百团大战，由于这个命令延安收文原件在案，真相最终得以澄清。命令要求晋察冀军区派出10个团，第120师派4个至6个团，第129师派8个团，加上炮兵和工兵，总共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参战，其他部队可自行派兵参战。命令指出了此次战役的目的是彻底破坏正太路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和据点，较长时期的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张战果，扫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以致完全截断该线交通。随后，各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8月8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发布行动命令，规定战役于8月20日夜开始。

20日晚8点，正太路战役正式一开始，各部队投入大量兵力在多条铁路线上同时进行大规模破袭。22日上午，彭德怀和左权在总部作战室听取战役情况汇报时，作战科科长王政柱报告说八路军实际参战部队，正太铁路有30个团，平汉铁路芦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铁路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浦铁路天津至德州段4个团，邯郸至济南公路线3个团，代县至蔚县公路段4个团，北平至大同线6个团，辽县至平定公路7个团，宁武、奇岚、静乐公路4个团，加上其他部队，共计105个团。左权听后脱口而出一句话：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要仔细查对确数。彭德怀当即接话道：不管一百零几个团，这次战役就叫百团大战好了。此后，正太战役改名为百团大战了。

整个战役，共进行三个半月，经历正太战役、榆辽路战役和反扫荡战役三个阶段。八路军40万人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克日军据点293个，毙伤日伪军2.57万余人，破坏铁路和公路1900多公里，使正太铁路中断1个月之久。此战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拖住了日军进攻西北、西南的后腿，遏止了妥协和平逆流，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百团大战的消息从华北前线传向延安、传向大后方、传向全国后，得到舆论的广泛赞扬。重庆《大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力报》等都争先恐后地刊登百团大战的战绩，刊登周恩来向各界发表的关于百团大战的谈话。中共中央书记处等首脑机关也都肯定了百团大战的意义。9月18日，延安举行了有2万余人参加的“纪念九·一八庆祝八路军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向彭德怀及广大的英勇战士致敬。3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对百团大战极为高兴，他说：德怀同志，百团大战真叫人兴奋，这样的仗可否多搞一两次。泽东。

就在中国人欢呼百团大战的时候，日军却集中兵力以空前规模讨伐八路军，再次对中共造成压力，加上国民党军的摩擦和华北天灾，各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起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百团大战暴露了八路军实力引起日军报复，从而导致根据地的困难。毛泽东也是这种看法。此后，对百团大战的评价日渐变低。特别在1944年整风运动中召开的总结华北工作的会议上，人们强调了百团大战的副作用，对彭德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这些意见，彭德怀并不服气，虽然他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但仍认为百团大战成绩为主，他说：“这个战争是不是该打？我觉得可以打。但是，延长三

天不对。一是回头反扫荡，自己搞不赢，二是对敌报复估计不足。故此，在战役上有些过分，以后，关家恼战斗上又打硬了一点。总之，胜利多，损失少。损失，主要是 129 师、决死队多一些。”

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反对“百团大战造成八路军敌后抗战极端困难局面”的看法，如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张宏志就为彭德怀辩护。他认为日本于 1941 年后在华北给八路军造成巨大压力的原因是出于其仰赖华北以支撑其称霸亚洲的强烈欲念，是日本军方出于维护战略生命线的救命之计——华北地区对日本侵略战争具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被日本称为“中国大陆指导战争的基地”和“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从军事上来说，华北对日本起战略脊椎作用。当时日本战略是北攻苏联、南打英美，打中国正是从中央突破，以建立“南北准备态势”。为此必须确保华北，因为它北接满洲（延伸至朝鲜）、南接江淮（延伸至广州），倘华北不稳，日本的中国大陆线便断了脊梁，中央塌则两头垮：从经济上来说，华北对日本亦十分重要，因为上海、武汉、广州等占领区甚小，经济价值不大，而华北地域广大，物资丰富，是日本侵华军赖以生存和总动员所需资财的战略基地。这样，巩固和确保华北就成了日本进行和继续战争的根本利益所在。日中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军队从未放松对华北反日军民的进攻，随着他们进入太平洋战争的准备和实施对美开战，日本对华北的需求更加紧迫，以保证华北秩序的稳定和更多地掠夺资源。做到这一点的办法便是疯狂地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如 1941 年 8 月日军对太岳区的“扫荡”和 1942 年 5 月对冀察晋区的“大扫荡”，分别动用兵力 10 万人和 8 万人，成为整个相持阶段所有战役中用兵最多的二次，而这才是造成八路军和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地位的主要原因。

正因为如此，彭德怀在 1966 年以后写的回忆录中充满了委屈，他说：

“对于这次战役的估价，不能离开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当时担负的任务。如果抛开这些，而重于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战略方针’，我认为这样来分析和推论一次战役行动，是有点过分，因为当时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

“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百团大战是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打的，而不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打的，那么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是谁造成对八路军、新四军那样多的惨案呢？甚至有人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对人民解放区前所未有的进攻，也是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使蒋介石过早警惕。这些人是健忘呢，还是有意违反历史事实啊？1927 年上海‘四·一二事变’和长沙的‘马日事变’，这又是谁在预先暴露了力量呢？谁在‘四·一二事变’前打过百团大战呢？蒋介石打过十年内战，在十年内战爆发以前，又有谁打过百团大战呢？肯定回答，没有人打过百团大战。那么，蒋介石集团为什么要打十年内战呢？这是他这个集团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他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代表集团，在抗日战争期间，尚且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有几百万军队，又有帝国主义援助，哪有不反共反人民的道理呢？哪有不进攻解放区的道理呢？

“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在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你们的看法为什么和毛主席的看法那样不一致呢？你们不是站在



演讲台上，用劲地叫喊打倒彭德怀吗？还喊打倒这，打倒那。你们想一下吧！你们自己呢？不是三五个人坐在房间里闲谈，而是多少次在多少万人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讲，放出来的毒嘛！

“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特别是在打了反摩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摩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在当时，只有抓住敌后的空虚，给以突然猛袭，才能有力地调动敌人，给予打击，恢复大片抗日根据地。在敌后碉堡密布的情况下，组织这样有统一有计划的破袭，是不容易的。百团大战的胜利，对于揭露日、蒋各项欺骗宣传是有利和有利的，对于积蓄力量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当时还不给敌伪以必须和可能的打击，根据地就会变为游击区，我们就不会有近百万正规军、二百万基干民兵，和广阔的解放区。”

在对百团大战的批评中毛泽东并不担任主要角色，并且告诉彭德怀百团大战在锻炼军队方面有积极的作用。但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百团大战，不等中央批准就提前发动战役，是违背党的纪律，没有组织观念。还说是彭德怀打大战观念转不过来的表现，没有分兵发动群众，损害了根据地的发展，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闹独立自主，符合自己愿望的中央指示就支持，不符合自己愿望的就不执行，完全是另搞一套。百团大战成为彭德怀被罢官的一条罪状。

此后，百团大战和彭德怀一样被完全否定。

但是，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观点出发，我们认为还是该肯定百团大战的。因为军事上，当时八路军除 115 师和山东纵队外全部参战，日军伤亡 2 万余人，八路军伤亡 17590 人，双方伤亡对比接近 1：1。在敌我参加兵力大体相等（八路军 105 个团，日军 85 个大队）的情况下，劣势装备的八路军进攻优势装备的日军而获此战绩，在战争史上是少见的，而且它还破坏了日军控制的近 2000 公里的交通线，在 50 个县内逼迫日军部分或大部分退走；在政治上，百团大战阻止了蒋介石走向日本诱降的脚步，挽救了中国抗战，振奋了全国人民，提高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的声望。以此为契机，共产党的地位和威信开始上升，国民党的地位和威信开始下降。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最关键的是，八路军的英勇牺牲，换得了打击敌人、振奋友军、赢得民心的结果，从而奠定了中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基础。基于此，应该全面肯定百团大战。

只是，对百团大战几起几伏的不同评价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 第五章

“晚打不如早打，美国是老虎，早晚要吃人。”彭德怀向毛泽东大胆请战。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在彭德怀的指挥部里。周恩来没有马上告诉毛泽东主席。

美国人承认与中国作战是一次错误。毛泽东和彭德怀因此而自豪。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人民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队）在金日成首相指挥下，为实现祖国独立、自由、统一而战。金日成这一举动不像美国人所指责的那样是经苏联和中国同意的，恰恰相反，它是金日成的独立决定。在他看来，由于李承晚得到美国的支持，尽快发起进攻将有利于在军队人数和装备上尚占优势的人民军。很显然，对美国直接出兵的危险性，金日成预计不足。

自从1910年以后，朝鲜就被日本军队占领，沦为殖民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共同参加对日作战的美苏军队以三八线——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分别进驻南北朝鲜，处理受降及战后事宜。12月，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决定“重建朝鲜成一独立国家”，并“设立一临时朝鲜民主政府”，指定美苏两国军事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施办法。这一决定在事实上却导致了南北朝鲜的长期对立。1948年8月15日，美国支持李承晚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并派500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帮其训练和组建军队。在美国破坏朝鲜和平统一的情况下，金日成在9月9日组织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当选为内阁首相。由于出现了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金日成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干涉的条件下举行全朝鲜普遍选举，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实行自主和平统一。李承晚担心选举对他不利，力主武力统一，“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因此，双方都做了相当充分的战争准备，形成对峙。这样，统一朝鲜的任务只能诉诸于武力了，当然，他们都希望吃掉对方。

朝鲜人民军进攻迅猛，势如破竹，使李承晚军队一败涂地，它的保护人美国当然不能无动于衷。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冒雨飞往朝鲜战场实地考察。此后，他向华盛顿发出了美国应直接出兵的呼吁：守住目前战线并能在日后收复失地的唯一保证就在于把美国地面部队引入朝鲜战区。要继续利用我们的空军和海军而无有效的地面部队配合，就不能起决定性作用，除非在这被破坏的地区为充分利用海陆空军联合部队作出准备，否则我们的使命将只是白白牺牲生命、耗费金钱和丧失威信，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遭到彻底的毁灭。不到24小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声明，宣布他“已命令美国的空海部队给予朝鲜政府部队（指南朝鲜部队——作者）以掩护和支持”，授予麦克阿瑟使用地面部队的权利。于是，美军第24师、骑1师、第25师和第8集团军先后离开日本抵达朝鲜战场。同时，美国海军第7舰队和第13航空队开赴台湾，以阻止中国共产党部队对台湾的进攻，保持台湾的“中立”。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紧急决议组成“联合国军”（共16个国家——作者），8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美国决定直接派兵参战并没能阻挡住李承晚军队的溃退。6月28日，人民军攻占汉城，7月20日又攻占大田。生俘美军第24师师长威廉·迪安。到8月中旬，金日成的军队已解放了南朝鲜80%的地区，将美李军压缩到洛

东江以东仅 10000 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再往前，就是浪涛滚滚的大海了。

然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毕竟是位五星上将，他根据自己对日作战的经验和朝鲜地形南北狭长、美军海军空军力量强大又善于联合作战的优点，提出了仁川登陆作战计划。经过激烈的争吵和论证，登陆计划被五角大楼批准。1950 年 9 月 15 日深夜，美军第 7 师和海军陆战队第 1 师组成的第 10 军团在 260 多艘军舰，近 500 架飞机掩护下实施了仁川登陆作战计划并取得成功，将人民军的后方交通线拦腰截断。之后，登陆美军迅速向内陆推进，和沃克指挥的第 8 集团军相配合，猛烈攻击朝鲜人民军，重新占领汉城，并截断了人民军的退路和后方交通。

在美李军队的联合进攻下，金日成领导的人民军面临强大的压力。因腹背受敌，遭受严重伤亡。10 月 1 日，麦克阿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同一天，金日成首相和外务相朴宪永向中国政府 and 毛泽东发出了求援电报：

在美国侵略军登陆仁川以前，形势不能说不利于我们，敌人在连战连败的情况下，被我们挤于朝鲜南端狭小的地区内，我们有可能争取最后决定的胜利，美帝军事威信极度地降低了。于是，美帝国主义为挽回其威信，为实现其将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之目的，急速调动驻太平洋方面陆海空军的差不多全部兵力，于 9 月中旬以优势兵力在仁川登陆……

目前战况是极端严重的。我们人民军虽对上陆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对于前线的人民军，已经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战争以来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飞机，每天不分昼夜地任意轰炸我们的前方和后方，在对敌空军毫无抵抗的我们面前，敌人则充分发挥其威力了。各战线上敌人在其空军掩护下，活动大量机械化部队，我们受到的兵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后方的交通、运输、通信与其他设施大量被破坏。同时，我们的机动力则更加减弱了。敌人登陆部队与南部战线已经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结果，使我们在南部战线上的人民军处于被敌切断分割的不利情况里，得不到武器弹药，失掉联系，甚至于有一部分部队则已被敌人分散包围着……我们估计，敌人可能继续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攻。如果不能继续改善我们的各种不利条件，则敌人企图是很可能会实现的。要保障我们的运输、供给以及部队之机动力，则必须具备必要的空军，但是我们没有准备好的飞机师。

……我们一定要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不让敌人把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我们一定要决心不惜流血，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争取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民主而斗争到底！我们正在集中全力，编训新的师团，集结在南部的十余万部队，于作战上有利的地区，动员全体人民，准备长期作战。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金日成的求援电使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紧急磋商，这时正是新中国的国庆一周年，当晚天安门广场的国庆焰火尚未熄灭，毛泽东就和共和国中央

领导人在颐年堂里开始研究出不出兵的问题，一直讨论到天亮。于 10 月 2 日凌晨作出出兵援朝的决议。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

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认为出兵已是刻不容缓，请林彪带兵赴朝，但林彪不大赞成出兵，称病推辞。中央书记处遂改派彭德怀挂帅。毛泽东要周恩来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参加准备于 4 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10 月 3 日凌晨 1 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告诉他由于美军已越过三八线，与尼赫鲁总理原来保证的情况不一样，因而中国对朝鲜问题不能不管。周恩来要求潘尼迦通过尼赫鲁总理将中国的打算转告给英国外交大臣贝克，再转告美国。

10 月 4 日，彭德怀被召到北京。

从历史的观点看，我国与美国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早在 1946 年，美国政府就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了——它出钱出枪出顾问帮助蒋介石与中共作战。因此，1949 年 1 月 8 日毛泽东就强调说：“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作战计划之内的。这种计划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为防止美国直接出兵，毛泽东于 5 月 23 日以中央军委名义电令各野战军，指出“二野目前主要任务是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须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

1949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提醒人们警惕美国的侵略：“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报复阴谋的警惕性。”果然，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回绝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中美建交建议，只承认台湾“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在政治上孤立中国。不久，美国又在经济上封锁中国，采取了与中国人民政府为敌的政策。

既然中美之战不可避免，那么在什么地方较量呢？当时，中国估计美国可能会从三个主要方向来实行对中国的攻击，即朝鲜、台湾、越南。后来（1958 年），周恩来在志愿军干部总结会上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看是选择在什么地方。这个当然取决于帝国主义，但同时也决定于我们。帝国主义决定在朝鲜战场，这个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也决定来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想一想三个战场，大家会懂，不论从哪条来说，如果在越南作战，更不用说是在沿海岛屿的作战了，那就比这里困难得多了。所以比较起来：最有利的地形，最便利的交通，最便利的物资支援，最便利的人力支援，最便利的政治动员，还有最便利于我们取得苏联间接的帮助，不论从哪个条件上看，这三个战场来比，我看你们大家今天会同意最好的战场还是在这儿。在这个地方较量了，那是最有益、最有价值、最值得、也最有利。

正是基于这种设想和准备，1950年4月，海南岛解放已进尾声时，中央军委组建了战略预备队，调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集结中原河南作为机动兵团，起全国战略预备队的作用。应付来自朝鲜、台湾、越南方面的任何突然事变。司令员黄永胜，政治部主任杜平。下辖第38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驻信阳；第39军（军长吴信泉、政委徐斌洲）驻漯河；第40军（军长温玉成、政委袁升平），该军团正参加海南岛战役，尚未归建制，准备驻地洛阳。这种安排果真派上了用场。

这样，朝鲜战争的发生并不出意料之外，但对1950年的中国来说，仍然是个突然事件。此时，除西藏、台湾以外，鲜艳的五星红旗已插遍全中国的领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正由乡村转向城市，从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全国上下都忙于政权选举、土地改革、复员军队、恢复生产，虽然在军事上也做着解放台湾进军西藏的准备，但毕竟是和平建设代替了战争动荡。硝烟在渐渐远去，可是朝鲜战场又传来枪炮声，提醒中国不能高枕无忧。

朝鲜战争对1950年的彭德怀来说更是突然，当他10月4日下午奉中央紧急指示乘飞机匆匆赴京时，一点也没料到是出兵朝鲜问题。虽然他作为我军高级领导者知晓我军有反击美国侵略的准备，但他认为轮不着他。确实，在我国数千里的沿海地带，集结着二野、三野、四野大军，还有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应付突发事件，这些部队就近调动足够，哪用得着正在大西北全力搞建设的他老彭呀！不过，彭德怀作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在搞建设的时候并无刀枪入库的想法，相反，他要求军队作好战争准备，有备才能无患。他曾对杨得志说：我们不少同志认为没什么大仗可打了，是的，我们也不愿意再打什么仗了，好端端的一个中国已经打得七零八落了，老百姓吃了多少苦啊！可敌人的事情历来不是我们所决定得了的，总归要有些准备吧！头脑要清醒一些，对军队来说，我是相信“有备无患”四个字的。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自从得到朝鲜战争的消息后就一直关注着局势的演变，预测着种种可能。在他看来，无非是两种趋势，一是速决，朝鲜人民军很快取得胜利，将美李军队赶下海去；二是持久，美国不甘心失败，继续增兵，或者在北朝鲜登陆，扩大战争规模。从战争的进展情况看，战争转入持久的可能性和美军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日益增大。为防万一，毛泽东决定屯驻河南的第13兵团迅速开赴东北，组建东北边防军。这一步棋对后来扭转朝鲜战局起了关键作用。对于东北边防军指挥机关的人选，毛泽东也考虑再三，几十年革命，涌现出一批将才帅才，用谁更合适？毛泽东想让善于大兵团作战的粟裕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让肖劲光和肖华任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但因粟裕重病缠身，在青岛疗养，一时难以康复，而肖劲光和肖克正分别主持海军工作和总政工作，难以脱身，使指挥机构难以组织。无奈，只好先将13兵团开往东北，有勇有谋的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替换黄永胜任13兵团司令员，这是经林彪、罗荣桓建议后毛泽东批准的。

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关于保护东北边防的决定》，分别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第13兵团之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及第42军，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一个高射炮团、一个工兵团，共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赴东北集结整训。争取8月底，最迟不得超过9月底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同时，根据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建议，将上海地区的第9兵团、西北地区的第19兵团分别调至津浦、陇海两铁

路线，策应东北边防军。毛泽东还建议加快特种兵建设，迅速组织飞行团、战车旅、高炮团等。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骤变，人民军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更严重的是，美国飞机的炸弹落在我国的东北地区，侵略军的进攻方向也直指鸭绿江和图们江，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对此，我国政府提出抗议。由于中美尚未建交，我国通过印度向英、美交涉。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后，印度总理尼赫鲁向我国政府保证英、美、法三国外长会议已经说好“不过三八线，如要过三八线，也要提到联合国来决定”。但我国得到的情报是美国要过三八线，它先稳住中国，过三八线后，还要搞中国。

9月30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决不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并请印度政府向英美转达中国的态度。但美国却认为这是中国对他们的政治恫吓。为切实弄清中国出兵的可能性，美国总统杜鲁门——当时美国重点在欧洲，如果在亚洲和中国作战，就会冲击美国与苏联相抗衡的世界战略，也是美国力所不及和英法等国反对的。因此，杜鲁门不得不慎重——10月15日亲自飞到太平洋上的威克岛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会谈，麦克阿瑟认为中国或苏联出兵的可能性很小，他说：中共在满洲集结30万大军，是事实，然而，以我的专业知识判断，在联军掌握空军优势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不会愚蠢地往韩国前线投入大规模的正规军，因为它的主力将会在出平壤之前遭到联军空军的重大打击而被歼灭。麦克阿瑟作出了中国不会出兵或至多象征性地派出5至6万人的结论。杜鲁门放心地飞回华盛顿。

事实恰恰相反，在此之前，中国已经作出了出兵援朝、抗美援朝的决定。

1950年8月，金日成领导的人民军已把战场推进到南朝鲜领域，进展顺利，因而中国东北边防军集结东北只是防止意外，先做准备，看情况再说。8月下旬，毛泽东发电报给彭德怀，内容是：德怀同志，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毛泽东。

确实，出兵朝鲜不是件容易的事，还要再议，而且还有个出兵名义、出兵时机问题。再说，兵是集中在东北了，可指挥机构并没组织落实，万一过江，谁去指挥这数十万大军。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都要考虑。但因为要等等看，这些事情的讨论决定暂时限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范围内。

美军仁川登陆后，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商量（任弼时是五位书记处书记之一，当时身患重病，正在医院治疗。1950年10月27日病逝），决定让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挂帅出征。但当毛泽东把他从广州召到北京中南海面谈时，林彪婉言拒绝。他说近一段时间身体很不好，老出虚汗，四肢无力，吃不好也睡不好，头晕眼花，恐怕担负不了统率大军的重任，请求毛泽东派一名比他更健康、指挥能力上更强的同志去。或者先让别人去指挥，等他治疗一个时期，身体稍有好转后，立即赴朝。同时，林彪推荐了彭德怀。

林彪的态度使毛泽东大感意外，长期革命生涯中，我党我军领导人在关键时刻总是不惜牺牲，勇挑重担，哪有畏惧退缩者！这个林总怎么搞的？然而事情不可勉强。“那么你就好好休养吧！如果中南医疗条件不好，可以到北京来治疗，也可以去苏联。”

林彪的话是实情，中央也知道他身体弱。他的肠胃不好，又患神经衰弱，怕水、怕风，甚至听到流水声都使他皮肤过敏。而朝鲜战争条件又肯定十分艰苦，恐怕难以适应。不过，要说有病，哪位将帅没病，风风雨雨几十年，条件那么艰苦，没有病才怪呢！就说身体十分硬朗，从来没受过伤的彭德怀，也患有痔疮、胃病、慢性肠炎等。林彪用身体不适回绝毛泽东，理由太不充分。实际上他是怕打败。在他看来，与美国直接作战，取胜的可能性太小，这样的差事费力不讨好，还会损害他辽沈、平津战役中打出的威信。于是，他向中央递交了赴苏联治病的申请报告，得到批准。

对此，与林彪长期共事的聂荣臻也相当奇怪，他说以前没有发现林彪怕死到这种程度，可能不仅仅是个怕死问题，而是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打败了，有损他林总的声誉和威信，打胜了，自己也折腾苦了。

这样，毛泽东又找常委们议论，物色新的人选。对林彪的做法，几位常委都感意外。看来林彪考虑太多了，身体是不好，但还不至于不能指挥，不成理由。经过讨论，大家赞同毛泽东的提议：如果需要出兵朝鲜，派彭德怀同志去指挥。

事实证明，派彭德怀赴朝鲜指挥作战非常合适。自从1928年起，彭德怀就和毛泽东一起战斗，共同指挥过红一方面军，打过许多硬仗、恶仗、胜仗，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也指挥组织过许多大战役，有指挥大规模作战的军事才华。更重要的是，彭德怀是一位把个人功名利禄置于脑后的人，对革命工作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而且身体也好，他完全可以代替林彪。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由于林彪——他一直欣赏和信赖的军事指挥员的临战退缩，又对援朝问题增加了几分谨慎，但是朝鲜人民军危急重重，金日成又发来了求援电，不打也不行。于是，他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出兵朝鲜的问题，以免误了战机。这样，有了彭德怀1950年10月4日的北京之行（本来是10月3日接彭德怀来京，不巧华北地区细雨阵阵，云层很低，当时国内只有小型飞机，不能航行，4日上午才有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

据杨得志回忆，彭德怀的汽车几乎和北京派去的飞机同时到达西安机场。长期的军旅生活，让彭德怀养成了说走就走的习惯。他没带洗漱用具，也没有回家向夫人浦安修说一声，就象出征打仗一样急急出发了。临行前，他让秘书张养吾带了一大堆有关西北经济建设方面的资料。因为中央没有告诉他火速赴京的原因，他不知道是讨论出兵朝鲜问题，还以为是中央召集各大区负责人讨论制定三年经济建设计划呢！所以带上了一大堆西北经济建设资料。

飞机在向东的航线上平稳飞行，彭德怀没心思欣赏舷窗外的风景而闭目沉思。“究竟是什么事这么急，一分钟也不准停留？”他睁开眼，要张秘书取出西北地区开发规划纲要。他要再研究研究，作好准备，说不定到北京后毛泽东主席要考考他这个西北地区的父母官。虽然在打仗上他一点不含糊，但在西北这个穷地方搞建设，彭德怀心里确实没底。当然，彭德怀也想到朝鲜问题。他记起了毛泽东8月下旬发给他的电报。“但不太可能，如果需要增兵援助朝鲜同志，率先出动的应该是13兵团，它们是原来隶属第四野战军的主力，有什么事，有林彪、罗荣桓他们足够了。”想来想去，彭德怀仍然猜不出此行目的。“算了，不想了，到北京以后再说吧。”

下午4时左右，飞机到达北京西郊的西苑机场。彭德怀走下飞机，坐上

中央办公厅派来等候着的一辆黑色轿车，迎接的人按毛泽东的交代要送彭德怀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彭德怀说：不是说不能耽搁吗？直接去中南海。车到中南海丰泽园，周恩来出来迎接，一起进入颐年堂。这里，正在进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和毛泽东打过招呼后，随便找个椅子坐下。“原来中央在讨论出兵朝鲜之事，自己没有准备，先不要说话，好好听。”于是，彭德怀静静听着每位领导人的发言。

《彭德怀自述》第257页载：我刚到，未发言，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干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来想，也应当出兵。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援助朝鲜，那又怎样显示得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么说心里也难过。”我把主席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

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之托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去中南海。因为4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没发言，毛泽东想听听他的意见。

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两人在沙发上坐下，毛泽东就问彭德怀想得怎么样，彭德怀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朝鲜的决策。毛泽东又问：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彭德怀问：中央不是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毛泽东谈了林彪的情况后说：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这个准备吧？彭德怀沉默一会后，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讲：这下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你摆摆你的看法。

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继续举行。在其他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主张参加：“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好嘛，我看德怀同志的意见很好，”彭德怀话刚说完，毛泽东就接上了茬。“我给大家通报个情况，经过和少奇、恩来、朱德等同志的商量，我们想让彭德怀同志率兵出征。我也同德怀同志谈了，他同意，好吧，德怀同志，我谢谢你！党和人民谢谢你！你是临危受命哪……”

会议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在10月15日。

10月7日晚，彭德怀告诉他的秘书：该准备走了，收拾东西，去朝鲜。



把秘书搞得很吃惊：怎么去朝鲜。等他明白情况后问彭德怀要不要回西安先安排一下，彭德怀把眼一瞪：“安排什么？那儿没我地球照转，工作交接由中央负责安排。时间很紧，我得很快到东北。”确实，和美国人打交道，不那么简单，彭德怀心里也很重。第二天一早，彭德怀就赶赴沈阳，在登上停在东郊机场上的飞机前，他才想起让秘书给他夫人浦安修发个电报，说明情况。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并秘密地传向东北边防军：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当天，彭德怀与高岗率领临时指挥所人员飞到沈阳，住在东北局三经路招待所。晚上会见了朝鲜内务相朴一禹。第二天，他不顾疲劳，立即召开军级以上干部会议，要求各军在10天内做好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随后，他与东北人民政府负责人研究作战配合、筹建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机关等事宜，忙得不可开交。就在这时，11日深夜，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打长途电话到沈阳，要彭德怀火速回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有关出国作战问题。

彭德怀被紧急召回的原因是苏联方面原定由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决定，理由是他们没有准备好。彭德怀接到了这样的电报：

彭（德怀）高（岗），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

（一）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13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彭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毛泽东

13日，彭德怀和高岗到达北京。中共中央经过再一次讨论后，决定不管有多大困难，都出兵朝鲜。10月13日凌晨，毛泽东的电报送到周恩来手里：

恩来同志：

……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到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三日

政治局会议作出有无苏联空军参加中国都出兵朝鲜的决定后，在北京的彭德怀立即急电东北部队，要他们继续作好战争准备。10月15日，彭德怀

飞回沈阳并立即到安东，并召集了师级以上干部会议。

很显然，这是作战前的动员会议，要动员，就要讲深讲透，于是彭德怀在会上讲得很多、很全面：

中央经过反复讨论和慎重考虑，认为对朝鲜战局不能置之不理。就是说，我们要积极支持北朝鲜人民反抗侵略者，帮助他们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我认为中央这种决策，是十分必要和非常正确的。不过，对这个问题，在党内是有不同看法的，同志们都是党员，如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讨论。

意见主要是两种，一是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朝鲜，其理由是：第一，我们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治愈；第二，土地改革工作尚未完成；第三，国内的土匪、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第四，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尚不充分；第五，部分军民存有厌战情绪等。总之，一切准备不够，主张暂不出兵。另一主张是积极出兵援助朝鲜，因为我们准备不够。敌人的准备也是不够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准备不够。据中央军委的材料，美国的陆军共有 21 个师，有战斗力的 17 个师，海陆空军共有 146 万人，连最近动员的一部分合计 150 万强，到明年才可达 200 万人，其中陆军只有 83 万多人。英国和法国的兵力更不够。法国在越南常打败仗，英国的困难也很多。帝国主义集团既然准备不够，为什么又要打呢？主要是想以打来巩固他们的内部，扩大他们的影响，来争取一些动摇的国家继续加入他们的阵营。仁川登陆，侵占汉城，美国又抖起了威风，我们必须及时地给以打击。如果我们不积极出兵支援朝鲜革命政府和人民，国内外反动派的气焰就会高涨起来，亲美派也会更活跃。如果美国占领朝鲜，对我们就是一个直接威胁，它就可以把兵力转向越南、缅甸，到处搞鬼，我国就将陷于被动，国防、边防都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在国际影响上也不利于我们。

三五年以后再打，让我们松一口气，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三五年以后还是要打的，我们三年五年辛辛苦苦建设起来一点工业，到那时还是要被打得稀烂，而那时日本已被美国武装起来了，可能出动较大的军队，我们再制止侵略就很不容易了。还有西德，也会很快被美国扶持起来，它的钢产量很大，不容忽视。这样看，目前打也许更有利些。当然，我们目前不希望大打，也不向美国宣战，而是以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支援朝鲜革命战争。要想取得和平，就必须经过艰苦严重的斗争。我国革命已经胜利了，世界革命力量也已取得了优势，但如我们袖手旁观，不积极帮助邻国反抗侵略者，就会给世界革命泄气。另一方面，我们要建设国防，建设重工业，三五年是办不好的，因此，我们的陆军、空军装备在三五年内也不可能特别改善，海军就更谈不上，所以迟打不如早打好。

在敌人方面，空军占有优势，坦克和炮兵也占有优势，机械化程度比我们高得多，但战术方面我们比敌人强，敢于近战，用炸药，拚刺刀，投手榴弹，这些都是敌人害怕的。而且我军的政治质量远比敌人高。敌人的困难正在增加，优势长久不了，他们军队的补给运输来回一次需要 38 天，更重要的是，他们是非正义战争，兵心不稳，士气不高，而我们是正义之战，这是决定胜负的基本因素。

在作战方法上，我们要改变过去在国内战争中采用的运动战，大踏步地前进和大踏步地后退不一定适用朝鲜战场。因为朝鲜地面狭小，敌人又暂时占有优势，所以要采用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敌人进攻，我们要把它顶住，不使它前进，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深入敌后，坚决消灭之。保守

土地是我们的任务，但更重要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只要有机会，哪怕一个营、一个团，也要坚决地予以歼灭。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大家应根据战场情况的发展具体应用。

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者，援助朝鲜，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也是巩固我国革命的胜利成果，保护东北的工业，巩固我国的国防。因此，我们进入朝鲜千万不要骄傲，不要以大国援助者的身份自居，要尊重朝鲜同志，多看他们的优点，对人家的缺点不宜随便批评，更不要专挑缺点毛病。如果找缺点，国内就有，何必跑这么远呢？我们的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给人家留个好的印象。

另外，还有个纪律问题。出国作战，纪律问题至为重要，我们军队有良好的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博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赞扬，也是我军不断胜利的保证之一。到朝鲜后，更要发扬这个优点。一般说来，下列情况下容易犯纪律：（一）打了胜仗的时候；（二）打了败仗的时候；（三）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这三个时候要特别注意。要胜不骄、败不馁，遇到困难不埋怨。虚心谨慎，亲密团结，一定能战胜敌人。

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我相信我们能胜利地完成任

务。彭德怀讲了一个多小时，从决策讲到敌情，从作战方针讲到军队纪律，可谓相当细致，不愧是位勇谋兼备的将军。

尽管如此，彭德怀还是觉着身上的担子很重，从外表看，他脸上凝着一层忧虑和严肃。他深知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分量：此次作战非同以往，美国陆海空三军相互配合，现代化装备，而志愿军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加上异国作战，地理民情不熟，语言不通。而且朝鲜已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部队作战所需物资绝大部分不能就地解决，而要靠国内供应。但是不管困难多大，也必须打赢这一仗。毛泽东已经说过：既然中国决定了出兵，那么首要的问题是能战胜敌人，能解决朝鲜问题。

打这一仗，责任重大哟！

当然，他也想到过指挥问题。入朝的部队多是原来四野的，按说林彪来指挥更合适。在北京的时候，彭德怀曾问过毛泽东为什么林彪不出来，第一次毛泽东没正面回答，第二次问，毛泽东作了解释：原来我们考虑的人选是林彪，但他对出兵朝鲜有不同看法，跟他谈，他递来了傅连璋写的病情诊断书，要求去苏联治病。总不能让他不生病吧！不过，我看他的病在这里——毛泽东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他是害怕打不赢麦克阿瑟，失了他林总的威信。他是脑袋里有病。老彭啊，你是勇挑重担，三军易得，良将难求啊！

彭德怀就不怕打不赢？他也翻来复去地想过这个问题。打赢仗是不容易，但可能性却是很大的。国内战争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三年消灭国民党军 800 万，了不起啊！战争锻炼出了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锻炼出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指挥员，特别是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战胜美国军队还是很有信心的。当然，也可能会打烂，这无非是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原来不打算解放战争 5 年才能完成吗？既然自己主张出兵，主席点将后岂能再推倭。不过彭德怀确实没想到过推托，所以当有人说他挂帅是不服老时，他没作任何解释。彭德怀有句名言：在困难面前低头、认输、后退就是自我毁灭、自我背叛，是极其可耻的。

不过，彭德怀也承认此次赴朝的艰苦性，他说：“我这个人命中注定和苦地方打交道，从参加革命那会儿就在苦地方，长征的苦就不用说，差点

活不下来。抗日战争在太行山，解放战争在大西北，这次又要去朝鲜，到的都是苦地方。但话说回来，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和‘穷’、‘苦’打交道，没有穷苦，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这是彭德怀刚刚组建起志愿军领导机关时说的话。

经过紧张的准备，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做到一声令下即可出动，但就在大军准备过江之前，毛泽东再次急电彭德怀 18 日回京，商议作战方针问题。因为敌人在进攻过程中丝毫没有停在平壤、元山一线的迹象，反而迅速推进。这样一来，我志愿军就要迅速过江并改动原定作战设想，由于敌情变化太大，电报电话说不清楚，只好让彭德怀再跑一趟了。18 日晨，彭德怀、高岗等人乘飞机到达北京。经过磋商，决定军队迅速过江并隐蔽集结到预定区域设防，寻找歼敌时机，同时加强电报联系。

彭德怀行前，毛泽东设便宴招待，为他送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作陪（江青因事外出）。毛泽东没有专门的餐厅，便宴就在书房兼办公室客厅的“菊香书屋”。席间，毛泽东指着岸英对彭德怀说：我这儿子不想在工厂干了，他想跟你去打仗，早就交上了请战书，要我批准，我没得这个权利，你是司令员，你看要不要这个兵？

彭德怀很感意外，马上说：不行，不行，去朝鲜有危险，美国飞机到处轰炸。你还是在后方，搞建设也是抗美援朝嘛！

毛岸英听后有些着急：彭叔叔，你让我去吧！我在苏联时当过兵，参加过对德国鬼子的作战，一直攻到柏林呢！

彭德怀把脸转向毛泽东，目光中透着询问。毛泽东接话说：我替岸英向你求个情，德怀，你就收下他吧，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要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啊！事已这样，彭德怀爽朗答应，行，我收下来。不过，岸英，你要听我的安排，你不是会俄语吗？就留在我的司令部里当翻译吧，怎么样，岸英，你愿意吗？毛岸英连忙答应下来。都说彭德怀心粗，这次却考虑得很细：父亲送长子出征，说明了毛泽东对出兵朝鲜的决心和信心，自己一定要保证岸英的安全。所以他把岸英留在指挥机关，留在自己身边。

最后，毛泽东举起酒杯说：为你们两人饯行喽，用一句老话，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950 年 10 月 19 日拂晓，彭德怀驱车从北京饭店出发，乘专机到达沈阳，下午再乘专机在 4 架战斗机护航下抵达安东。约五点半钟，黄昏之下，志愿军拉开了过江赴朝的序幕。按原定计划，志愿军先过两个军又两个师，但彭德怀在安东巡视鸭绿江大桥后发现江桥一旦被炸，将极大限制志愿军后续部队入朝并可能因此失却战机。他因而建议志愿军第一批入朝部队全部集结江南待命。于是，第 38、39、40、42、50、66 军数十万人马几夜之间悄悄地登上朝鲜国土——为了保证秘密推进，部队过江一律晚上进行。在部队开动之前，彭德怀已乘一辆吉普车先行过江，会晤金日成并商量联合作战问题，为节约时间，他未来得及换上人民军将军服，就乘车离开了祖国。随后跟进的只有一部装电台的卡车。如此时候，彭德怀不顾安危，亲临前线，真显将军本色。对他来说，这种身先士卒的行为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而这恰恰是他常胜的重要秘诀！

按照军委原定计划，我志愿军入朝后，先打防御战。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地区修建 2 至 3 条防御阵地。如果敌人来攻，就在阵地前分割歼灭之；

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就孤立打薄弱一路；如敌人只守不攻，我们也不主动进攻，而是充实装备，加紧训练，等空中、陆地都有压倒优势后再实行攻击。实际上是计划防守6个月之后再谈进攻问题。然而情况不同预料，美军占领平壤后继续北进，而且速度很快。相反，我军因要保持秘密入朝怕敌军飞机轰炸，行军速度缓慢，均未能进入预定作战地区，更谈不上修筑防御阵地。敌情的急剧变化要求我方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中央军委也及时来电更改布置。为统一认识，彭德怀在志愿军司令部——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的木屋里召开出国后的第一次作战会议。

我军历来强调慎于初战，初战必胜。因此，会议开始后，富有作战经验的邓华、洪学智、韩先楚副司令员都没急于开口，推让彭德怀先讲。彭德怀正呷着茶叶，他也不推辞，一边嚼着一边说：“你们要我先讲我就先讲。现在，我们原定的在防御中消灭敌人的计划不行了，在国内战争中采用的那种大踏步前进和后退的运动战法也不适用了。我们是战略反击，作战方针应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和游击战为辅。当前敌人分兵冒进，兵力分散，我们应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具体部署是这样：我以部分兵力钳制东线，主力集中于西线，以突然之势先打战斗力较弱的伪军3个师，这部分敌人位于中央，若将其全歼或歼其半数，东西两线的敌人就露出了屁股，我们就可以继续歼敌。当然，我们一口吞掉3个师没有绝对把握，只图嘴巴快活，不顾肠胃遭罪难受的事我们干不得。所以，我们先吃伪6、8两师，然后再吃它一两个师。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口怎么吃法？我看要引敌人到有利于我的地形上来打！”

但是这种计划也被迫再次改变。因为敌军是以师、团为单位的分散冒进——在他们看来，北朝鲜人民军已经溃败，中国军队也未参战，推进到中朝交界的鸭绿江一线指日可待，因而极端狂妄，不怕分兵散进。这样，我方集中兵力聚歼敌人非常困难，而也要采取相应的以分散对分散、分头歼敌的办法。

10月25日，彭德怀亲自起草电报，向毛泽东报告了他最新决定的作战意图：“敌人以坦克数量和汽车十数辆组成一支队，到处乱窜。我企图一仗聚歼两三个师甚困难，亦再难保守秘密。故决定以军和师分途歼灭敌人一个团和两个团（今晚已开始），求得第一战役中数个战斗歼灭敌一两个师，停止敌乱窜，稳定人心，是十分必要的。”次日14时，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的做法：先歼灭敌人几个团，逐步扩大，歼灭更多敌人，稳定人心，使我军站稳脚根，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新的作战方针使志愿军在东西两线上处处主动，伪军处处被围被歼。我40军先在温井以东歼敌伪6师1个加强营，随后又消灭2个营，云山、熙川之敌也被攻击，首战获胜。但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人到朝鲜充其量是象征性地出兵，不足为惧，他用美军代替吃了败仗的伪军，继续分兵冒进，声言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朝鲜战争。沃克中将指挥美第8集团军（这是美军主力）在西线，阿莱蒙德少将指挥第10军在东线，分头向前推进。但中间相隔着宽80公里的间隙。针对敌人的分散状态，彭德怀召集将领们研究决定从敌人右翼实行战役迂回，割断敌人南北联系，将敌各个歼灭于清川江以北。断敌后路的重任落在了13兵团王牌主力38军身上。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作战，我42军在东线顶住了美伪军的轮番进攻，完成在东线牵制敌人的任务；我40军消灭伪军数千人；特别是39军组织的云山战役，歼灭了美军工

牌骑兵第1师第8团大部及伪军一部，还击溃了增援云山的骑兵第1师第5团，共消灭敌人2046人，其中美国1840人，击毁缴获大批火炮、汽车和枪弹物资，震动白宫。就连日本的军事家也对云山之战大加赞赏。后来，日本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将这个战例作为模范战例，收入《作战理论入门》一书，作为军官学习的基本教材。他们认为中国军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作战突然，敢于实施夜间白刃战等，都是值得学习的。

但是，我38军却因判断敌情失误，使熙川之敌逃脱被歼厄运，随后又没能完成截断从云山、泰川撤退敌人退路的任务，使我军在清川江以北地区各个歼灭敌人的胜利大打折扣，破坏了可能歼敌两三个整师的战役计划。本来38军断敌逃路是全局的关键，在整个作战计划中是“第一要事，其余都是第二位”，毛泽东也亲自加以关注、安排，告诉彭德怀：“只要我38军全军及42军1个师，能确实切断敌人清川江后路，其他各军、师能勇敢穿插至各部分敌人的背后，实行分割敌人而各个歼灭之，则胜利必能取得。”但结果38军太过慎于初战，未实现毛泽东彭德怀所寄厚望，对此，彭德怀勃然大怒，他厉声地说：

38军的动作太慢了！我们告诉你们那里只有敌人一个营，力量空虚，为什么慢慢腾腾？为什么进攻这样迟缓？为什么因小失大？你梁兴初有什么了不起，胆大包天；老子让你打熙川，你们说熙川有个黑人团。什么鸟黑人团，自己吓了自己。都说你梁大牙是铁将出身，是一员虎将，我彭德怀还没领教过。什么虎将，我看是个鼠将！一个黑人团就把你给吓住了……我身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有权惩罚违犯军令的人！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谲的本事还是有的……

彭德怀甚至怀疑38军的战斗力和军长梁兴初的指挥水平，为此，政治部主任杜平向他作了解释：38军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从松花江一直打到红河岸边，创造过辉煌的战绩。它是在红三军团一个师的老底上发展起来的，在东北一直打得很好。军长梁兴初是个好同志，在东北作战很勇敢，身上多次挂彩，是四野的常胜军长，四野首长常常表扬他。这次可能是对新的敌人不摸底，指挥起来有些犹豫。但这种解释仍然使彭德怀很不满：“我们三军团的仗，不是这样打的！拖拖拉拉，什么作风？都说梁兴初是员猛将，我看他是右倾！”

对此，毛泽东有自己的看法。当他得知38军没打好首仗的报告后，说：这不是部队战斗力弱，而是在某些具体情况下主观努力不够，处置不当。建议彭德怀在第二次战役中仍把最艰苦的任务交给38军。结果不出所料，38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出色地完成任务，受到嘉奖。

1950年11月13日，志愿军党委在大榆洞召开入朝后第一次党委扩大会议，总结第一次战役，讨论下一步方针。会议一致认为第一次战役在我军仓促上阵情况下，能毙敌15800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赶到清川江，稳定了朝鲜战局，扩大了正义战争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初步摸到了敌人的长处和弱点，增加了胜利的信心，意义重大。战前，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极为谨慎，10月23日，第一次战役前2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询问情况：

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

电报还提醒彭德怀注意发挥我军善于夜战近战的特点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现在，第一次战役打胜了，心里有了底。当然，战果没有原来预想的那么大，主要原因是对美军估计过高，顾虑过大，不敢大胆穿插到敌侧后，断其退路。另外，在战术布置上也有不妥当之处，使我军歼敌两三个整师的战役计划未完成（客观地说，这个计划是定得过高，当时我军尚没有这个能力——作者）。彭德怀在会上严肃批评了38军，提出反对右倾情绪，震动和激励了全军。

序战取胜，但敌人主力并没受到损失。而我军却因重重困难不能乘胜追击。可这也有个好处，就是我方主力尚未暴露，敌人仍然认为我志愿军只有5至6万人，他们过分相信自己的实力，继续执行兵进鸭绿江边的计划，保持着进攻势头，这为我军诱敌深入，重兵歼敌造成可能。因而我军计划第二次战役采取节节抵抗，诱敌深入，让敌人更放胆地前进，使敌人战线拉得更长，而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彭德怀自述》中说：

“我们当时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战术。我以小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而我主力控制在北镇东西地区，利用有利地形，隐蔽构筑反击阵地，引敌进攻。待敌进至云山、龟城线我预定战场反击阵地……”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了这个计划。

事实果然如此，麦克阿瑟骄横地认为我志愿军是“象征性进攻”，“装备低劣，怯阵败走”。并在11月24日下令发动了“圣诞节前返乡”的全线总进攻，挥师20万人从东西两线同时扑向中朝边境。而他自己则乘专机在天上飞了40多分钟，要亲眼看看中共军队败走时的零乱场面。尽管他什么也没看见，仍是得意地命令他的军队大胆地前进。

面对敌人的进攻，彭德怀除在军事上精心准备外，还与政治部主任杜平商量，决定释放一批战俘，以宣传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政治上瓦解敌军，减少战斗阻力，并在军事布置上迷惑敌人。本来，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实践效果也很好，在国内释放战俘是家常便饭。但当时是在国外，释放的又是美国战俘，情况变了，亦无先例模仿。考虑到多种因素，彭德怀电请中央军委指示：

军委：我们拟下一战役前，释放100名美李伪俘虏，以扩大我军优俘政策，打破敌军怕杀心理，并准备19日夜由前方阵地送出。是否可以，请速示。彭德怀邓华杜平。1950年11月17日9时。

次日上午，毛泽东就回电指示：

你们释放一批战俘很好，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志愿军释放战俘一事，很快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美联社记者怀特亥和白伶丝在11月23日的报道中承认美军战俘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友好招待。尽管这些释放者很快就被送回美国本土，我军优俘政策还是不胫而走，在美军中迅速传播，收效之快，连我们自己也没想到。对此，毛泽东很赞赏，他11月24日对彭德怀说：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效果，请准备于此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结果，在第二次战役中，出现了两起百人以上美军集体向我投降事件。

然而释放战俘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迷惑敌人，计战俘回去泄露我军因敌机轰炸，弹药粮食补给困难，准备撤回国内；运输线已被炸断，一时难以修复等假情况，诱敌深入。这种做法使麦克阿瑟更自信于自己的判断：敌

军已遭受我空军的巨大打击，战斗力微不足道，保证圣诞节前结束战争。

冒进的敌人进入毁灭的巨网。我志愿军东西两大集团军——宋时轮指挥第9兵团在东线，韩先楚指挥6个军在西线，抱着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为朝鲜人民报仇的坚强信念，克服重重困难，实施了反突击作战，即第二次战役。

令人震惊的是，在反击战役开始的第一天，志愿军总部遭敌机轰炸，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牺牲在彭德怀的指挥所里。为此，彭德怀一辈子自责遗憾。

当时，由于我军没有制空权，因而前方和后方、安全与危险也就失去了绝对分界线，不像国内战争中，军师机关都是比较安全的，更不用说是总部机关了。但是在朝鲜，就是在总部机关和彭德怀身边的人，也一样面对生与死的考验。而且，为不暴露我军主力入朝目标，总部规定各部队不准用轻武器打飞机，又缺乏重武器，因而敌机横行无阻，猖狂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连牲畜行人也要狂轰乱扫。特别是对我指挥机关，多次派飞机侦察，千方百计寻找、轰炸。由于部署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司令部收发电报甚多，美军通过空中侦察和无线电测向，发现了志愿军总部的大体位置，导致“祸从天降”。

11月24日傍晚，美军侦察机曾在志愿军总部上空盘旋，很多人以为是敌人的轰炸机，没有在意，但解方参谋长很警惕，他当日接到了毛泽东发来的提醒他们注意空中敌人的电报，其中说：“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为防意外，他召集防空紧急会议，决定次日凌晨4点钟开饭完毕，总部人员全部进入防空地区。对此，彭德怀不以为然：敌机天天来轰炸，你天天躲起来呀？但洪学智副司令员还是以研究作战计划为名把彭德怀转移到防空洞。上午11时左右，四架野马式美军轰炸机飞抵志愿军总部上空。此时天空碧蓝如洗，突然，上百个银白色的亮点急速下落，因太阳的照射显得非常刺眼，那是用铝作包皮的凝固汽油弹。有人喊“美军又扔传单了”，可话音没落，炸弹就炸响了，随后升起一股股白烟，彭德怀的司令部成了火海，令人心惊又庆幸！但毛岸英和高瑞欣却没有跑出，等大火被扑灭，人们在灰烬中找到二人的遗体，已经分不清谁是谁。据警卫排同志回忆，毛岸英戴有一块苏联制造的手表，这才分开二人。

据和毛岸英在一起的参谋成普讲：那天本不该岸英值班，但他呆不住，又来值班。敌机飞来时，我觉得不对劲，跑到门口张望，看到炸弹正向下落，我刚喊一声快跑，就被一股热浪掀翻到门外沟里，幸免于难，岸英和高参谋没出来……

毛岸英就这样牺牲了。那样平凡，那样突然，那样令人遗憾，甚至难以置信。他还没来得及发挥聪明才智、勇猛威武，没来得及经历一个战争的壮烈场面，亲手去刺杀一个敌人，就倒下了……

几小时后，行政处张仲三副处长叫工兵同志钉好两口薄木棺材，用白布将两位烈士遗体裹起来放进去，安葬在大榆洞山上。大家围着遗体痛哭，彭德怀脸色苍白，双眼含泪，一脸悲愤之情。想想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来电让他注意空防，而自己忙于打仗，没有注意，他太后悔了。彭德怀在灵柩前脱帽仁立，默哀良久，沉痛地说：“毛岸英是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党中央毛主席刚任命我当志愿军司令员，他就找我报名了。”

毛岸英的牺牲，使彭德怀心情受到很大打击。当解方参谋长请示他要不要把这个消息报告毛主席时，彭德怀铁青着脸，沉吟半晌后说，岸英同志为



国捐躯光荣，我想迟早都是要报的，迟报不如早报，今天就上报。接着他起草了一份电报：

军委并高（岗）、贺（晋年）：我们今日7时已进防空洞，毛岸英同3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4架经过时，他们4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4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4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二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和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

志司 25日 16时

“马上发，报告毛主席、党中央。”彭德怀的声音充满着愤怒。复仇的火焰已在他心中烈燃，他命令韩先楚副司令员亲自去指挥穿插部队：一定要插到底，狠狠地揍美国佬！不插到指定位置，别回来见我！

彭德怀本来不大抽烟，现在却向他的参谋要烟抽。参谋把烟给他，又用火柴点着。彭德怀猛地吸了一口，却被呛着了，猛烈地咳嗽，刚吸一口的烟被扔得远远的。他突然对洪学智说：“麻子，来，杀一盘。”

一向开朗乐观的洪学智副司令此时面色沉重，他略显迟疑后，取出了棋盘。此刻，他们哪里有心思下棋？棋盘摆开了，可两人都没把心放在上面。洪学智走了一步，彭德怀却连走三步，不一会，竟发起呆来。

“不下了，不下了。”彭德怀哗地一下把棋盘掀翻了，棋子滚落了一地……他心中烦躁啊！

据警卫员回忆说：那天夜里，充满寒意，气温接近零下30℃，尤其在大山之中更觉清冷。然而彭德怀却连帽子也不戴，还把风纪扣解开，走出了作战室，任凭山风吹着面颊、脖梗。他背着手，徘徊不定，聊天无绪，不时地抬头望着天上的星星，久久地沉默后，他高声长叹：哎！毛主席把他的儿子托付给我，我怎么向他交待哟！微微的月光下，他双眼有莹莹的泪花。

彭德怀的电报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把它扣下了：战局刚开始。这不幸消息会刺激毛泽东主席。直到1951年1月2日，他才写信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毛泽东：

主席、江青同志：

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志司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亦常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

周恩来

第二次战役中，38军和42军一起行动，仍然担负穿插分割敌人、断其退路的重任。战前，彭德怀找到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对他说：在第一次战役中，38军动作迟缓，没有按时完成阻敌任务，让敌人逃跑了……我听说，38军在国内战如猛虎，很能打仗，这次我要再考验他们一次，看看他们的战斗作风到底怎么样。所以仍让38军担任西线迂回阻击任务。这次阻击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你们沿途遇敌不要恋战，必须不顾一切，按规定时间插到指定位置、要不惜一切代价，象钢钉一样狠狠地钉在那里。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后退。战役开始第2天，即11月26日，38军就攻下了宁远、德川。随后112师、113师、114师分别攻向价川、三所里、戛日岭。特别是三所里，如攻不下或守不住，将重复第一次战役情况，让敌人跑掉而失去歼灭敌人的机会。

113师不负重托，一夜行军145里，先敌5分钟到达。之后，38军主力迅速向三所里聚集。敌人撤退要必经此地，必须控制，而我方要坚决守住。于是激战在三所里、龙源里、松骨峰、双龙里一带展开。我38军死死守住阵地，岿然不动，立下赫赫战功。他们在远离主力80公里的情况下，阻击和牵制了数万美伪军，被阻之敌除一部分西析安州侥幸逃脱外，余敌全部被歼。更重要的是，他们强力阻击敌人50多个小时，使南突北援之敌相距1公里而始终可望而不可及。为我西线部队换来歼敌22000余人重大胜利的时间。对此，我军领导人大大加赞扬。彭德怀先是让政治部起草了嘉奖电，彭德怀读电后，觉得意犹未尽，就在电文稿的夹缝内加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但他读了几遍觉得不太满意，又亲自起草了嘉奖38军的命令，原文是这样的：

梁（兴初）、刘（西元）并转三十八军全体同志：

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三十八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30日）战果辉煌，计缴仅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

彭邓朴洪韩解杜

十二月一日

毛泽东也深为38军的战果所激动。1951年春，当38军政委刘西元随邓华副司令回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朝鲜战况时，毛泽东久久握着他的手说：你们38军在朝鲜打了胜仗，把美国佬给打痛了，名气可大哪！

就在38军坚守阵地阻敌南逃的同时，在西线担任正面进攻的我4个军，按照总部命令，不顾一切困难，不畏一切风险，不惜一切代价，勇猛推进。敌人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危险，于12月1日下令向三八线总退却，逃跑之快，令人不敢相信。

面对敌人的总退却，彭德怀一时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继续追击？要不要占领平壤？正在为难之际，毛泽东于12月4日发来电报指示：应派一个师相机占领平壤。彭德怀当即定下决心，派3个师分3路向南推进，威胁平壤，第39军116师负责相机占领平壤任务。12月6日，我军收复平壤。

与此同时，东线我第9兵团（辖第20、26、27军）在宋时轮司令员指挥下突然对长津湖地区的美伪军反击，出其不意，歼敌13000多人。但我损失也较大，主要是准备不足，11月27日，东线地区普降大雪，气温骤然降至零下30度左右。严寒的气候给部队作战和粮弹补充带来很大困难。他们来朝仓促，许多人的冬装没领到手就上了火车，加上队伍对此地山高路险、气候寒冷、人烟稀少调查研究不够，又缺乏严寒地带作战经验和准备，以致出现

大批冻饿伤亡。

占领平壤后，我军已完成并超过原定歼敌 7 个团，战线推进到平壤、元山间的方案。但毛泽东认为还存在争取更大胜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要求部队克服困难，趁敌混乱之际“向三八线攻进”。至 12 月 25 日，停止进攻，共歼敌 36000 多人，其中美军 24269 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之外的全部领土，并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延安半岛，迫使敌人在三八线以南进行防御。

仅仅经过两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将美李联军自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一带防御，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转危为安，扭转了朝鲜战局，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十分震惊。

对我军取得的这么大的胜利，毛泽东非常高兴。原来设想志愿军入朝后坚守半年再谈进攻问题，现在仅两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三八线，令人振奋呀！他在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 38 次会议上说：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打；二是能不能守；三是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相反，敌人阵营舆论沸腾，麦克阿瑟被大兴问罪，他无言以对；自己不是已保证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吗？现在他能做的，就是给美国政府一份令人沮丧的报告：

“在过去 4 天里，同 20 万以上的中共正规军进行了交战。他们在满洲正在集中强大的兵力，不断投入前线，因而我们面临全新的战争。由于这一事态的发生，联军迅速结束战争并早日从韩国撤走的希望受到了挫折。现在的问题已超出联军司令官的权限，只有联合国或者美国政府从政治上才能解决……如果不给紧急增派最大限度的地面部队来对付中共军的大举入侵，联军将逐渐被迫撤退。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我军正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大规模中共军进行苦战。如果不立即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那就几乎不能指望胜利，甚至会被消灭。因此，希望政府为了充分对付今后可能发生的事态，作出政治决策和战略计划。”

杜鲁门总统接到电报后，为了解麦克阿瑟的真意并把握战况，特别急派陆军参谋总长柯林斯上将飞往东京。在东京，麦克阿瑟向柯总长提出三个方案：第一，在有限的制约下继续进行同以往一样的战争；第二，以轰炸中国本土、封锁中国沿海、把国民党军队投入到韩国前线和向中国沿海扩大战争；威逼中共；第三，让中共军队停留在三八线以北，在联合国监督下停战。并说他主张采取第二方案，必要时也可采取第三方案。杜鲁门回信拒绝了麦克阿瑟的建议：“在韩国不能冒全面战争的风险同中共对抗。请您今后仍要关注对日本所造成的威胁，并要定下我军撤兵的妥当日期。请将军注意，可供您支配的部队，只有第 8 野战军（即第 8 集团军）。”杜鲁门总统的回答把麦克阿瑟的嘴都气歪了。

这就是美国放出和谈空气的背景。面对中朝军队的大规模反攻，美国一面说要准备动用核武器，进行核恐吓；另一面授意一些国家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决议案，玩弄先停战再谈判的阴谋。对此，我在外交上提出和谈必须具备的三项条件——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从中国台湾撤兵等；而在军事上则要继续进攻，打破敌人的意图。所以，毛泽东主张志愿军克服困难，再打一仗，过三八线，给敌以新的打击。

然而，继续一战对志愿军来说却相当艰难。缺少冬装，吃不饱饭，单衣

在身，一口炒面就一口雪的现象在志愿军中很普遍，以致冻饿减员大于战斗伤亡。也因粮弹不足，使我军无法完成预定任务。当然，出现这种情况既不是因物资缺乏，也不是后勤战线同志不努力。相反，鸭绿江边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后勤同志也非常辛苦。问题在于没有制空权，又缺乏交通工具，运不上去。到第二次战役结束时，整个志愿军的运输汽车，只相当于美军两个步兵团的运输工具。正因为如此，在敌人全线撤退后，彭德怀命令主力停止进攻，原地休整补充，准备下一次战役。

但就在此时，志愿军司令部收到了中央军委来电，转述了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发展前途的看法和意见。他说：朝鲜战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他们已放出空气，但是美帝国主义必须承认撤出南朝鲜，而且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的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这对促进美帝国主义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如同意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故应从最坏方面打算。

由于敌军主力仍未被歼灭，并在三八线附近预设防线，而我方却因连续作战，困难不少，战争可能是长期的。在这种情况下，下一仗怎么打？什么时候打？志愿军总部经过讨论，决定到1951年春季再实施第三次战役。彭德怀在最后总结说：根据敌情我情，第三次战役放在明年2、3月份最为合适。因为敌人一线兵力有13个师（旅）共20万人，我第一线兵力加上人民军也不过30万人。又经过两次作战，相当疲劳，急需休整补充。我们的运输供应较前不是改善，而是更加恶劣，越推进这种情况越严重。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

与总部决定相反，中央和毛泽东要求第三次战役提前到1951年1月上半月或更早时候。毛泽东的指示说：从12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然引起资本主义各国过多揣测，民主战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1月上半个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

显然，第三次战役放在2、3月间，是从军事形势方面考虑的，放在1月份是从当时国际形势和政治斗争需要出发的。按道理、军事斗争应该服从政治斗争，第三次战役应提前。但政治斗争又如何照顾军事斗争的实际情况呢？这使彭德怀和其他领导人很为难。但经过考虑，彭德怀还是按命令行事，要求各军于12月12日开始向三八线挺进。总部指挥所位置也及时前移至平壤东北的君子里。

彭德怀虽然同意提前发动第三次战役，但他也考虑到两个问题：一是我方运输困难，部队相当疲劳，战斗与非战斗减员已近半数，加上气候严寒，因此不宜南进过远。第二是敌人已在三八线设防，我军从山地运动战转为阵地攻坚战，来不及很好地训练。据此，彭德怀建议第三次战役以不过三八线为好。12月8日，他致电毛泽东，说明想法：

下一战役十六、七号开进完毕，十八、九号可开始攻击，估计月底可结束。如能歼灭伪一、六两师、美二十四师、骑一师或给以歼灭性打击，我即将越过三八线，相机取得汉城。如上述敌人不能消灭，或给以歼灭性打击时，即能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亦不宜做过远南进，因过远南进驱退敌人到大

邱、大田一带，增加以后作战困难。故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歼灭敌主力……

对彭德怀的意见，志愿军总部认为它是既服从政治斗争需要，又照顾我军当时实际困难的好主意。没想到毛泽东断然否定。因为当时敌人正施放先停战后谈判的烟幕，利用人们对三八线的旧观念，诱我不过三八线，以便喘息后重来。毛泽东和党中央不想让敌人企图得逞，命令彭德怀我军第三次战役必须过三八线：

彭，并告高（岗）：

十二月八日十八时电悉。（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二）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而以几个师逼近汉江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六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时期，然后再战……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彭德怀很快领会了意图。为了更大的收获和主动，只有克服困难了！但是作为前线军事指挥员，也要力求军事上的万无一失，并且他已看出两次战役的胜利，我军上下已出现速胜思想苗头。为此，彭德怀于12月19日夜发电给毛泽东，陈述他对第三次战役的意见：

毛主席：

……两次大胜后，朝鲜党政军民情绪与中国志愿军的影响大为提高，速胜盲目乐观情绪也在各方面生涨。苏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种意见，不仅是苏联意见而是朝党中央多数同志要求。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虽然较前低落，现还有廿六万左右兵力。政治上敌马上放弃朝鲜，对于帝国主义阵营来说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美国这样做，如再吃一两个败仗，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釜山、仁川、群山），也不会马上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现在十三兵团使用上不要太伤害元气，目前虽未到顶点，但从疲劳上（两个月不能安全休息）物资不能及时补给，气候寒冷，是值得严重注意的。现在开始战役接敌运动，此役除运输困难、气候寒冷、相当疲劳外，特别是由山地运动战转为阵地攻坚战（三八线原有相当永久工事）没有进行很好的普遍的教育。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我8日给你的报告中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得十三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为避免意外过失拟集中四个军（50军、66军在两翼牵制敌人）首先歼灭伪一师后相机打击伪六师，如果战役发展顺利时再打春川之伪三军团；如不顺即适时收兵，能否控制三八线亦须看当时具体情况再行决定。上述各项可否盼示。

12月21日，彭德怀收到了毛泽东的回电。毛泽东同意彭德怀在电文中对敌情的分析和作战部署：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速胜观点是有害的，望设法给以说服……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但毛泽东同时强调必须过三八线：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休整是必要的。

1950年12月31日，除夕之夜，我军集中兵力9个军（军团）分左右两大纵队抢渡临津江，在400里宽的地面上同时攻击，突破了三八线。这是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次公开身份（前两次是稳秘的）作战，也是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成立后首次大规模协同作战。我方不惜代价，冲过布满地雷的土地和层层火力网，勇往直前。经过激烈战斗，迫使敌人全线撤退。随后，我军向汉城挺进。1951年1月4日，我志愿军第50军、第39军116师和人民军第一军团攻占汉城，美李军撤退到汉江以南。至8日止，中朝军队解放了三七线以北的全部领土，歼敌19000人，战线推到三七线。此时，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

对美李伪军这次如雪崩般的溃退，新上任的美第8集团军李奇微有过形象的描述：在汉城北几里路，我碰上了第一批败兵，他们想尽快地南逃到汉城去。他们的武器抛掉了，只有几个还带着枪。我把吉普车横在路中心，阻止这条人流，然后设法找出他们的长官来。以前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我希望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事，因为设法拦住一支败军，就等于要拦住一次雪崩一样。

在志愿军收复汉城，推进到三七线的情况下，彭德怀不仅不命令部队乘胜进攻，反而停下休整，有些同志不理解，特别是苏联驻朝大使和朝鲜同志有些情绪，但彭德怀坚决不同意乘胜前进的意见。于是他接到朝鲜方面的通知，说金日成首相将于近日从平壤出发前往君子里会见彭德怀，商谈尔后作战问题。实际上是来征询彭德怀为什么在我军追击敌人到三七线附近时，彭德怀司令员突然下令收兵？下面的仗怎么打？

1月10日，彭德怀和金日成在君子里举行会谈，朝鲜外务相朴宪永也参加了。彭德怀首先谈了志愿军的作战和伤亡情况，然后解释为什么突然收兵。虽然他摆的理由都是实情，但朝鲜同志转不过来，并搬出苏联驻朝大使史蒂科夫。“史蒂科夫同志说我们不该停止南进，应利用战场有利形势向南挺进，给敌人最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敌人撤出朝鲜。”彭德怀笑笑说：“想法是好，说起来也容易，但敌人主力未损，即使再打一仗也不能让敌人退出朝鲜，何况我第一番入朝部队已连续作战三个月，减员过大，第二番部队最快也要到三四月份才到齐，我军第一线兵力在数量上已不占优势，又迫切需要休整，难呀！”“史蒂科夫同志说，困难可以克服，不应过多强调困难，要抓住战场主动权，乘胜前进，解放朝鲜。”这几句话，把彭德怀惹急了。

“史蒂科夫？他打过什么仗？二次战役后，我们停止追击，他就反对，也不想，靠两条腿追敌人的汽车轮子能有多大收获？告诉他，我彭德怀来朝鲜不是为了打败仗的！我们也懂乘胜追击的道理，也想快点胜利，可条件不许可！再往前去，敌人就会从侧后登陆夹击，不是已有仁川失败的教训吗？……”

彭德怀说的都是实话，可这点痛了金日成，当初人民军不就因此吃了大亏嘛，现在怎么又要张那么大口呢！他同意了彭德怀的分析，双方达成一致

意见，但有些勉强。他与彭德怀准备到北京与毛泽东面谈，但毛泽东建议他们不要来。苏联驻朝大使将此情况报告斯大林，认为彭德怀“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将此情况转告了斯大林，并说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之后，斯大林回电苏联驻朝大使说：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元帅。今后一切听彭的指挥。认为彭是天才军事家。后来，彭德怀因此被指责为搞大国沙文主义……

确实，三战三捷是伟大的胜利，但也因此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的高涨，“把敌人赶下海去！”甚至发生了战略意见的分歧。一些同志主张改变打法，乘胜追击。更严重的是，部队中出现了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强买东西，强借粮食物资等，“吃点喝点算什么？”骄傲自大，看不起朝鲜同志。这些情况都及时地反映到彭德怀和毛泽东那里。为此，1月19日，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出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指示：

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到来。

在朝鲜战场，彭德怀则于25日主持召开了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以统一双方的认识和决定以后的作战方针。会上，彭德怀再次解释了我军不能乘胜对敌人实施追击的原因。他说：

“为什么没有实行追击？我们在第一个战役后不但未追击，且将主力后撤了30至50公里，这是因为敌人主力还未被击破，敌人对我军力量还没有正确估计，敌人迷信其空军威力，还没有放弃进鸭绿江边的野心，这些造成我军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可能。而如果我军乘胜进行追击，则只能赶跑敌人，不能歼灭敌人。第二个战役在东线击败敌人后，曾实行相机追击。在西线亦曾以一部分兵力分三路相机追击败敌，但主力则集结休整，准备再战。事实证明，以徒步追击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不能取得大的战果。第三个战役后，志愿军和人民军都作了部分追击，追了50至70公里，亦未取得大的战果。鉴于解决交通运输、补给问题、恢复部队体力、巩固海岸防备和巩固后方安全的迫切需要，我们没有采取猛追和连续进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必须承认，伴随不断传出的捷报，我军前进的困难也日益增大。如粮食供应和弹药供应难以保证，只能达到需要量的25%左右；气候严寒，我军冻伤人员剧增，战斗力大受影响；连续作战部队极度疲劳。另从军事迹象判断，第三次战役中敌人似主动后撤，有引诱我军南进之企图，不能不防。于是彭德怀下令全线停止追击，进行休整补充，等待第二番入朝部队，重点是保证春季作战的必胜。

然而军事形势瞬息万变，就在彭德怀判断敌人不会马上进攻，我军主力进入休整之时，美伪军却发起了强大攻势，我军陷入被动。这是彭德怀军事生涯中仅有的一次失算。

1951年1月25日，麦克阿瑟和李奇微指挥重兵发动全线进攻，“五天打过汉江。”由于我方准备不足，形势极为不利。一是对敌人的进攻估计不足：此前，苏联军事顾问沙哈诺夫将军和聂荣臻都发出过美军可能正面进攻的警告，让彭德怀考虑。但彭德怀判断失误，仍然重在休整，没向第一线增派部队。当时作出部队休整一二个月的决定是依据我方情况和常规分析敌人

情况的基础上制定的，认为敌人失败后不可能迅速进攻，对其拥有现代化手段可以迅速整补，拥有高机械化装备可以迅速由进攻转入退却和退却转入进攻的有利条件估计不足。

其二是我兵力不足。第二番入朝部队有第3兵团（辖12、15、60军）、第20兵团（辖67、68军）、第19兵团（辖63、64、65军）及第47军都未赶至作战地区，从国内抽调的4万老兵和8万新兵亦未及时补入第一番部队中，因而我军现有兵力不占优势。

其三是战术上对我不利。敌人吸取教训，抓住我军供应困难、只能维持“礼拜攻势”的弱点，采取“磁性战术”，利用其现代化装备始终与我军保持接触，消耗疲惫我军。同时，他们一改过去分兵冒进的做法，齐头并进，稳扎稳打，借此破坏我军的休整，摧毁我军战斗力。

在我军坚守阵地困难，后撤又有政治影响的情况下，彭德怀难于决定，遂请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为了变被动为主动，毛泽东在1月28日致电彭德怀，明确指示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要求部队不仅不能后撤和放弃汉城，而且要南进，压过三七线到接近三六线的地区歼灭敌人。这让彭德怀大为吃惊。经过慎重考虑，彭德怀确信毛泽东第四次战役要求挺进到大田一带的设想是不现实的。他壮着胆子，于31日晚八时再次向毛泽东说明我军的困难：

……（二）我军情况：鞋子、弹药、粮食均未补充。每人平均共补五斤，须二月六日才能勉强完成。特别是赤脚在雪里行军是不可能的。将各军、师直属队和担架兵抽补步兵团，亦须数日。十三兵团主力由现地出动至洪川、横城集结，约二百公里，我们拟于二月七日晚出动，至十二日晚开始攻击。

（三）攻击部署：以邓华率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六十六军首先消灭美二师，然后进攻堤川之美七师或伪八师、二师，得手后，看情况。以韩先楚往汉城指挥三十八军、五十军与人民军一军团共同坚守汉城江南岸阵地，相机配合主力出击。拟以金雄（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员——作者注）往平昌指挥人民军第二、第三、第五军团，首先消灭伪七师，得手后向荣州前进。（四）九兵团目前只能出动二十六军共八个团，须二月十八日才能到铁源作预备队。其余因冻伤均走不动（一个师三天只走十五里）。到四月才能大体恢复健康，影响了我步兵比敌步兵优势，这是严重问题。第四次战役，敌我步兵相等，我情绪比敌高，但我还存在着很多弱点。消灭敌两三万后，敌利用技术优势，我亦不能取得两三个月的休整。第三次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次战役则带着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建议十九兵团迅速开安东补充、整训，以便随时调赴前线。

应该说，彭德怀考虑得比较周全。但是，尽管有些勉强，第四次战役的序幕还是拉开了。志愿军总部制定了“西顶东放”的作战方针，韩先楚副司令率38、50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在西线防御，邓华副司令在东线指挥39、40、42、66军让敌人深入后实行反击，争取歼敌主要是伪军1、2个师，如得手就可止住敌人，否则我撤退到三八线以北地区并坚决反击敌人。

结果，由于西线我38军和50军血战汉江南岸，以血肉之躯阻滞敌人重兵前进，使我军横城反击得手，歼敌20000余人，但因砥平里战斗失利，破坏了战役反击。加上没有战略预备队，难以制止敌人的继续进攻。在新的形势面前，彭德怀决定全线转入运动防御，分两个梯队节节阻击抵抗，迟滞、杀伤敌人，争取二个月时间，等待第二番作战部队的到来。同时也深刻认清



了美军主力被消灭前战争不会结束。朝鲜战争将是长期的，对此应有准备。

但是，这种认识，需要和毛泽东同志交换看法，有必要一谈。2月16日，彭德怀急电毛泽东要求回京向中央面报，毛泽东复电同意。18日，彭德怀到平壤。2月19日，彭德怀对邓华交待工作后专程回国，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况并陈述自己的意见，商讨今后的战略方针。20日晚，他带着二名参谋，两名警卫员，乘两辆吉普车连夜向北疾驰，21日晨到达安东，然后乘专机飞北京。飞机经沈阳时，落地加油。东北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郭瑞乐请彭德怀到休息室休息，因为他见彭德怀很疲劳。但彭德怀不愿到休息室。他说：不累，你们别管我。他不进休息室，也不吃饭，不喝水（时为11点多钟）一直站在飞机旁，等飞机加完油，即刻起飞。

21日午后，彭德怀赶到北京，下飞机后立即驱车直奔中南海，不料毛泽东不在中南海而在西山别墅（玉泉山静明园）。彭德怀又马不停蹄，立即赶赴西北。此时，毛泽东正卧床而眠。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养成了深夜工作、白天休息的习惯，但因长期不规律的战争生活和艰苦环境，他又患神经衰弱，休息前又特别难以入眠，因而保证毛泽东主席的睡眠便成了一项重要任务。他自己也因此很痛苦，谁若是不小心弄醒了他，他会非常生气，为此，毛泽东批评甚至开除过他的卫士。

彭德怀急匆匆的脚步被忠于职守的工作人员拦住了：主席工作了一整夜，刚刚睡下，他最不愿睡着后别人扰醒他，这您也是知道的，还是等他睡醒后再说吧……彭德怀似听非听，要卫士前去通报：我要立即见主席，主席知道我要来，快进去通报。然而卫士仍然坚持没有特殊情况不得影响主席休息。彭德怀上来了倔脾气：前线军情如火，能不算特殊情况，让我进去！他伸手拨开工作人员，大步闯入毛泽东的卧室。

“原来是彭大将军，我岂敢不见，快请进。”毛泽东从床上坐起，边穿衣服边说：“只有你老彭才会在人家睡觉时间闯进来提意见。”

“对不起主席，影响了你休息。前线情况确实紧急，我又是个性子人，你也晓得。我这次回来，就是向你汇报情况，谈谈我的意见，听不听由你，对不对可以讨论批评。”

“那好，你讲嘛。”

于是，彭德怀讲了他对第三次，第四次战役的看法，认为作战带有很大勉强性，我们指挥上有速胜思想，而实际情况证明战争将是长期的，彭德怀建议迅速补充我军力量，让第二番参战部队尽快上去，战争越持久，对我军越有利，最后一定能打破敌人的优势。

毛泽东一边听着彭德怀的话，一边沉思着。是的，“中央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困难处境很关心，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强求不得呀！老彭，你讲得有道理，我和恩来、少奇、朱总商量商量，拿出个指示，你还是尽快回朝鲜，那里需要你哟！”

几天后，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坚持长期作战、轮番作战的正确方针。1951年3月1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说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轮番派出军队在朝鲜坚持持久作战的方针：

“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军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问题。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志愿军应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决定编组三番轮战的部队，即将现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6

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 3 个军共 9 个军 27 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 4 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 6 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 6 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 4 个军共 10 个军 40 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 6 月中调用。根据一、二两月份作战的经验，我因有 3 个军在成兴以北战役中损伤较大，从事休整，致现在前线作战的只有 6 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之我无后备力量，在战役胜利时不能扩张战果，在敌人增援时不能打敌援兵。同时，我军南进，后方线长，供应很困难，还须留兵守备，故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前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逼敌南退，反而不利我分割歼敌。鉴于此种情况，在我二番志愿部队 9 个军于 4 月上旬到达前线之前，敌之陆军还较我占优势，我应避免进行战役性出击，而以第一番部队 6 个军及朝鲜人民军 4 个军在南汉江以北地区进行防御，迟阻敌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 9 个军到车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

3 月 9 日，彭德怀回到朝鲜前线。在此之前，我军按计划撤离汉城，在向北转移中步步抗击敌人。战役打得相当艰苦。至 4 月中旬，我第二番入朝部队第 3、第 19、第 9 兵团先后到达集结地域，加入防御序列，阻止了敌人进攻，第四次战役结束。此次作战，共歼敌 78000 余人，使其每天只能前进 1.3 公里，还要付出 900 人的代价。我方也因困难多而伤亡较大，战斗减员近 60000 人，但阻止了敌人，增加了防御战经验。

中国志愿军的胜利使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陷于痛苦的境地。由于他指挥上的失败，也因他要扩大战争到中国本土的政策与美国政府有分歧，1951 年 4 月 11 日，他接到了杜鲁门总统签署的正式解职令：

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尽我作为总统和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撤销你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军总司令、和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你的指挥权将交给马修·李奇微中将，立即生效。你有权发布为完成计划前往你选择的地点而必需的命令。

关于撤换你的原因将在向你发布上述命令的同时公诸于众。

狂妄的麦克阿瑟被打跑了，他的继任者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

由于我第二番志愿部队的入朝，使我军又具备了兵力优势而能进行伎击作战。1951 年 4 月 6 日，志愿军党委在金化郡上甘岭举行第五次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指示，讨论第五次战役计划。决定 4 月中旬发起春季攻势，争取歼灭美军 3 个师和伪军 2 个师。

1951 年 4 月 22 日，中朝两军以 15 个军的兵力向敌人实施反突击。为保证部队供应，除后勤部门保证军队 5 天的补充外，各部自带 5 天的干粮。这种措施保护了我军的作战能力。至 5 月 21 日，由于敌军增援和我粮弹接济不上，继续扩大攻势困难增加，战役第一阶段遂告结束。一个月战斗，共歼美伪军 46000 余人，击毁、缴获汽车 1000 余辆、坦克 207 辆，击落击伤敌机 236 架，锻炼了新入朝部队，争取了第二阶段作战的准备时间。第二阶段作战 6 月 10 日结束，因为敌人援兵不断增加，我方被迫收缩休整。虽然歼敌

36000 余人，但由于刚入朝的部队对美作战经验不足，目标过高，领导机关统一指挥无力，供应不能充分保证等原因，我方在收兵时受挫，特别是 60 军 180 师因转移不及时被敌人包围，除 300 余人突围外，损失 7000 余人。加上其他损失，我方伤亡约 16000 余人，付出了大的代价，教训不小。彭德怀说：这次因疏忽吃了一些亏，大家都尝到了滋味。毛泽东也认为我军第五次战役吃了亏，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

作为经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的战术，彭德怀极为同意。要求部队一个营、一个团的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

我军 4 月 22 日发起的春季攻势，使美国政府非常慌乱，他们已经看不见美军在朝鲜获胜的希望。5 月下旬，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魏德迈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承认“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也惊呼说：“我们卷入了一个错误的地方，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个错误的战争。”

美国被打疼了，不得不寻找和谈的办法来稳住阵脚。5 月 31 日，美国国务卿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透露了美国准备以任何方式与中共人物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6 月 23 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演说。杜鲁门当天就在田纳西州发表演说相应，表示“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6 月 30 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在日本、南朝鲜广播电台发表声明，建议举行停战谈判。“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官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各项：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停战会议，以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项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获得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个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艘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对此，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志愿军领导人彭德怀都认识得相当清醒：谈当然可以，但谈是打出来的，因而只能以打促谈。而且敌人一定不会诚心和谈，为防止敌人耍花招，我们应准备作战。一旦敌人乱来，我们就实施八月反击，打第六次战役。

当然，五次战争的实践也使志愿军变得现实多了，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情况下，想一口吃掉敌人几个师，一下子打到釜山，把美伪军赶下海去，只能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我们必须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逐渐削弱敌人，不断改善我军装备情况，从打小歼灭战到打大歼灭战，取得最后胜利。同时，针对敌人的和谈舆论，与其谈判，以争取主动。

这样，自 1951 年 7 月 10 日开始，双方在开城来风庄一间长 18 米、宽 15 米的厅堂里进行了谈判桌上的较量。与此同时，战场上依然硝烟弥漫，敌我双方进入了和和打打的长期对峙中。

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我军的方针和任务应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准备谈判。彭德怀马上在志愿军总部召集了高级干部会，决定在全体指战员中普遍深入地进行长期作战的思想教育；作战采取运动防御和反击相结合的拉锯式形式；指导思想采取打小歼灭战即“零敲牛皮糖”的方针，保证在一次战役中我一个军能歼美军一个营、伪军一个团的原则，积小胜为大胜；二三个月内不进行大的反击战役。谈判开始后，坚持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并以换班、轮番作战的方式作为保证。

对美国来说，谈判只是为了弥补其军事上的损失、换来军事上得不到的

东西。因而是美军代表提出军事分界线划在三八线以北的无理要求。在我方拒绝后，美伪便狂妄地叫嚣“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8月18日，美军第8集团军在东线发动“秋季攻势”，9月底又在西线发动“秋季攻势”，结果都是惨败，侵略军被歼灭157000余人。美军伤亡率的急剧上升，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严重的不安与混乱，被迫重新考虑恢复停战谈判。10月25日，双方在板门店恢复了停止63天的朝鲜停战谈判。但是美方代表继续军事恫吓，竟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细菌战，李其微将军可谓无计可施了。

就整个谈判过程而言，前方战事虽然频繁，但规模都不大，我方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对付美军实施的“绞杀战”和“细菌战”。他们利用空中优势，把成吨成吨的炸弹扔在我运输线路上，平均7米就有一颗炸弹，其目的就是要“摧毁各条路线上的每一辆卡车和每一座桥梁”。这确实给我军造成了严重困难，但也由此促进了我军高炮兵、铁道兵、工兵和空军的迅速建立及作战能力的迅速提高，帮助我军解决了能不能守的问题。对敌人实施的“细菌战”，我一方面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揭露其野蛮罪行，一方面加紧研究、化验和预防。结果，美国不但没达到目的，反而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十分被动。

终于可以舒口气了，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1951年11月初，毛泽东单独接见了志愿军归国观礼代表团团长杜平，对他说：“你回去见了彭总，问他好，告诉他目前志愿军采取的总方针是正确的。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领导下，你们取得了很大胜利，中央很欣慰。要继续努力，克服困难，夺取最后胜利。你也转告彭总，林彪现在身体不好，让他休息了，不管事了。”言外有意，彭德怀已让他放心了，那就放心干吧，不要考虑太多。

自1951年6月11日起，敌我双方都进行了积极防御，战线基本上对峙于三八线附近地区，经过两年零一个月的艰苦作战，共歼敌640000余人，粉碎了美李军的一切攻势和各种阴谋，有力地促进了停战谈判的实现。

在这期间，志愿军领导人发生很大变动。1952年4月，彭德怀因病回国，其职务由陈赓接任。6月份，陈赓被毛泽东点名回国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邓华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代政委。此后，杨得志等人先后负责志愿军的领导工作。

赴朝鲜前，彭德怀就患有慢性肠炎和严重的痔疮。1952年3月，他的头部又生了个瘤子，身体日见消瘦。同志们多次劝他回国治疗，他总是不肯，一说军事形势太紧张，二说一点小毛病死不了人。周恩来知道他的脾气是不下命令不肯休息，便电告他回国治疗，还特意强调要他休息是毛主席的命令，同时派国内医生前往志愿军总部。于是，彭德怀打算5月后起程回国。但因中央考虑彭德怀的健康，多次电促，彭德怀遂于4月7日起程回国，4月12日到京后住在北京医院治疗。对外称“农业大学王校长”。

彭德怀住院后，医院安排护士王春玲专门护理。她还不满20岁，留着齐耳短发，待人天真活泼。当院领导向她介绍彭德怀是新来的“王校长”时，王春玲一点也不信，但她只眨了眨眼，没有吱声。后来她说：“当时我心里想：他哪像个校长，倒像个农村干部。”

做过手术后，彭德怀只能躺在病床上休息。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一下到寂静异常的医院，彭德怀感到非常闷得慌。他就找书来看，“校长嘛，哪能不看书？”此时王春玲已从来看望彭德怀的卫生部长傅连璋之口得知“王校长”是彭德怀，可要求依然严格，禁止彭德怀看书。但她却被彭德怀说服了，彭德怀说：我这个人打柴出身，没读过多少书。不是不想读，是生活逼得我

没办法读。我十几岁就给人家挖煤当长工呀。俗 195 话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咱们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得有很多很多的知识，知识越多越好，你也要多读书学习哟！

看着王春玲每天热情而周到的护理，彭德怀心里很过意不去。这是他的老脾气：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对照顾他的人，总想问问人家有什么困难，能帮助解决的，尽力帮助，都是革命同志，要互相照顾嘛。他对自己生活却很粗心，但关心别人却很细心。彭德怀发现护士小王每天两次给他试脉时总是盯着他的表来计时，她的手腕上空空的，原来她没有表！

彭德怀决定送给王春玲一块表，可他无法出去买。于是当他夫人浦安修从西安到北京来看他时，他用商量的口气对夫人说：小王每天按时试脉、送茶，她的工作多需要一块表，可她没有，把你的表送给她用，行吗？

浦安修感到有点突然，可细一想，对彭德怀来说又属意料之中。多年的共同生活，浦安修已深知彭德怀的心里总装着别人的需要和群众的利益，这件事不解决，他不会安心的。于是，她摘下手表，放到了彭德怀手中，一向严肃的彭德怀紧紧握住妻子的手点点头，憨厚地笑了。他感激妻子对他的理解和牺牲——这块表浦安修得来也不容易。参加革命那么多年一直没有手表，直到 1947 年冬她去晋西北参加土改，中央办公厅发给团级以上干部每人一块表时，她才平生第一次带手表，此后，它一直伴陪妻子起居，现在，她献出来给了最需要的人。

彭德怀出院时，又送给王春玲一个漂亮的笔记本，对她说：你护理我那么长时间，很辛苦。现在我要走了，没什么感谢你，留个笔记本作个留念吧！在笔记本的扉页下，有彭德怀这样的笔迹：望王春玲同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不断进步，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出院后，彭德怀住在中南海永福堂休养。7 月份，经周恩来建议，中央政治局批准，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本来应任命他兼任总参谋长，但他不愿接受此任命。故总参谋长仍由徐向前担任。聂荣臻任代理总参谋长。

彭德怀回国期间，我志愿军在邓华司令员兼代政委和杨得志将军等率领下，与敌人进行了军事和谈判两个方面的坚决斗争，使其无机可乘。由于美方始终不愿遵守日内瓦公约规定，坚持其强迫扣留战俘的主张，使谈判因战俘问题拖延难决。1952 年 10 月 8 日，美方片面宣布休会，随即发动“金化攻势”作战，双方在上甘岭一带展开激烈交锋。美军为夺取志愿军两个加强连防守的 597·9、537·7 高地，先后动用 3 个师 60000 余人，集中 300 门大炮、100 多辆坦克和大量飞机，不断轮番进攻。平均每天向我阵地发射炮弹数万发，将两个高地削低了 2 公尺。我军也先后投入 40000 兵力，与敌人进行激烈的争夺战，平均每天打退敌人 30 至 40 次进攻，经过 43 天战斗，歼敌 25000 余人，守住了阵地，经受住了考验。

上甘岭战役后，美军在战场上陷于困境：正面战场啃不动；扩大伪军以抽调自己的部队保持机动来减少伤亡又非一时所能办到；使用原子弹，又慑于世界舆论和各种压力，只剩下从我军侧后登击一种可能了。为此，彭德怀和志愿军领导人商议后发出防御命令，由韩先楚坐镇指挥 38、50 二个军担负任务，随后又调 39、40 等 4 个军加入，负责西海岸防御，另调 2 个军负责东海岸，使我反登陆作战力量大大加强。我军的充分准备使美军骑虎难下，无计可施。

然而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仍然发出战争叫嚣，希望以军事方式迅速结

束朝鲜战争，不惜扩大战争规模。对此，毛泽东在 1953 年 2 月 7 日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作了答复：不管美帝国主义要打多久，我们都奉陪到底。接下来，联合国军在战场仍是连连失利，李奇微将军、克拉克将军、范佛里特将军和泰勒将军皆无起死回生之妙药。1953 年 4 月，双方终于平稳地坐在了谈判桌上，并准备于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 3 周年时签订停战协议。中国方面代表彭德怀特此赴朝。

就在彭德怀赴朝途中，李承晚制造了扣留我方战俘事件，破坏停战。到达平壤的彭德怀马上向毛泽东建议推迟停战签字，再给李伪军以严重打击。6 月 21 日，毛泽东回电彭德怀：“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作决定。再消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有了指示，彭德怀立即赶到志愿军总部，同邓华、杨得志研究确定发动金城战役，彭德怀握着拳头说：我们决不退让半步，敌人耍流氓，我们就给他的油脸上一巴掌，狠狠地打，让他老实点。对李承晚，要捏紧拳头狠敲一家伙，把他彻底打痛。7 月 13 日夜，杨勇司令、王平政委指挥的第 20 兵团和第 9 兵团一部，开始了金城反击战，一小时内即全线突破敌防御阵地，前线最远达 15 公里。整个战役毙、伤、俘敌 78000 人，是原计划的 4 倍多。这一击，有力地说明了朝鲜战争再拖下去，只能给美军和李伪军带来更为不利和更不光彩的结局。敌人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1953 年 7 月 27 日，双方首席代表哈里逊（美国）和南日大将（朝鲜）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然后他们分别送交己方的司令官签字。

几乎在同时，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在汶山美军基地、金日成元帅在平壤、彭德怀司令在开城，分别在停战协定文本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彭德怀平静而又从容地戴上他紫红边的眼镜，从笔筒里拿起从中国带去的毛笔，一丝不苟地写下彭德怀三个大字。周围不停闪动的水银灯光作证：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也是一个轻松的时刻。为了这一刻，彭德怀付出多少努力，忍受多少痛苦，等待多长时间……

7 月 31 日，彭德怀视察部队后到达平壤，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的最高荣誉——“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的光荣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彭德怀得知授勋之事后打电报给中央军委说他不愿接受。中央军委复电命他尊重朝鲜政府的决定）。彭德怀深知这个荣誉的沉重，它含着千千万万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鲜血和生命，其中也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他们为祖国、为人民、为发扬国际主义而流血牺牲，功劳应该归他们啊！我彭德怀有什么能耐，全靠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他的脸上没有出现笑容，依旧威严、倔强。

整个抗美援朝历经 3 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歼敌 109 万余人，其中美军 39 万余人，李伪军 66.7 万人，英、法、澳等仆从国军 29000 人。击落、击伤和缴获敌人的各种飞机 12000 余架（其中击落 5729 架，击伤 6484 架，缴获 11 架），坦克 3064 辆，汽车 13000 余辆，各种舰艇 257 艘。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投入了它 1/3 的陆军、1/5 的空军和 1/2 的海军，支出了直接军费 200 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 7300 万吨，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最后还是在自己发动战争的地方接受停战，这是美国的大失败。这种结果，对朝鲜、对中国、对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它提高了新中国的威望，使世界许多国家开始认识到没有人民中国的参加，就不能解决任何亚洲问题，也会影响世界重大问题的解决。

中国又一次经受住了战争的严峻考验，这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也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光荣！

## 第六章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敢教日月换新天。  
个人崇拜有两种，要搞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崇拜。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高墙围起的误区。

挽救中国，改造社会，逞中国之强盛，是毛泽东一生的奋斗目标。1949年10月1日，在几十年血雨腥风之后，他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半的报负已经实现，但他还要新中国恢复应有的地位——中国曾在数千年内保持世界领先，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他不想愧对祖先。

终于走上天安门，毛泽东笑得那么舒心。54门礼炮齐鸣28响后，他的湖南乡音飞过广场，飘向五湖四海，令全世界的人为之侧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让那些国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没有确切统计究竟有多少人为这一天的到来献出生命，而这一天的到来又使多少龙的传人热泪飞扬。

对此，世界各国有不同评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影响东西方所有人民的命运，是当代东方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整个东方从此进入新时代”，“新中国的建立是一个无可评价的历史事件，将给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新希望，给全世界争取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新的希望”。而美国和它的仆从国们则悲哀地承认他们失去了一个最广阔的势力范围和世界市场，于是便经济封锁，军事封锁，拒绝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直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当时他们还预言——与其说预言还不如说是诅咒中国的新领导人将和旧中国历届政府一样无力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或者能营建一个强大的中国。

确实，新中国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尽管西方几个大国已被战争削弱，但整个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仍大大超过社会主义阵营，而且美国已致力于促成新中国夭亡的行动。

对于美国，毛泽东曾有过好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但三年的解放战争使他恨透了满嘴“民主、文明”的白宫统治者。1949年6月，美国使用武力对中国实行海上封锁，使国内的急需物资柴油、汽油、原棉和橡胶等来源被切断，工厂要关闭，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淡，生活要困难。8月2日，面含冷笑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回国述职，毛泽东马上写了《别了，司徒雷登》，声明说：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的困难，绝对吓不倒中国人民，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毛泽东决定倒向苏联，这反映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此文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性质和所要采取的对内对外政策：积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1983年，胡耀邦为此向日本《朝日新闻》社社长解释说：当时我们是一边倒，因为无可奈何，那时世界上好多国家反对我们，美国 and 许多国家对我们实行封锁，逼着我们一边倒。

真的是无可奈何！真的是可以理解！

尽管中国曾多次拒绝斯大林的意见和忽视他对中国革命的劝告，但在建国前夕还是无保留地接受了斯大林关于革命后社会建设的战略，他使经济落后的俄国短期内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并能与强大的美国抗衡。对中国人来说，苏联是有几十年建设经验的老大哥，“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这是毛泽东的话。当然，中国倒向苏联还有更直接和更现实的原因，新成立的共和国周围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不承认共和国的合法性并在经济上封锁禁运，要从这些国家得到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几乎没有可能性，而这又恰恰对中国的工业化至关重要，毛泽东只能走向莫斯科。

1949年底，毛泽东乘火车赴苏，这是他第一次跨出国界。两位领导人还从未见过面，但已经有过交锋。毛泽东一直以自己的能力、胆略和勇气巧妙地应付来自莫斯科的指令。斯大林先在抗日时期要求毛泽东对蒋介石采取让步的策略，结果被实际宣判失误；战后，他又建议毛泽东参加蒋介石的联合政府，不要再进行武力对抗：你党应该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

“这恐怕要问中国人民答应不答应了。”毛泽东语音不重但很坚定，“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对于他们假和谈真内战的伎俩只能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此时，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互相打量，他们都是胜利者。

“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斯大林不停地问他的心腹。“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许他根本不想懂得这些道理。”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农民立场，因为毛泽东拒绝了他的建议并命令陈毅邓小平的部队停止进攻上海，以免背上上海600万居民生活供给的沉重负担。

曾三，华东地区财经工作的负责人，在接管上海前就计算出上海600万人口每天要供应粮米400万斤，煤20多万吨，很不好办。他说：“我们一打下上海，一切都要我们提供喽，我倒希望汤恩伯不要马上逃跑，如果他就在这几天里把上海这个金娃娃丢给我们，真还没有奶水来喂呢！”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在1949年5月14日致国务卿的电文中提到：共产党由于局势进展提前有点不知所措，尤其对接管上海的重任和管理能力忧心忡忡。

结果，中央军委同意陈毅、邓小平要求，推迟一个月进入上海。

斯大林认为，这是毛泽东忽视和害怕工人阶级利益的典型表现。

不过，分歧并未影响大局，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宣布中苏双方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几乎同时，北京天安门广场和莫斯科红场上聚集了欢呼的人群，庆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合作条约的签订。之后，苏联落实援助项目，派出大批技术人员到达中国各地，结果是令人振奋的：中国的工业产值以高于苏联同期的速度增长。

对此，毛泽东作过评论：中苏条约对中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使中

国能够放手地和更快地进行国内建设。很显然，他这时还没想到要超越苏联模式。

但是，对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全面恢复和建立新中国的统治秩序。1950年，共和国实行了第一次肃反行动，使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遗留武装、党团骨干和反政府的土匪数百万受到毁灭性打击。接着，共产党政府第二次大规模镇压了被美国和台湾激动起来的敌对者数十万人，充分显示了专政的职能。同时，毛泽东还想尽办法安排留用了数百万国民党政府的军政人员。

此时，彭德怀身任西北地区军政领导。

西北，占全国版图近1/3的地区，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对此，彭德怀非常清楚，他在向中央人民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西北经济条件远比中国其他地区落后，近代工业及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不到5%，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许多地方人们冬天没裤子穿。而多民族的状况又带来语言的隔阂和政治制度的不平衡，搞建设，困难不少。”

但是，治天下已成为打天下的人们无法推辞的职责，何况西北有大量的石油、煤、铁、盐和其他贵重金属，有大量的可耕地和一望无际的草原，可以成为新中国建设的工业基地和国防基地。彭德怀提出的任务是：尽快恢复新疆对苏贸易，实现中苏两国的经济合作；在老解放区发展生产，恢复战争创伤；新解放区加紧土改，巩固新秩序；军队方面的任务是剿匪、垦荒和修筑铁路等。

1950年9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彭德怀在西北地区的政绩：剿匪58000余人，破获特务案件百余件；开荒地160余万亩，兴修水利19处；10万人参加修筑天（水）宝（鸡）、天（水）兰（州）铁路；工矿生产恢复并发展；自下而上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功地进行了民族间的联谊合作。彭德怀充满信心地说：“只要我们不骄不躁，稳步前进，经过四五年的努力，西北面貌必将改变。”

然而，共和国的所有工作都受到突然到来的朝鲜事变的震动，中国人不欢迎而且一开始也未打算参加战争，因为我们正致力于国家的内部巩固。军人正成批复员，大约有140万，精锐部队集中在沿海一带，而且还要进行大范围的土改。直到1950年10月，推进中的美军已威胁到中国的东北边界，中国军队才跨过鸭绿江进攻麦克阿瑟元帅指挥的士兵。

10月4日，彭德怀被急召至北京。18日，他身负援朝军队司令员兼政委职务，随首批军队的先头部队进入朝鲜，在他身后还有26万志愿军。三年后，美国人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彭德怀从朝鲜凯旋而归。

抗美援朝给中国带来物质、人员上的重大损失，但获得了政治上的巨大收益，它成功地唤起了中国人不可抑制的爱国主义情感而帮助政府渡过难关——当时的工农业生产都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国民经济完全恢复。再说，中国第二次打败了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不仅震动西方军事首脑，而且使新中国的国际形象陡然生辉，中国人走向世界更加充满自信。

毛泽东和彭德怀都引为自豪。

正是在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次神话般的行动，得益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领导人的热情和群众的热情相互激荡，使改造的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了10年。

但是，关于这一点，中央领导人之间出现了建国后第二次大的争论（第

一次是高饶事件)。毛泽东认为农民、手工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很高，应该加快改造的速度，扩大合作社的规模。负责农业的邓子恢副总理——他在党内能够称得上是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则认为要慢一些、稳一些，结果被毛泽东说成为“小脚女人”，是右倾保守。

改造的速度骤然加快，至1956年底，全国96.3%的农户成为合作社的成员；92.2%的手工业者进入了手工业合作社；99%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和82%的资本主义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

这的确是个历史性的胜利。但它也有缺点和偏差，就是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划单一，以致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

同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宣布：中国已基本消灭了剥削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和千百万流血牺牲的革命者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在中国基本建立，下一步就是发展生产力，用电气化列车的飞轮赶超已经走远的西方人。

确实，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图景的描述使信奉他的中国共产党把1956年完成的合作化看得十分重要，认为它是中共政权得以巩固的基础并成为经济发展的转折点。理所当然，毛泽东把它作为自己的又一伟大成就。他曾对张治中说：你从1949年就已经高兴了，舒服了，我不相信，我就没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在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天，看到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确实，这时的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有了足够的威信：在过去的几年，共产党人战胜了国民党，夺取了全中国，建立了一个过去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给中国带来和平与统一的强有力的政府。建国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中国军队在朝鲜的胜利给世界带来的冲击及万隆会议上周恩来的杰出活动带来的中国外交在亚洲的崛起，都使人们明显地看到中国人的确是站起来了。

在这转折的新时刻，毛泽东再一次体现出他的智慧超群，开始规划自己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前景。他首先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没有矛盾的观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存在矛盾，即使有，根子也在外国帝国主义，因此他在苏联以敌我矛盾方式处理一切矛盾。与斯大林不同，毛泽东肯定社会主义时期依然有矛盾，但是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因而大规模的阶段斗争方式要结束。这些观点反映在毛泽东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中。为写此文，毛泽东三天两夜没睡觉，只吃一顿正经饭。几乎同时，毛泽东还写了另外一篇著名文章《论十大关系》，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注意的多种关系。可以说，中国在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中走在了前列，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和“波匈事件”使毛泽东改变了自己刚刚形成的看法——至少是他转变自己看法的开始。

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国报纸上的政论文章认为，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评价有片面性。报告给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炮弹，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国内确实有人想借此削弱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增加了困难，苏联光环的消失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有理由提出自己的政治和生活要求，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动荡。

波兹南，是波兰人民共和国西部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1956年8月，这里的工人苦于生活而提出增加工资和减少所提税的要求，省府无法答应，工人代表团便赴华沙请愿。被拒绝后，工人决定罢工，上街游行，参加者16000人，其中党员4000人，后因传言代表团成员被捕，群情激愤，抗议者便高喊“要面包和自由”、“俄国佬滚回去”、“打倒秘密警察”等口号，冲击一些机关，政府动用保安部队和坦克，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死亡54人，伤200多人。

匈牙利人民则提出了扩大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愿望，要求政府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建立平等关系。但以科拉西为首的党和政府不愿理睬，态度官僚，行动迟缓，引起群众的普遍不满。1956年10月22日，布达佩斯各大专院校学生团体召开会议，提出了反映国民愿望的三条要求：摆脱苏联控制，建立平等匈苏关系。政府给人民民主自由，重新选举党的领导人。改变苏联模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善人民生活。第二天，各界群众举行了有秩序的游行，参加者20万人。这次行动被党的第一书记格罗指责为反对苏联，受到侮辱的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冲占重要机关，政府无法控制局势。11月4日，苏联出兵匈牙利，用刺刀保护新成立的卡达尔政府。这次冲突死亡2700余人，伤约20000多人。

波匈事件的发生是苏联模式所致，也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次考验，尽管它被定为反革命动乱，但客观地说，它是人民内部矛盾未得到及时解决而演变出来的，反映了社会主义阵营局势的动荡。

波匈局势不定本来无碍中国大局，偏偏中国的百姓也有诸多不满。王学君教授在他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二卷中解释这种不满时列举了三条原因：第一，一部分干部、群众、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充分理解新制度，还需要适应过程；第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过急行动使小资产者动摇，中农利益受损，手工业合作社社员收入下降，过多的基建投资使财政出现赤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紧张，人民日常生活品供应不足，群众不满；第三，一部分干部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也不解释说明，更不设法解决。

毛泽东不希望中国重现波匈事件，但是在他看来，东欧局势的动荡安全是没有把反革命消灭干净，阶级斗争不彻底的缘故：“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特别是教授们在抗议政府中的勇敢行为使毛泽东觉着有必要改变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和评价，把他们划入资产阶级：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人工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不管怎样，中国“资产阶级”还是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准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反右派斗争不可避免，扩大化不可避免，尽管毛泽东号召的整风一开始是诚心诚意的，但有人攻击社会主义，损害共产党形象，如说“共产党搞独裁专政”，“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不民主”等，超过了毛泽东的想象和允许范围，成了“七

级台风”，原来资产阶级没有改造好，他们拥护共产党是假装的，还有一个思想上的剥削阶级，必须反击，聚而歼之。结果，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一大批正直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干部被打成右派，遭受撤职、审查、流放、监禁。

对这一段历史，李维汉作过自责性的回忆，他说：我当时是统战部部长，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错误伤害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这场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后果很严重，误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他们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的家属亦受到株连，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

1957年，中国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经济效益，它使领导人兴奋不已；同时，它也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开始；反右派运动转眼之间就能把昨日还是多年共事的战友变成敌人，虽然人们认为反右派是必要的，但它的扩大化确实是非理性因素在慢慢控制中国。从此，知识分子失去了争辩的勇气。

毛泽东的思维开始向经济方面侧重。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这个区域是他的弱项：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是不懂的，工业、商业，我就不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懂得不太多。

就像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一样，中国也不能选择建国时历史的起点。直至今日，人们还在唱“巨龙在起飞的时候，沉重的翅膀在诉说艰难。”

几年或几十年能更替一个政权，但不能改变一个社会。毛泽东着急了，其他领导人着急了，人民也着急了，我们贫穷落伍了一百多年，决不能再贫穷落伍下去了，因为马克思预言过，革命后“一天将会等于二十年”，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打破常规速度。

“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正因为没有负担，急于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急于使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急于把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变为现实的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1953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正式提出“我们国家现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工作也要大跃进。”自此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之风刮遍全国各地。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跃进没能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的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反而弄得粮食不够吃，无以为炊，很多人逃荒要饭，成千上万的人饿得全身浮肿甚至死亡，连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也几个月吃不到肉。大炼钢铁，炼出几百万吨非钢非铁的硬疙瘩，堆在那里风吹雨淋或者生锈，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据统计，整个大跃进期间的损失是1200亿元。

但是，那时的人们为政治热情和美好理想所鼓动，仍然认为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信仰，正在喊着“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跑步奔向共产主义，没有人敢或者能劝阻毛泽东，因为早在南宁会议毛泽东已把是否支持高指标和高速度上升为立场原则问题：

“1956年6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象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这篇社论我批了‘不

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

“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 40 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要恢复这三个东西，各级党委要成为促进委员会，不要当促退委员会。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打击了六亿人民的积极性，这是个政治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导致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搞建设应当用冒进的方法，要发扬敢想敢说敢于的精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结果，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被迫在会上作检讨。

当然，不同意见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央内部，李达和毛泽东就在湖北发生了争论。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在哲学上有高深造诣、写过《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的湖南同乡首先向毛泽东发问。“你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口号，是不是？”

“肯定又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毛泽东静如处女，不动声色。

“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大灾难。你脑子发热，达到 39 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 40 度、41 度、42 度……这样，中国人民就会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

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如何非常技巧地作了回答，但争论没有让他改变主意却是肯定的。

事实真的发了高烧，很多人都感到了这种变化，但只有彭德怀——这位天性里就蕴含天王老子都不怕特征的中央委员写给毛泽东一封谏言，警告他要改变做法，否则会有严重后果。出人意料的是，彭德怀因此被撤职罢官。

彭德怀只不过说出了实情，在他所到的地方，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他本来可以不说话，自己是个军人，又主管军委工作，不必管那么宽，但他无法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是党员的义务。他的意见得到很多人的共鸣，但毛泽东却不甘心承认大跃进失利。他在 1929 年的闽西革命根据地时能够容忍陈毅对他拍桌子——那时候毛泽东为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支持需要团结更多的同志，但他的第二位夫人贺子珍仍认为他不如朱德更会团结人、气量更大，为此而影响他的事业，毛泽东曾努力改正过。但此时，已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毛泽东却容忍不了彭德怀指责他领导下的国家有那么多缺点。

彭德怀并没考虑那么多，他把自己的所见所思全部端了出来。也许是因他爱之深、痛之切吧，又和毛泽东长期保持自然随便关系，说出的话尖刻些，可毛泽东毕竟是领袖，领袖是需要权威的，按空间理论来讲，彭德怀的言行突破了毛泽东的权威空间，这使毛泽东感到他个人及其路线受到威胁，特别是这时他还没获得一整套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又面临国内外众多的对手，因而他不像过去战争时那样信心十足，也不希望别人此时向他挑战。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也就理解毛泽东为何不能容忍对他恭敬而又忠诚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了，他们同样走上了威胁毛泽东个人权威及其主张的道路。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彭德怀还触及了最令人敏感的话题——个人崇拜，“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

这种威信是不行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再容忍对他个人的指责和对他所热爱事业的批评。这固然是他太骄傲太自尊，也因他对彭德怀的不满——搞军队的，干涉那么宽！总是吵吵嚷嚷指手划脚，又拿不出主意来！

“为什么以前不提，现在提？因为他们的一套那时提不出来，如果他们有一套正确的见解，比我们高明，在北戴河就提嘛！他们等到中央把问题解决了或者大部分解决了才提，认为这时不提就不好提了，故急于发难。”

“我们不知道检讨多少次了，还是抓住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讲‘有失有得’，把‘得’字放在后面经过斟酌……”

“说我是斯大林晚年，好大喜功，偏听偏信，专横独断，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残局，才能总结经验。大跃进‘得不偿失’，总路线‘要修改’、人民公社‘搞糟了’，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请看马列是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吧！”

在这种严厉的反攻下，彭德怀有苦难言。

这是一次事实与权威的对抗，强大的权威逼迫真理沉默了。

对此，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评价，认为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分歧及其结果是建国后毛泽东和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失误。理论上，它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引申到党内，造成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错误的大升级；经济上，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党、国家、人民遭受了更大损失；政治上，助长了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就像伍修权说的一样：庐山会议后，人们有一种定式心理，对毛泽东除了表示支持意见外，很难再作别的选择。

本来，毛泽东是很谨慎于他的威望的。革命的早期，他不过是众多领导人中的一员，但他有高超的战略洞察力和令人神往的暴力斗争艺术，有把马列主义拿来致用的信心勇气和智力，这一切使他率领穿着军装的农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胜利之路，不仅打败了侵扰中国领土的数百万日本人，而且把支持地主掠夺农民土地的蒋介石赶出大陆。他本人则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素有“红星越过昆仑山”之称的理论家王明对他的威胁，他的正确与远见令人佩服，赢得了在全党的威信，这些都被1945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所肯定。确实，毛泽东创造了震撼历史的功绩，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成为开创新中国的领导者，成为中华民族的领袖和解放者。

毛泽东的努力也使1949年10月1日后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不仅摆脱了弱贫挨打的局面，而且找回了在世界上的席位。这使中国人扬眉吐气，也令世界为之震动，新生的中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出现在地球的东方。

作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追求自己的国家迅速繁荣富强的愿望是可想而知的，他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雄心追赶苏联、追赶英美。但是，他的想法受到了挑战：一方面，他的愿望超越了现实，另一方面，他的观点受到异议。尼克松认为毛泽东和大多数革命领导人一样，只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这种看法显然很偏颇，但毛泽东确实在建设问题上和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人发生了分歧，而且这种分歧已成为各自显示自己的正确性和存在价值的方式。由此，毛泽东几乎批评了所有的中央领导

人，而且在他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却不为别人接受而且又无法说服别人的时候，便走上了动用权威的道路，庐山会议上倒彭只是个开始。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是以阶级斗争的旗帜开道的。在彭德怀被罢官撤职的原因中，“组织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则是最主要的原因，而这已被证明是人为的阶级斗争。

庐山会议的结束带来了阶级斗争的升调：“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由此为标志，毛泽东 1957 年提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被进一步引申到党内，造成一次大的升级。

中国走上了误区，这就是把阶级斗争提到了无可替代的地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不过，毛泽东也很清楚，在庐山，他只是把大跃进的提意见者压了下去，并没有取得他们的信服，何况彭德怀的意见毕竟来于现实，当问题暴露越来越多的三年困难时期到来时，毛泽东所能做的选择要么是承认自己的失误，为彭德怀平反；要么坚持自己的权威和主张，而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平衡全党的情绪。毛泽东选择了后者。在 1962 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而且也允许别人批评。他承认最近几年“干过许多蠢事”，“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的，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任的应当是我。”会议强调畅所欲言，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会议期间大家心情比较舒畅，二干一稀（指伙食），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作用。

然而彭德怀依然被批判，他反党反毛主席的帽子不但没有摘掉，反而又多了条“里通外国”与苏修勾结的罪名。毛泽东坚持不能给彭德怀平反的观点。但是，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事实证明毛泽东也不是永远正确，也不是绝对正确，这种现实比彭德怀对他的批评更为严峻。而主持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在处理实际工作中相继提出的新看法又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例如刘少奇、陈云先后主持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实事求是地承认了中央工作的失误和面临的严重困难，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重要措施。毛泽东却认为他们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是刮“黑暗风”，使人看不见光明，丧失信心；在农业调整上，刘少奇、邓子恢承认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形式在坚持集体经济条件下具有合理性并在农村试行。毛泽东反对他们的意见，认为是刮“单干风”，是不要农业合作化，搞资本主义；对邓小平主持的为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对待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毛泽东称之为“翻案风”，这些都使毛泽东又对实际作出了偏颇的判断。1966 年 10 月，毛泽东在会见胡志明时说：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几十年的毒，主要在 1959 年至 1962 年这四年。后来，毛泽东又对外宾说他在 1962 年初举行的七千人大会上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很显然，问题是指阶级斗争。那个时候，国内阶级斗争确实有一定程度上的激化倾向，国际上也出现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紧张等重大事件，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如何看待调整和采取什么措施调整的问题上发生深刻分歧，并被看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本来就没放松的阶级斗争之弦再度拉紧。实际上，调整恰恰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推行



后的必然结果，亦即是对三面红旗的否定。而毛泽东始终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他从事的两件伟业之一。由此他认为他的意见不被尊重，他的权威受到损害，阶级斗争依然尖锐，从现在起，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

此时，苏联操纵的反华活动越来越烈，东欧的共产主义思潮也很活跃，修正主义上台的危机感日益冲击着毛泽东的内心，后来他说：全世界 100 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但他没有退缩，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培养出来的斗争勇气和反潮流精神使他充满战斗激情，毛泽东决心向全世界修正主义开战，开辟一条反修防修之路。

毛泽东要寻找新的打击点，他找到了《海瑞罢官》并紧紧抓住不放。他不停地说：姚文元文章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内乱的发生已显征兆，对此，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很不理解，他们曾努力根据共产党成立时确定的集体领导原则从五十年代开始扭转弥漫上下的“左”倾气氛，结果不但没达目的，反而把集体领导原则也打破了，到“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把从中央到地方的第一、二把手统统打倒，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了。

如果说吴晗是中国的最不幸者，彭德怀则更令人悲哀，他再次失去了摆脱屈辱的希望，为了顾全大局，他跪拜庐山，为了反修防修，他第二次作出牺牲。

误区沉沉地笼罩住了中国，四周是权威筑起的高墙。

## 第七章

“共产主义不是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是喝西北风的天堂！这样搞共产主义，那就不叫彭德怀。”

“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彭德怀决定犯颜直谏，盛夏的庐山滚过阵阵惊雷。

1959年8月16日，突然决定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彭德怀从朝鲜回来时带着荣耀，带着自豪。1952年7月，经周恩来建议，从医院休养后的彭德怀被安排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不久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作为征战几十年的元帅，这是最恰当不过的职务，倔强朴实的性格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使他得心应手，勤勤恳恳，信心十足。虽然他当时不想接任这个职务，并专门找毛泽东谈过，甚至想离开军队转到地方工作，但当工作需要他继续肩负军事使命时，他仍勤勤恳恳，一如继往。对此，黄克诚作过详细的回忆：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彭老总把全部精力投入国防建设工作，他对卓著勋劳的各位老师历来十分尊敬。这时，他受毛主席的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更加注意倾听老师们对于国防建设的意见，除了特殊情况外，他每个星期都要邀请在京的老师开会（实为例会制度——作者），一起研究战略方针、国防工程、部队建设、国防科研、军工生产和民兵工作等重大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彭老总废寝忘食、不辞劳苦，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当时的工作非常紧张，彭德怀是推开饭碗就进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晚上还要批阅那些积案盈尺的文电。有时要在夜间去列席中央书记处的碰头会，往往一开一个通宵。

彭老总遵照毛主席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争分夺秒地狠抓战备工作。彭老总一贯崇尚实干，对那些工作不负责任，不深入了解情况的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他到军委后，立即提出各级领导人和领导机关要建立检查工作的制度，每年至少要深入基层两次，及时了解情况，发现并解决问题；发现积极分子，推广好的经验；纠正缺点，提高部队战斗力；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彭老总自己以身作则，他曾经在二、三年内每年用三、四个月的时间，详细地视察了我国的沿海地带，北起鸭绿江口，南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长达14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几乎布满了他的足迹，所到之处，他都要徒步察看地形，逢山爬山，遇岛上岛，详细研究何处设防，何处不应设防，何处应当重点设防，何处应当纵深设防。有一年春天，他的身体情况不很好，毛主席让他到青岛休养，可是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保卫祖国安全的高度革命责任感驱使他工作成癖，寝不安眠。去青岛不到一星期，他就找上当地的军队干部，一同上山察看地形，检查战备，考察了解防务情况。在名为“休养”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对山东半岛和渤海湾进行了详细勘察，提出了具体的设防方案。彭老总常说，我们这么一个大国，一百多年来都是有边无防的。在我们这一代，必须结束这种状态。

彭老总对于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极为重视，扎扎实实地做了大量工作。建国以前，我军只是单一兵种组成，要把它建设成诸兵种合成和拥有核武器的高度现代化军队，需要从多方面重新学习。彭老总不仅经常到海、空军调查

研究，学习技术军兵种知识，而且非常关心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建设，十分注意现代化军事技术的发展和现代战争的特点。为此，他专门邀请深入研究现代战争作战特点和作战指挥问题的同志给他上课，并请核物理专家到他的办公室，挂上一块黑板，给他讲解原子弹武器的原理、构造和性能。他还买了从小学到高中的数、理、化课本和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他爱学习，尽管他在革命历程中学到许多，可他只上了两年私塾，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相比，他是个大老粗。他那严肃认真、兢兢业业地钻研现代化的态度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我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彭老总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以保证我军永远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1953年下半年，有人提出一长制的问题，彭老总也表示同意，并准备采取。但遭到多数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的反对和抵制。经过认真考虑和调查研究，彭德怀转变了看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一长制只能助长命令主义，军阀主义，只会使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疏远，不能采纳。军队还要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此后，他不仅到军事院校中作过专题报告，而且在党的八大发言中进行过详细阐述，彭老总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沉浸在自己的氛围中，他不愿关注经济，也不必要去关注，搞经济有那么多的人才，周恩来、李富春、陈云等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何必操那份心。

但是，到“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他的这些功绩统统被抹煞。英国人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的分析可供我们参考，他说：

“在那个时候，国防部长彭德怀蒙受的打击是一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林彪元帅提升得比他高得多，这证实了1954年9月在政府任命副总理的名单中，林彪的地位比彭德怀高的印象；也就是说，有人（可能是毛）认为公开建立这个印象是重要的，尽管林彪看起来并不活跃，但是他的地位比彭德怀高。

“彭德怀担任政治局委员可能有11年，也许是21年，他遭受的曲折更多，三名政治局新成员都高居在他之上，其中两名是元帅——罗荣桓和陈毅，他们象林彪一样都曾经是他的部下。这些变动的直接结果是破坏了彭德怀作为国家军队中第二号人物（仅在朱德之后）的地位，并且突出强调了经济发展比国防更重要。

“彭德怀遭受挫折不仅是因为他与毛、周和李富春关于国防费用的意见不一致，而且由于是他建议从党章上删掉‘毛泽东思想’——虽然毛对此很难有明确的表示。公开的、更正当的理由也许是彭在指挥朝鲜战争中所犯的错误……彭德怀似乎确信他和毛的关系是他从朝鲜返回后变坏的，据说，他在1953年之后的某个时候曾说过：

‘我老了，失去了主席的喜爱，我对主席再不重要了。年轻的人已经上来，我不能挡住他们的路，我已经推翻了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已经实现了我毕生的愿望，我可以解甲归田了，如果我不受喜欢，那就随便吧。’‘年轻的’，彭也许指的是林彪。1954年底到1955年初，林彪在政府和党组织内提升很快。同样，林的提升部分地也许是由于毛不满意彭的结果。特别是正象后来所指控的那样，彭曾在1953年与高岗有所接触。彭与毛另一个意见分歧之点是，彭强调在现代化武器方面更需要依靠苏联的援助。不管这种种原因怎样，很清楚的是，彭德怀这颗星是从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始殒落的……”

确实，在毛泽东为新中国建设准备条件的时候，军队与党、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成为必须解决的难题之一。按理说，国防部队必须和国家主席绝对一致、这在每个国家都是如此，何况中国军队的最高原则就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军队建设上的认识并不合谐，分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二是如何安排国防建设的费用。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应该拥有核武器，有了它，中国就可以在世界上扮演更加瞩目的角色，同时也可以削减常规武器现代化所需的费用。关于军事费用，毛泽东认为它和国家行政费用一起占财政预算的30%太高，应该降为20%。但彭德怀却认为军费占30%的比例太低，有些抱怨，而且他更注重常规力量的现代化，不主张大搞核武器，因为这些新武器的研制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和非常多的费用。

这的确只是个开始，随之到来的“大跃进”导致他们更为激烈的争吵，彭德怀有耳朵、有眼睛，是国防部长，又是副总理，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不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而他的性格又使他不能哑口不言。当然，在毛泽东1958年提出大跃进计划时，彭德怀也很受鼓舞，举行赞同，他说过：“我有个认识过程。批反冒进，我没异议。大跃进我也是赞成的。但在完成生产产量上，我是有怀疑的，可我没有作声。”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彭德怀到东北地区视察，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在全国到处跑，先后跑了东北、西北和华中八、九个省，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

1958年去各地视察时的彭德怀是非常振奋的，他和其他中国人同样沉浸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宏伟目标的憧憬中：为革命奋斗几十年，不就是为了建设繁荣强盛的新中国吗？他曾为东北大炼钢铁动人场面所鼓舞，相信军事学院附属工厂在1959年能生产4500台28马力的拖拉机。在从哈尔滨至齐齐哈尔，再到沈阳的路上，他眼见到处是熊熊的炼钢炉和令人热血沸腾的标语口号，不禁赞叹说：“中国人民真正地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向着党所指引的宏伟目标开始跃进了，马克思讲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证实了，我是最近才相信这番话的。”因而他到了东北后，又去西北，内蒙古、宁夏、青海，接着是陕西、甘肃、河南、湖南等省（中间回北京欢度建国9周年的国庆节）。

在甘肃省兰州郊区，他看到已经成熟的庄稼没有收割，停车到村子里问，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老头，他告诉彭德怀，青壮男子炼铁去了，大家都吃食堂，锅砸了炼铁，鸡、牛、猪等归集体，树也砍得差不多了……彭德怀发现不对劲，他问老头庄稼收不回去明年吃什么？总不能吃钢铁嘛！老人点点头同意，叹口气说：谁不这样说这样想？可谁能顶住这个风，除非中央来个大头头，有权提意见。

彭德怀接着视察一所步兵学校，教员们正在土高炉前卖力地干活，学校的军事课程和训练因此中断，作为国防部长的他震惊了：我为你们的热情所感动，但对你们的领导这样不珍惜你们的热情和干劲，我要打他们的屁股……假若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军校，都来搞这个，敌人就会高兴得跳！因为我们不等他们来打自己就垮了！

在招待所里，两位女服务员反映了同样的情况，说她们家房子拆了、锅砸了……

离开甘肃进入河南，他又看到火焰处处的高炉群，他问警卫员：你说这

个办法能叫我们国家从此不受穷？警卫员没回答。他自言自语：不行，这一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完全不是我们脑子想的那个东西！他开始怀疑了，不情愿地问自己：难道是主席的做法不对头吗？

“共产主义不是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喝西北风的天堂！这样搞叫共产主义，那我就不叫彭德怀。”

彭德怀对“大跃进”中存在问题的认识变化开始于1958年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经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问题，并着手纠正这些错误。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开会（第一次郑州会议），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批评了某些领导人急于想使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错误的，点名批驳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彭德怀因为收到通知较晚，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由毛泽东作总结发言，批评“共产风”，彭德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没有提出其他看法。

彭德怀在八届六中全会上首先对当年的粮食产量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在西北地区的小组会上，当讨论到公布1958年全国粮食棉花产量公布数字的时候，许多人赞成公布10000亿斤或12000亿斤，至少9000亿斤粮食，棉花有6000多万担，有的人甚至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彭德怀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粮食没有那么多。当即就受到谭震林等人客气的批评：“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彭德怀解释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

通过讨论，会议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公布当年粮食产量为7500亿斤。

彭德怀同意公布这个数字，但心里对这个数是有怀疑的。

武昌会后，彭德怀实然改变回北京的打算，决定回湖南老家看看，决心把有些情况弄个水落石出，看看到底情况如何。彭德怀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踏上故土，他穿一身多年不变的青呢子便服，青呢帽，青呢布鞋，如普通人一般。在路上，他很少和周小舟谈话，两眼凝视着后退的原野，贪婪地吮吸故乡的气息，毕竟32年了……

小轿车在凸凹不平的沙石路上颤颤着。

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老王，今年亩产多少？”

他一到平江县委，就单刀直入地问书记王效良。

“少数高产田亩产才八百来斤。”

“最高的才只有八百？”

“只有八百。”

“很好，说了老实话，别的地方一报就是八千、上万、几万斤哟！我就不相信，亩产几万斤，稻谷堆在地里一尺厚，长得出来吗？上面层层加码，是逼人说假话！共产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

他确实发现了问题，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里，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产量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较低的1958年的产量公布成1957年的产量。

彭德怀的家乡，湘潭县乌石公社也放了卫星，干部们说，粮食亩产达到三千斤，青壮年上阵正在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大办猪场、大搞军事化、大

搞集体化……可群众不这么说，他们告诉彭德怀：“我们心里早就有数，这是吹牛皮的卫星，牛皮吹了，来年免不了饿肚子，田里谷了还没搬回来就喊这个卫星，那个大办，不搞还挨打挨骂，硬要我们打破小灶吃大食堂，敞开肚皮吃，只怕明年又要闹春荒，这未必就是共产主义，干部们说假说，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们老百姓，你给毛主席捎个话，让他老人家拿出个章法来！”当天晚上，彭德怀就和干部们步行数里到吴公塘生产队的田边，打着手电筒检查稻田能长多少株稻秆，每个穗上大约多少粒稻谷，借此计算水稻产量。彭德怀告诉干部们说：最近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我们当干部的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

彭德怀在不停地看着。

大田里的稻子已收割了，但相当粗糙，谷撒满地，好多已发了芽，红薯也没挖出来，叶子枯烂在地面，大队炼铁厂，锅炉是用土砖砌成的，黑烟阵阵，原始的木制风箱粗粗地喘气，融化着从各家强征来的炉锅、瓮坛，为了搞木炭弄燃料，树林也砍得差不多了，但结果炼出一堆堆没有用的锈铁疙瘩，在院子里晒太阳。

一连串让人心烦的现实。

1961年，彭德怀再次来此调查时，曾写过一个报告，描绘了他的家乡在大跃进中的情况：1958年以来，五风严重。曾先后拆毁房屋400多间，约占当时房屋总数的30%，由于炼铁和供应食堂烧柴，山林几乎被砍尽。1958年秋后，干部就开始打人。有一个时期，打人成风，弄得干群关系相当紧张。由于好刮共产风，农民群众生产情绪低落，造成农业减产。一部分妇女，由于大跃进中劳动过度，发生子宫下垂、闭经等妇女病。他还说，公共食堂成立的初期，即1958年10—11月，一般吃得稍微好一点，12月后逐渐下降，到1959年2、3月底时，一般没有油吃，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口粮也不够吃，更谈不上什么肉蛋，副食品被农民多吃了一些，由于农民的生产热情下降，家禽家畜开始大量减产。

他的心情一天比一天重：砍森林、拆房子、挖祖坟、砸锅炼铁，真称得上天下奇迹。这样做法是得不偿失，共产党人靠实事求是吃饭，大跃进要搞，可不能搞假跃进，强迫命令，群众会造反的。大搞军事化、集体化、水利化、电气化、到底怎么个‘化’法？未满七岁的丫头送幼儿园集体生活，满了七岁的丫头，在学校过军事化生活，都瘦成那个样子，还搞什么军事化，在学校总不比在家父母照料得好吧！他忧虑地问周小舟：“北戴河会议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得到的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和叹息声。彭德怀继续说：“浮夸风遍地，人们头脑发热到了发狂的地步，想一步登天，不按经济法则和客观规律办事，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而且，看来现在浮夸风并没刹住，还在滋长蔓延，长此以往，如何得了！这情况要如实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省委也要采取坚决的措施。”

他似乎还不放心，又专程到了韶山，看看那里的父老乡亲，那是毛泽东的家乡。

在浮夸成风的年代，毛泽东的家乡当然是不能落后的，他们也大大地夸大了粮食增产数，彭德怀不相信，他要实地验证一下。

结果如同预料，他们的粮食增产了16%，可虚报得厉害，周小舟告诉他实际增产数恐怕16%都不到，只有14%，而且还是国家给了许多帮助和贷款

后才勉强达到的。

彭德怀明白了一切，他发怒了，这算什么事，“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这不是朝主席脸上贴金，而是抹黑，要是主席晓得这里面掺假，他是笑呢，还是哭呢？我看他是哭笑不得！”

在这次调查中，彭德怀接到过一位土地革命战争时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递给他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后来广泛流传的民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彭德怀把字条夹在笔记本里，并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月底，彭德怀在株州碰到薄一波，对他说今年的粮食实产数没有估计的那样多。在薄一波的建议下彭德怀在株州以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再次说明粮食没有估计的那样多，征购粮食不能达到 1200 亿，估计 900 亿斤为宜，否则，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最后的话是“这个电报妥当与否，应当由我个人负责。”

1959 年 3 月 25 日—4 月 5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先后在上海举行，议题是检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通过 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彭德怀是带着平定西藏叛乱的敌情通报、作战方案和许多电报参加会议的。他白天开会，晚上处理平叛事务，一身二任，过得相当紧张。

但是，使彭德怀没有料到的是，毛泽东在会上重提历史旧事，说哪些人曾反对过他，其中说到同彭德怀的关系时，说，“彭德怀恨死了我的。”这是一句很重的话。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对不讲真话的作风提出了批评，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魏征和海瑞精神，说海瑞虽然对皇帝骂得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4 月 29 日，毛泽东向全国各级干部发出《党内通信》，再一次谈到讲真话的问题，说：“包产能包多少，就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总之，彭德怀的言行给毛泽东一个感觉，他认为彭德怀最消极，“尽批消极的材料给我看”。而他所以这样认为，因为在彭德怀走南串北的同时，他也在中国广阔的疆土上巡视，并得出了与彭德怀完全不同的结论。

毛泽东先后去了东北、四川、湖北、广东等省，视察了农村、煤矿、汽车厂、电影厂、医院等多种单位。均感形势大好，令人振奋。1958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在河北徐水笑咪咪地问前来报喜的人们：你们全县才 31 万人口，怎么吃得完 11 亿斤粮食呢？粮食多了怎么办啊？社员们嘿嘿发笑，无言以对。毛泽东就自己接着说：粮食多了可以换机器，造酒精，用不了那么多，自己可以多吃嘛，一天吃它五顿也行嘛！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点，一天做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

两天后，河南七里营的棉田里又出现了毛泽东魁梧的身影，他告诉向他汇报工作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办人民公社好！”

从河南到山东，毛泽东又在山东省委书记张平化的陪同下专程参观了人

民公社，此后，《人民日报》记者捅出了要大办人民公社的消息。对此，毛泽东默首同意，实际上他一直在寻找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和桥梁，并且越来越怀念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在 1958 年，毛泽东曾多次指出这种想法：我们有 22 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搞供给制，结果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进城以后，熬了几年，搞了薪金制、军衔制，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法权制，发展了资本主义思想。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化”，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化”，现在有“化”，发薪水都要等级，分将、校、尉，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九等，办公桌椅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

“还是人民公社好！”它把工农兵学商全包括在一起，过军事式的集体生活，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它给毛泽东提供了反映自己思想的模式。

这样，就似乎能放心放手地搞工业了。农业能创造奇迹，工业为什么不能？

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钢铁大跃进的任务作为全党的第一位大事提出来：“钢达到 1070 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

霎那间，钢铁变成元帅，正式升帐。

为了放心，毛泽东还要四处看看，这次，他路经武汉、安徽、上海、浙江等地，到处高炉熊熊，一片热火朝天，而他的出现，也使当地民众万分激动。在合肥，毛泽东第一次破例接受了 30 万人的夹道欢呼，“他在哪里，哪里就轰动，就沸腾，就狂欢”，全程陪同毛泽东的皖籍名人张治中后来回忆时这样说。

毛泽东和彭德怀几乎同时进行的实际考察，却有完全相迥的感觉，完全相迥的结论。毛泽东更加坚定信心，要求 1070 万吨钢的任务。“必须完成，不能打折扣，一吨也不能少。”彭德怀却认为是该刹车的时候了。

其实，早在 大跃进之前，拒绝毛泽东的权威已经被看成是反对毛主席了。

可彭德怀偏偏不识相，偏偏要说出他想说的话。称他为彭大炮一点也不过分。他不反毛泽东，从来不反。只是他太梗直、太认真、太负责任，他自己从来不对别人设防，也不晓得别人会对自己设防。

彭德怀决心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原原本本地告诉毛泽东：您三个月前不还在上海会议上号召学海瑞讲真话吗？你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众打死，还有臣下敢言。现在不敢说话无非是几怕：怕扣机会主义帽子、怕撤职、怕开除党籍、怕坐牢、怕杀头、怕老婆离婚。

对这些，我从来没怕过。

实际上，全国城乡紧张的经济情况此时已经有所缓和，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自 1958 年冬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到 1959 年 7 月间召开了多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一些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压缩空气”，降低指标，取得了一定成效，对此，毛泽东是满意的。但是，由于这些纠正错误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提出和实行的，因而纠错纠偏是很不彻底的，表现为被压低的指标仍然偏高；公社中仍存在供给制、公共食堂等超越现实的



“左”的做法，危害人民的正常生活，对此，仍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迅速采取措施。

很显然，对存在的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运动取得了伟大成就，对此要充分肯定，虽然有缺点和不足，但与成就相比，只不过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而且已经通过一系列会议采取了纠正措施，问题已基本解决。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比较积极的领导人，他们不喜欢别人讲“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认为那样会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是“给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泼冷水”。

另一种意见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而且有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中央召开会议采取纠偏措施，但效果不是特别大，有的地方问题还在发展。希望中央领导人能重视这些问题，好好地分析经验教训，既把成绩充分肯定，也要把缺点问题说透，这样不仅不会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而且会更有利于运动的发展，做好今后的工作。

毛泽东支持第一种意见。

彭德怀则是持后一种意见的人。

本来，彭德怀在接到会议通知后不准备参加，而是让总参谋长黄克诚来开会，因为他刚从国外访问回来，比较疲劳，想休息一下，而黄克诚是书记处书记，对地方和军队情况都比较熟悉。但黄克诚怕彭德怀不参加会引起毛泽东的误解，便劝说彭德怀到庐山开会，夏天去庐山也是一种休息。

彭德怀与会后，受毛泽东号召大家讲真话、学海瑞号召的鼓励，加上他自己一贯开门见山、不拐弯抹角的作风特点，进行了多次措辞激烈的发言。

关于彭德怀的性格，有多种多样的描述，但共同的地方很多，都说他自然、直率、坦诚、有时很呛人、不留情面……1982年，为庆祝中共十二大召开进京演出的七场话剧《彭大将军》的编者把彭德怀的形象塑造成刚直不阿、威严可亲、敢讲真话、勇挑重担、关心战士、赏罚分明、严于律己、知己知彼又善于捕捉战机的卓越军事指挥家。而爱国将军续范亭则诗赋彭总，更突出了他的平凡与普通：

爽直将军贵姓彭，  
心如铁石气如鲸，  
三军一致称模范，  
粗布征衣半老兵。

第一个去红军苏区采访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专门谈到了彭德怀：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彭德怀当然也知道自己的这种特点，他说过：我是张飞，有其粗没有其细，脾气凶，是高山倒马桶，臭气远扬。他爱骂娘，能把人骂得抬不起头来，连老战友、老助手黄克诚也常受他骂，甚至被撤职。彭德怀有一个警卫员叫刘继忠，山东黄县人，他在自己牺牲时尚未完成的一封给彭德怀的信中，警告彭德怀说：“批评同志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一说话就瞪眼，让人家怕你，难以接受……”

确实，彭德怀很粗鲁。他是个农民，确切地说，他是个穿着元帅服的农

民，所谓“山野之人”。从彭德怀身上，我们能看到许多农民的特点：朴素、坚毅、温厚、忠诚、执着、吃苦耐劳。建国后，他身居高位，仍习惯于用抵多少斤小米作为收支的计算单位——他住在中南海的几间房子要维修扩建，当他得知所需费用相当于几个农民一年的收入时，便断然拒绝。彭德怀生活俭朴，两袖清风，即使在中南海时也不单独起伙，朱德说过：提艰苦朴素，没有一个敢比彭德怀的。

尽管如此，人们印象中最深的还是彭德怀的倔强和认真，换句话说，是彭德怀的诚实和实事求是：“我们共产党人最讲实事求是，最提倡敢讲真话，这一点是我们的长处。假如让我去讲假话。昧着良心，不顾事实地瞎说一气，我不干，就是杀了老子的头我也不干，我没长那样的骨头。”这既是他的性格，也是他对共产党信仰的表现。毛泽东曾多次容忍过谅解过彭德怀的直率，但在庐山他却无法忍受彭德怀的不留情面。

其实，大凡将军们，都有一种粗暴的特点。美国的巴顿将军、苏联的朱可夫元帅、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他更以冷酷无情著称）都是如此。实际证明这样可以更有效地训练和指挥自己的队伍战胜敌手。

当然，粗暴直率不等于无情，在彭德怀严肃的外表下是热诚的内心。1929年1月，彭德怀率部从井冈山根据地突围时丢了干粮袋，他不言语，结果三天三夜没得饭吃；长征中，红军极度缺粮，解饥之物便是救命之物，时任红三军团司令的彭德怀命令含泪的警卫员枪杀自己喜爱的黑马坐骑，不知救活了多少战士；在转战陕北时，彭德怀和战士一同在沙漠里行军，干渴得嘴唇肿裂出血，异常消瘦，却拒绝多喝一口水，管理员买来三根黄瓜，被他骂了一顿，黄瓜也送给了重病号；他决不搞一点特殊，而是和大家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大跃进时，彭德怀看到了谷撒地、薯叶枯的景象和父老乡亲因饥饿而蜡黄浮肿的脸，他痛心、震惊、热泪直流，“如果不是中国的农民太好，早就造反了！……”

结论是明显的，“彭德怀不善交际，不善空谈，懒于应酬，恶于献媚，胸中装满对民族对国家同志的深厚友谊，他不愿将自己的忧愁、悲伤，愤懑轻易地告诉别人，他从不为自己的荣誉、地位去分神，但为了群众的利益，他天王老子都敢撞，他是一个摆脱了个人主义的光明磊落的共产主义战士。”

彭德怀说话了，在庐山吼虎岭北面的西式平房里，他面对着一堵高墙却毫不掩饰，除了毛泽东之外，彭德怀在会议中的话最多，也最不客气：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见反面的东西。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再搞，就好了。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月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不只三个月。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认识）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

彭德怀的话说得令人佩服，也令人担心。也有的人冷眼旁观。但他还是每次在小组会上发言：

“毛泽东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百分之十三。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什么‘算帐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彭德怀的这些话，确实很尖锐，而且直接涉及到毛泽东。加上他在发言中还时有夹杂粗俗的语言，引起一些人的极大不快，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彭德怀即使当着毛泽东的面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常委会上，当有人说到1958年全国土法炼铁，地方已补贴20亿元，国家还要补贴20亿元时，彭德怀插话说：这个数字好大！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买消费物资，把它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

毛泽东说：呃，不会有这样高！彭德怀接下去：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

实际上彭德怀这时心情是很愉快的，他除了参加所有的会议外，还到庐山镇转悠，到仙人洞游玩，到山顶看日出。晚上别人去跳舞，他则在住处看中央部门有关财经的文件、群众来信、会议简报或和工作人员下棋。整个与会人员都较放松，被称为是“神仙会”。

但是，他厌恶虚假，容不得虚假，说话的措词也严厉：“江西现在还讲去年增产百分之六十七多，这是脱了外裤，留了衬裤。要一次脱光，省得被动。”

这话是彭德怀讽刺一些要员们借埋怨报纸宣传乱放卫星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为自己辩护时所说的，虽不文雅却很生动。

“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企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每个协作区、省要搞工业系统，这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能办到的事情。”

从7月3日至10日的8天中，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上共有7次发言或者插话，这些发言经过会议秘书们的整理，陆续在中央办公厅的简报上印发给到会同志。

在这期间，彭德怀和张闻天（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当时他的住处和彭德怀仅隔一条甬道）、周小舟（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惠（湖南省委副书记）、李锐（水电部副部长）等人常见面，并有过交谈，他们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和彭德怀相近，特别是周小舟，他曾陪同彭德怀在湖南调查，有些话谈得深一些。在庐山开会时，他又找彭德怀进行过两次长谈。

一次是7月5日上午，周小舟到彭德怀住处，谈了关于湖南方面情况的十个方面的问题，诸如湖南的重工业，轻工业有了发展，水利建设成绩也很大，农业虽有点灾但也能保收等。彭德怀除说了他在小组会上发言的一些内容，还诚恳地说了他的担心。他说：中央常委之间有些问题也不能很好地开

展讨论，有的不便说话，有的是不能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我倒是敢于说话的，还常给毛主席送上些反面材料。毛主席喜欢追根问底，所以我有些意见想找他谈，但又怕讲错，引起对我的不满。我因自己的性格，言语生硬，容易顶撞，戳他一下，弄不好引起误会。不过，戳了他，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以当国防部长。谈完后，他们一起去吃午饭。

第二次，是7月12日上午，周小舟又到了彭德怀住处。谈到粮食问题时，周小舟说：“去年粮食产量造了假，是压出来的。第一次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又说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彭德怀很生气：“乱来！只能是有多报多少，决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怎么会这样？”

周小舟说：“上面压力太大。现在农民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火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里用点热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

彭德怀听后沉默了一会，对周小舟说：“这些问题，你应该如实地向主席反映。”

“我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李锐、周惠等人谈话），彭总，主席对我们的意见是能听得进去的，你也找机会同主席当面谈谈吧。”

彭德怀犹豫了一下，说：“我想给主席谈，但怕谈不拢，我的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没有谈，有些意见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我想写一封信给主席，你看怎样？”

周小舟对写信很赞成，但还是建议彭德怀先找主席谈谈。

确实，彭德怀在西北小组的发言，没有如实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会议印发的“简报”中把彭德怀发言中言词尖锐的部分，特别是直接涉及毛泽东的一些话都删去了。对此，彭德怀挺不满，但负责整理“简报”的工作人员也是为彭德怀好。

7月10日，毛泽东在各组组长参加的联席会议的小范围内讲话，他神情乐观，态度轻松：

总的形势来看，成绩与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有所得，有所失。不能说得不偿失嘛。有些事可能是主观主义的，但我们取得了那么多经验，会议小组可起草《会议纪要》了，下发到各小组讨论修改，然后定稿下发。再开它几天，到十五、六日，就可以结束了。

据此，会务工作人员开始统计与会者返回的人数及乘坐的交通工具。

彭德怀接到会议将要结束的通知后，感到很突然。他认为会议还没有好好总结经验教训，还没能较好地解决问题，应该再延长几天，把话说明说透。他决定找毛泽东谈谈自己的想法。本来上午他同周小舟说要写信给毛主席，但写信不容易，还是当面谈谈算了。

7月12日中午，彭德怀走向毛泽东的住处，遗憾的是他没能见到毛泽东，正在门外值勤的警卫人员告诉他现在正是午休时间，此时进去会打扰毛主席。彭德怀本想像以前一样，不加顾忌地闯进去。但还是忍住了。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其实，彭德怀与毛泽东相处是相当随便自然的。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

桥回忆：

“彭德怀与毛泽东相交，带有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习惯了叫‘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彭德怀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宇，像机关枪一样。于是毛泽东也谈兴勃发，眉飞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的气氛，这种情况持续到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再见到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显得拘谨了。”

当天下午，彭德怀希望能在开会时碰上毛泽东，但因毛泽东没有到会而未能如愿。晚饭后，彭德怀借散步之机再找毛泽东，但又因毛泽东另有安排被警卫人员挡驾。这天晚上，彭德怀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第二天上午，彭德怀踩着晨露再次走向毛泽东住的“美庐”，但警卫员告诉彭德怀：主席昨晚一夜没睡，刚刚躺下。彭德怀怏怏而去。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决定给毛泽东写信：

“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是处于大好形势下……但是，是不是在当时就没有什么问题呢？不是，而相对的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具体政策上是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某些地区严重地刮起了几股黑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直接影响了我党基层组织在那些地区群众中的威信，使中央领导同志在那些地区的威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强迫命令等。这些问题，在庐山会议初期，到会同志并没有倾心置腹地谈出来。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就促使了我给主席写信的念头。”

“本决定13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13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7月12日晚腹稿已成），7月14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毛主席亲收。”

正是这封信，引来轩然大波，庐山风云激荡，令所有的高级领导凝神注目。下面是信的内容，我们引来细读：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了66.1%，农副业增长了25%（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经济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些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点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

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以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上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点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象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有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

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实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1月省市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地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5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

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信是递上去了，但彭德怀决没想到惹恼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虽然首先肯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但实际上是与他提出的“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相对抗，是向他下战书。

“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7月16日，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召到自己住所，神情轻松地给他们谈话：“让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同志也上山来，参加会议，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同时决定会议讨论时间延长一周。

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将彭德怀的信迅速赶印出来，毛泽东在信的首页上加一行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与会者人手一份并被告知从即日起，在继续讨论《会议纪要》的同时讨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对此安排，彭德怀感到十分突然，他后来曾在一本笔记中写道：我是给主席个人写的信，是供他参考的，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意见书》，事先也不跟我招呼一声，就印发给大家呢？

7月17日上午，《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印发到与会人员。它如一块巨石投入已有波澜的湖水，可称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即将沉寂下去的“神仙会”骤然活跃起来。

18日上午，彭德怀在小组会上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没有能完全写明意思。但他的要求未被接受。

经过6天的讨论，完全赞同或明确反对这封信（意见书）的，就只有几个人，大多数人是基本赞同《意见书》的看法，而对其中问题的提法，分寸把握和文字表述上有不同意见。

在为数较多的基本赞同的发言中，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的发言可以说最为明确、系统。特别是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小组会上分13个问题讲了近3个小时，以鲜明的态度、确凿的事实、科学的语言直言极谏，实际上是对“大跃进”运动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对暴露出来的严重缺点及其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作了系统的论述；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三种所有制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根本问题作了理论的探讨，最后归结到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有些话，涉及到毛泽东。

在分组讨论彭德怀意见书的几天里，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却很关心各组的讨论情况。他仔细阅读会议简报，并接连分头召见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和各组组长谈话。

经过九个日日夜夜反复思考的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对彭德怀上书言事



的性质作了最终判断。7月23日，他突然决定召开全体会议，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其严厉之程度很少见过，令所有在坐的人震惊。下面是参加会议的李锐所作记录的一部分：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讲点这样的意见。我看了同志们的记录、发言、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说好话，不愿听坏话。两种话都要听。我劝这些同志要听下去坏话。”

毛泽东的话开始正色起来：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万里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反右时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听它一两个星期。”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市场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三、二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嵯佷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有3000人到那里参观，10天3万人，3个月30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怎么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有6级会议，影响5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就没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么！要人家讲么，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年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个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如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面放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国

民党说我们是做秧歌王朝)。”

言词用意太明显了：你彭德怀在几次路线中表现如何？

“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表大会讲过。1956、1957年的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与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一次批恩来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面是经过仔细斟酌了的。如果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

很显然，毛泽东给彭德怀定下了性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对他提出的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失误，毛泽东也针对性地谈到了：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70 几万个生产队 70 几万条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是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必垮台，那时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的。登 70 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和国家了，资产阶级的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若不正确的部分不要）。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被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只差 30 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现在这种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呢？顶了 20 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如果在全国保持 1/3，我就满意了。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不要怕。河南等省有 50% 的食堂还在，那也可以试试看，不要搞掉。我是就全国来讲的，不是跳舞有 4 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粗人，很不文明。1/3 农民，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取得经验。有些散了的，还得恢复。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 1956 年公社化以前就有办过的，1958

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有一条，节省物资。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太准了，后来食堂所以垮台，就是吃光了粮食用完了物资，无法持久）。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比如自来水，吃水不用挑，这样一来，可以节省劳动力，还可节省物资。这样看现在的公社散掉一半有好处。”

说到这里，毛泽东把脸转向朱德：“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要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毛泽东语气尚平和，实际上还是流露不满，因为朱德在小组发言时说过“食堂全垮了也没关系”的话。

“对食堂，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登徒子攻击宋玉三条，漂亮、好色、会说话，不能到后宫，很危险。宋玉反驳说：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话是先生所教，好色无此事，天下佳人莫如楚国，楚国佳人者莫如臣里，臣里之美者莫如臣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

很显然，毛泽东在批评彭德怀等人的发言是不及其余，只攻一点，因为“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办一些，再试试看。”

“许多事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时曾经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哪来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说周、陈）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说600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也觉得可行。我六日讲1070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搞到公报上，从此闯下大祸，几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就该绝子灭孙……。”

毛泽东说这段话时感情变得激动起来，眼睛湿润，声音哽咽，夹着烟卷的手也不自抑地簌簌抖动。

毛泽东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但他很少动感情，艰苦复杂的革命历程更需要他的镇静、理智和自我牺牲。

1919年10月，毛泽东的母亲不幸病逝，他非常悲痛，写了一篇哀恻动人的《祭母文》，并从长沙回家守葬。文中写道：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头脑精密，擘理分清；事无遗算，物天遁形。病时挽手，酸心结肠；但呼汝辈，各劳为良。”

1930年11月，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军阀何键枪杀于长沙，他在中央苏区接到消息，当即手书“开慧之死，百身莫赎……。”1957年，他再次忆起杨开慧，写诗《蝶恋花·答李淑一》，首句便是“我失骄杨君失柳”，足见其感情之浓。据说此诗惹得江青很不高兴。

后来，毛泽东和贺子珍发生纠纷，他后悔自己言行的粗断，曾劝阻、挽留过贺子珍，最终还是尊重她的意见，让她去了莫斯科，一别23年，贺子珍只能住在沈阳、上海……

1950年11月25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抗美牺牲，这是一个令

毛泽东十分震惊的消息，但面对无法更改的事实，面对自己的老部下彭德怀的巨大内疚，毛泽东控制住了自己，表现得非常镇静。

但人们不该由此忘记：毛泽东也是有感情的人，所以他谈及“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时声音变调，双眼流泪。

接着，毛泽东批评有人对搞建设“根本不着急，人不着急，没有一眼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但也不要像李逵，太急了，也不行。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口将言而囁嚅无非有好些顾虑，上半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记录为证，口说为凭，以此为证，你们有话请讲出来，你们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坐班房，甚至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对受整，这叫明哲保身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

“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1070万吨钢，这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结果是几千万人上阵，‘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发现嵯峨山这个典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

“大炼钢铁，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别人也要分担一点。谭老板，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得快。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我也放了三炮，公社、钢铁、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了集体所有制，我说了从集体所有制到共产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点，也许要20个五年计划。

“如讲责任，富春、鹤寿有点责任，谭老板有点责任，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主要的责任在我身上。柯老，你有没有责任？（柯老：有）是否比我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你要搞600万吨，我要搞1070万吨钢，几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第一责任是我。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毛泽东讲了大约两个小时，讲完就宣布散会，还没有从巨声震荡中清醒的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向自己的住所，不过他们心中却都清晰，毛泽东的这番讲话是冲着彭德怀和与彭德怀有共同看法的人来的，很多人心里因此感到很沉重。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没坐在第一排的政治局常委委员席上，而是坐在后排。显然他在闹情绪，因为按规定常委们该坐在台上，政治局委员坐台下前排，中央委员和各省负责同志坐在政治局委员的后面。毛泽东不高兴，但没说什么。散会后，在震惊之下几乎失去自制的彭德怀急急地第一个离开，毛泽东走到门口时，彭德怀已经走很远了。但过了一会，当毛泽东和几位中央首长朝山下走时，彭德怀又返了回来，周恩来派人告诉他开会，与毛泽东走了个正面。毛泽东停住脚，很和气地打招呼说：“彭总，我们谈谈吧？”彭德怀本来就心含怨气，脸一下涨得通红，一边走一边甩手，态度很凶，声

音很大：“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你不是谈过了吗？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看着彭德怀，略有迟疑，但态度依然很客气：“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嘛……”

“没什么好谈的！”彭德怀倔强地拒绝了，在场的人们都看到这个场面，确实是不欢而散。这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但却成了必然结果的原因之一。

确实，比任何人都难受的是彭德怀，他午饭、晚饭都没吃。晚上他躺在自己的住所里，彻夜难眠，躺下，辗转，只好再起来，把灯打开，把门打开，眼睛空空地睁着，拚命地抽烟。

《彭德怀自述》中记录了这种心态：

7月23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当晚，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天亮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呢？

你想不通也好，你扭曲自己，采取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作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也好，获得谅解已不太可能。批判还要升温，还要挖及你的历史问题。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彭德怀本来坚持保留自己的看法，但后来改变了，因为他考虑到党中央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援国际上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

又是一个紧急决定。毛泽东宣布八月二日在庐山举行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全党讨论彭德怀问题。

据毛泽东秘书李银桥回忆，在彭德怀赌气拒绝和毛泽东谈话后，“毛泽东回到住所，脸色不大好。本来是让我们准备下山了，一些首长反映意见，据说是提议召开中央全会解决问题，结果不下山了，当天晚上就听说要召开中央全会。要讨论解决路线问题。”

彭德怀的秘书被紧急召到庐山，任务是帮助彭德怀写检查。彭德怀自己也请了两天假，没有参加小组讨论。他甚至不再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饭，静心思考自己的行为如何才能对党有利。

7月26日，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会议继续延长的当天，彭德怀就在小组会上作检讨，接着又被各组轮流叫去，接受提问和批判。因与彭德怀“划不清界限”的一部分人如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相继做了检讨，周惠、李锐、胡乔木、田家英等也倍受压力。

7月31日一早，毛泽东秘书打电话给彭德怀让他到毛泽东住处开会，彭德怀到会时，已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人在座，还有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这是中央常委会，黄克诚他们是列席旁听的。

会议上午10点50分开始，到下午5点结束。会议气氛一开始还是很平

和的，毛泽东还问彭德怀抽不抽他茶几上的熊猫牌香烟。他的讲话也是漫谈式的，从立三路线讲到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慢慢地，毛泽东的话严厉起来，批评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

彭德怀插话说：我到 1934 年 1、2 月间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这话我向黄克诚说过。

毛泽东接着说：你在几次路线斗争中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没有正面和毛泽东辩解，而是讲了一些往事，说明他很早时候就很尊敬毛泽东，不同意毛泽东把他们之间的关系说成“三七开”，认为应该是对半开。

毛泽东依然说：“还是三七开。”

在二人关系是对半开还是三七开上，二人一来一往，最后以彭德怀的沉默结束。

彭德怀的检查是做定了，他的办公室秘书替他起草检讨稿，彭德怀告诉他们要痛痛快快地写，写得越深刻越彻底越好！稿子出来了，其中不乏违心语言：

“我在庐山会议的西北小组会上，特别在 7 月 14 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上，发表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向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行了攻击。同时打击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损害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现在我了解这是一种罪恶。7 月 14 日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同志们已经对这封信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我认为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因为这些右倾观点不仅我个人有，在党内还有一部分人也有。另外有一些人，则表现认识模糊，经过这场严肃的思想斗争，将会使这些人头脑清醒过来，右倾情绪和右倾错误将会得到更快纠正，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是有利的。

“我的右倾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轰轰烈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横加指责，伤害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和建设热情。把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的缺点片面扩大，说成是‘左’的倾向、政治性的错误，把个别的、局部的缺点，夸大为一般的、普遍的缺点。把 9000 万人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来是适应我国工农业大跃进而出现的，是人民群众自发性的运动，北戴河会议经毛泽东同志提出，作出决定加以推广，为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接受和拥护。我却抱着消极的看法，认为搞早了一些。把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局部的暂时紧张，并且这种紧张已在逐渐缓和，说成是引起了阶级关系的紧张，等等。更错误的是采取了含沙射影的手法，攻击毛泽东同志，损害毛泽东思想的崇高威望，引起党内的思想混乱，破坏了党的团结。

“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

公平地说，彭德怀的检查中对自我挖掘得太深了，深得超出了实事求是的程度，因为人们都清楚，彭德怀并没有发表右倾机会主义谬论，没有反对

党中央和攻击反对毛主席，没有组织“军事俱乐部”。

8月1日上午，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除政治局常委外，还有政治局委员贺龙、彭真等人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革命几十年的历史，提到他和彭德怀长期相处的关系，再次认为是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甚至说出彭德怀“有野心，只是机会未到”、“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等令人惊讶的话。彭德怀终于明白毛泽东要进行的斗争远远超过了那封信的范围。最后他表示，不论最后会议作出什么结论，他都保证做到三条：第一，不会自杀；第二，不会当反革命；第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地，自食其力。这次会开了一天。

1959年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幕，至16日，全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也举手赞成。周小舟因是中央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决议中的语言是非常严厉的。

“（一）在1959年7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

（二）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了分裂党的活动，由来已久。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期，即1959年7月14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书，和他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发言和谈话，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很明显，他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三）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由于彭德怀过去曾做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由于他在党中央和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直爽、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正因为这样，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制止他的反党的分裂活动，就不能不成为党和所有忠于党、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重要任务。”

刚烈的彭德怀竟然能够忍受，为了顾全大局，他接受他难以接受的“罪名”。自此，一条惊涛骇浪中负重的小船，划向沉没前最后的生命里程。

毛泽东胜利了。不过他确实没有料到他在庐山的辉煌成就将要受到历史的无情更改。

## 第八章

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彭德怀反映的许多问题是符合实际的。但毛泽东决定不给彭德怀平反。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接见在挂甲屯闲居六年的彭德怀，告诉他说：你去三线吧，准备将来带兵打仗。

红卫兵组织两支“专揪彭德怀战斗团”，争先恐后地奔向四川成都，彭德怀再遭劫难。

在被报纸糊住窗户的黑屋里，彭德怀扯着被单大叫：我要见毛主席，我是被特务害死的！

八届八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同江青继续留在庐山。紧张了那么多天，确实该放松一下了，作为名胜风景区，庐山无疑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理想地点。

8月19日彭德怀飞往北京，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继续接受批判。这次会议从8月18日开始，到9月12日结束。参加人数原定140人，后来增加到1070人，大军区领导除留1名值班外，全部参加；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野战军军长、政委全部参加。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还有508名有关人员列席。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人都做了表态性发言。会议和在庐山上一样，万炮齐轰彭德怀。

他被指控犯这么大的错误，便不能不想到日后的工作和出路，果真是无官一身轻吗？在军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时，他再次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表明自己的想法：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已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恳切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因此，在每次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三十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育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毛泽东接到信后，立即与彭德怀通了电话，说要把他的信转发全党，并在当天就作了指示，也算是答复：

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对待他们。必须相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认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9月17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任命国务院副总理林彪兼国防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部长职务。

最后，彭德怀被允许到北京西郊居住。

在9月9日写信之前，彭德怀已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谈了话，他说：我写了一封信，主席指示，变成了什么意见书，受到了严厉批评，国防部长不会叫我当了，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我也不想当了，我要回家种地去了！自食其力，你们放心好了！我这里不需要你们了，谢谢大家这几年的照顾。我会尽力帮你们安排自己愿意做的工作。

不久，彭德怀让妻子浦安修去找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提出搬出中南海的要求。他对浦安修说：我没有工作了，中南海也没有活动的地方，再住会玷污党中央的声誉。你说我请求找一个能劳动的地方住，实现我对毛主席的保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之后，他就交出元帅服和勋章——他有漂亮的元帅服和一大堆勋章，但他很少穿戴，他不愿意自己突出，所以这些东西都显得很新。他喜欢过平常人的生活。“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我都不要”，他的声音依旧掷地有声，彭德怀不顾警卫人员的劝说，把自己的元帅礼服、常服、狐皮大衣、地毯、名人字画、猎枪和好一点的衣服都上交了党中央，留下的几乎全都是书，还有一些必要的换洗衣服和日常用品；还有几件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东西，即一支左轮手枪、一枚红星勋章、八块从红军时代保存下来的分伙食尾子所得的银元和一包历史资料。他还拒绝给他安排护士和公务员：我没病，要什么护士，现在是个闲人了，还要人家来打扫卫生，料理生活，真是岂有此理！免了吧，我坐的“吉斯”也要坚决换掉，现在没有必要坐那么高级的车！上大街坐公共汽车不也很好吗？本来，中央办公厅按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彭德怀的政治待遇不变，仍然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办公室撤销，但保留秘书1人，组织关系安排在中央党校，生活待遇不变，仍然配备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员、司机、医生、护士、公务员、管理员等9人。对此，彭德怀表示非常感谢组织。但他仍多次申明希望中央接受他的请求。中央办公厅决定答应他的要求：人员从简，将斯大林

送给他的灰色“吉姆车”重新配给他。9月30日，彭德怀坐上吉姆车，举家迁出中南海永福堂。

彭德怀挂甲在西郊吴家花园，开荒、种地、养鱼、积肥、读书。据说，这是当年杨六郎出征时晾晒战甲的地方，名为挂甲屯。看来，历史的安排有时显得相当恰当。

黄克诚、张闻天分别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和外事工作会议上继续受到批判。同时，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右倾”斗争，大批党员、干部因讲真话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经济建设的发动机再次发出持续超负荷的轰鸣，但结果却和人们的愿望相悖：

中国出现连续三年的经济严重困难。

历史精灵含着严峻的目光，冷冷地注视着所有的变化。

彭德怀不相信自己搞错了。他开了一片荒地，整整一分，作试验田。他把地全部深翻了三尺多，每个土疙瘩都敲碎，又用手捏过：“人家说深翻我就深翻，说多下肥我就多下肥，说密植、说浇水，我都照着做，困在这块地里了，我看看一亩地到底产多少斤。”

他所以这样做，是因当时都说这样做能夺高产。

当年参加过劳动、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就这个问题对我们作了如下的描述：我和同学们在门头沟的花果山劳动，白天栽树，晚上帮助建丰产田，地要深翻一米，但山坡上土薄，半米就到了石头，不得不用钎凿，然后拣去碎石，再拉来土盖上，这样造成的丰产田亩产是100万斤，（这显然是假的，就是用麻袋堆一亩地也不一定能放下100万斤）。高产的原因是杀了两头老骆驼，煮烂后把肉汤洒进了地里。

彭德怀种的小麦收了，可以说是颗粒归筐——他成天的守护连麻雀也无法偷嘴。结果是九十多斤。是喜？是忧？“一亩地，八、九百斤，就算我们功夫不够，再加上一培，亩产两千斤，顶天了。亩产一、二万斤，纯属胡说。”他不明白，遍地的高产卫星是怎样放出来的。

这样的生活让彭德怀变成了勤勤恳恳的农民，以至警卫员也很顺口地称彭德怀为“彭老头”，当然，他没有仅仅种地，还是中央党校一个老老实实的学生，跟杨献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那是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以中央名义找彭德怀谈话，算是对彭德怀9月9日信的答复。中央同意彭德怀读几年书的要求，并责成彭真、杨尚昆负责安排。彭真随后找到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副校长艾思奇、范若愚，彭德怀成为中央党校的学员。虽然彭德怀注重读书，但长年的战争使他无法坐下来，所以在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中属于文化较低的行列。特别是庐山会议上，有人责斥他不懂经济偏要干涉经济，是瞎逞能，彭德怀忍气吞声，决心花费精力阅读大量经典著作，发誓说“不弄通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死不瞑目”。一开始，彭德怀曾试图按有关同志的劝告用读书来对照检查，反省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越读书，越和杨献珍等人交谈，越发现自己思想上的矛盾越大，越认为自己的正确：“杨校长，我不知怎样感激你好啊！我更感谢毛主席给我学习机会，通过学习，我越来越认识到，我在庐山没有错，错在哪里呀！真不该做那个违背良心的检讨！”

1962年1月，负责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彭德怀虽然仍是中央委员，并渴望参加会议，但因会

议报告中仍坚信庐山会议的正确性，彭德怀只好向中央请假，没有参加会议。这样，作为中央委员、副总理的彭德怀，没能参加连县委书记都能参加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比较谨慎的刘少奇提醒全党，中国到了该刹车的时候了，要不就散架了：“我们不仅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而且也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有许多是因为我们没有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有关”，“要实事求是地向群众讲清楚造成困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能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套话来概括四年工作中成绩与错误的关系。这四年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就全国总的情况看，三七开较合乎实际，成绩是七分不是九分，缺点错误是三分而不是一分。这样实事求是的估计，广大干部群众才心服。这两年大家饿肚子，心里都有数，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说法来掩盖实情，掩盖工作中的严重错误。翻箱倒柜统统倒出来，否则，人们不会服气。”

话说得相当尖锐，但他还没尽兴：

“至于有些地方，也许工作得比较好，也许做得特别差，错误犯得特别多，恐怕连三七开也打不住，甚至可能是倒三七开，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还有一个三七开，就是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略带湖南口音的话说得缓慢而清晰。

这些话说出来太让人震动，恐怕毛泽东也不舒服。实际上，刘少奇在半年前（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这样说了。

“不过，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坏事能变成好事，用不着悲观丧气，跌了跤子就爬起来，看清道路再前进。”

刘少奇采纳的措施既复杂也简单：经济上接受周恩来、李富春等提出来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并在安徽、广西等地试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政治上对在反右倾斗争中受打击的人甄别平反，恢复名誉和工作，但这些措施被毛泽东指责为刮“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地位迅速上升的林彪也在会上讲了话，他的论点很鲜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现在出了事情和困难，是因为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真是另辟蹊径，别有奇香。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但他不服气，不认输，说话依然抑扬顿挫，诙谐自如：“我就不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这是他1958年1月就说过的话。此时，他仍坚持自己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阵地，并在同年10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论断，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和其他领导人的分歧也越来越尖锐了。这种分歧，简单地说，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内究竟以什么作为工作中心？在毛泽东看来，只应该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为最高任务，第一线中央领导人所执行的调整政策是对他的主张的挑战。毛泽东不能容忍，终于导致他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冲突，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事实证明，被毛泽东当作“三风”批判的本来都是党内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看法和做法，他把其他领导人不同的认识看成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的斗争，甚至认为是党内上层出现的修正主义。向全党尖锐地提出了如何对待国内党内修正主义问题。应该说这是很片面的。

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接见外国客人时所说的他在“1962年就看出了问

题……”

当然，毛泽东的这种看法确实和当时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有关。国际上，苏联执行大国沙文主义，从各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并鼓动支持印度反华，最后导致两国在边境交战，并策划新疆叛逃事件和伊犁暴乱。中美关系也日趋紧张。国内，台湾国民党猛叫反攻大陆，国内想翻天算帐的人也蠢蠢欲动，这种情况下，强调注意阶级斗争无可非议。但称之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千万不要忘记则显得偏颇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七千人大会虽然承认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而且认为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反映情况是正常的，即使信中有些意见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最后还是认为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彭德怀长期在党内搞小集团，搞军事俱乐部，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系，里通外国，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1962年8月5日，毛泽东在对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毛泽东判断的错误又给彭德怀新的悲哀。

彭德怀等了三年，等着毛泽东转变看法，与他消除误会，没想到又给一个新打击。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他们都恢复了工作，分别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学所研究员、湖南省委副书记和陕西省副省长，唯独自己还是个反党头子。他愤怒，不是因自己是中央委员而不能参加扩大的中央会议，而是他不知“里通外国”罪名的由来。

彭德怀怒不可遏，心胆俱裂，立即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请转告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我彭德怀向党郑重声明，没有里通外国这回事。

“你给我去买纸，我要写信，把我的一生写给毛主席！我的功，我的过，我的意见，我的想法，统统写出来，一条都不隐瞒。”气得暴跳如雷的彭德怀命令他的警卫员景希珍准备笔和纸，他还对前来度产假而又劝他别再写信闯祸的侄女彭梅魁说：我想过了，只我甘愿毁灭还不行。我生不求功，死不留名，但还是留了一个不公正的风气！想打倒一个人，就给他安个莫须有的罪名，这个罪名站不住，就再安一个。这就不是毁灭我一个人的问题，是毁灭一个党。一个不公正的党是不能服人的，是会乱成一坨的。杀头都不要紧，但事情要弄清楚！我个人很渺小，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不能因为捏造我的假历史给党的光荣历史抹黑，我有权利、有义务作这个申诉！

对此该如何解释？是因为毛泽东的误解猜疑、偏听偏信？是因为怀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毛泽东对中国会过分依赖苏联的恐惧？还是因为一些恰似巧合的事件使毛泽东判断失误？恰恰是彭德怀访苏回国后，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1957年签订的中苏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现代军事技术，其中包括一枚原子弹；也正是彭德怀在庐山给毛泽东写信后，赫鲁晓夫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讲话，首次公开指责中国的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化运动是那些根本不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或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的幻想物。不久，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又公开为彭德怀辩护，说他没犯过什么过错；彭德怀元帅的撤职不说明他的耻辱，而说明他的正确等等。

所以，毛泽东说，现在是里外夹击。

毛泽东确实一直担心中国会过分依赖苏联，被苏联所控制，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警告全党：“对于外国的东西，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

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这里所说的外国无疑是指苏联。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明确抨击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因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直到1959年4月的上海中央会议，他还劝同志们不要吃别人嚼过的馍馍。

具有这种观点的毛泽东当然不会赞同彭德怀吸收、借重苏联军事经验和技术的言行。而赫鲁晓夫，说话盛气凌人，天下老子第一，唯我独尊，典型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他不断提出过分的要求，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伤害了中国的自尊和感情。斯大林也是如此，使毛泽东和中国人感到苏联对中国与以前西方的殖民者没什么两样，特别是赫鲁晓夫，抛弃了列宁主义，又否定斯大林，是搞修正主义。两党关系和两国关系变得紧张了，至彭德怀被罢官后，两党两国的关系慢慢全面破裂了。

两国如何承担责任，历史尚未作最后定论，但在当时，赫鲁晓夫却被看成彭德怀的国外盟友。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直到今天，我们中还有一些人习惯于这种思维，而忘了外国敌对势力正是利用这一点分化共和国的力量。

彭德怀再次伏案执笔，写了整整三个月，像重走了一次长征路，体重减轻了十多斤，精疲力尽，一病而倒，好多天起不来。他只好把抄写任务交给司机赵风池。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致毛泽东并党中央的一封长达82000字的信递呈到中央办公厅，彭德怀亲自去中南海，亲自把信交给杨尚昆，并请他打印数份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要借此澄清历史，辩驳不公正的指责。

这封长信共有十个部分：一、童、少年遭遇。二、走出当兵。三、平江起义。四、反“围剿”战。五、抗日战争。六、解放战争。七、抗美援朝。八、国防部长。九、庐山会议。十、人物评价。

在信中彭德怀特别强调说：我是个共产党员，是一个老兵，心里有什么，应该向党说，敢说真话，这是我们党兴旺的一种标志，也是党对党员的要求。我就是讲真话，不管怎样我也讲，我不怕杀头，年纪也大了，离见马克思的时间也不长了，我是实事求是地写的，特别是对我里通外国的说法应讲清楚，中央也可以派人调查嘛，如果我出卖祖国，到天安门前把我的头杀了，我没意见……我对私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加在我身上的这一丑恶罪名，引起我心情的极大不满。我诚恳地要求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组织专案审查，处理我这莫须有的罪名。如果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纪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有怨恨的……

彭德怀在信里还谈了他对林彪和“理论家”康生的看法，提醒毛泽东主席保持警惕。

然而毛泽东并不喜欢彭德怀的八万言书，“洋洋八万言书，我看了，已请中央办公厅打印，在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他在说这些话时带着不耐烦的口气。此时的毛泽东认为中国正在刮“翻案风”。七千人大会后，由总

书记邓小平主持，为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中受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短短四个月，几年来被错批判、错处理的人，绝大多数获得平反，尚未得到平反的人，也敢于提出申诉。这引起毛泽东的不快。彭德怀的长信，更被毛泽东视为非常，他不时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啊！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啊！

彭德怀的要求被接受了，中央成立了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然而审查没有“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而是更甚的罗织、更肆意的歪曲和更寒心的算账。

又是三年，彭德怀再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沉默似乎更好，再巨大的浪花也只能在心中的海里翻腾。

“这下好了，我终于被推上了另一极端，可我个人总还有一点长处吧？那就是不忘本，国家之本、人民之本，如果人忘了这个本，还活在世上做什么？忘了这个本，地位再高，权势再大，对人民何益？与粪土何异？！”

彭德怀没忘国家之本和人民之本，他像普通公民一样生活，生活在人民中间。

他普通得有时让人认不出来。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老教师告诉作者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常去校外散步，有一个傍晚，他碰上三位穿军便衣的人，年老的一位背着手，没戴帽子，样子很严肃，当时没留心，过去后才想到是彭德怀。他说真没想到彭老总的的生活那么像一般人，完全不同自己想象中的高级领导人——此时彭德怀虽被罢官，但没有向全国公开原因。

他过着人们意想不到的朴素生活。据他的警卫参谋回忆：他吃饭不用小灶而吃小食堂，打来的饭菜如吃不完，决不允许倒掉，下顿再热来给他吃；他的衣服特别是内衣好多是打了补丁的，有些衣服、袜子实在不能再补了，警卫员也不敢扔掉，说不定什么时候彭德怀还会追查要穿。有一次，警卫员没经彭德怀的同意就把他穿了十几年一双烂皮鞋扔了，搞得他念叨了好久，说“那双皮鞋很可惜，我穿着最合脚的，不该扔……”由于他夫人浦安修在北师大做领导工作，只有星期日才回来，彭德怀就常常自己拆洗缝补衣服。他戴着老花镜，在廊檐下一针一线地缝着穿了很久的衣服。那情景，真真正正是一个老革命家的形象。

彭德怀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从不利用职务占国家便宜。本来，他是可以配备医护人员的，但他以自己没为国家工作而主动拒绝。有一次他感冒了，发高烧，浦安修劝他去医院要点药，彭德怀连连摆手说：这点小病，吃什么药，一咬牙就挺过去了。在我们家乡，感冒以后就劳动，出一身汗就好了。好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度。

彭德怀还把自己的朴素与严格标准扩展到自己的亲属身上。他的大侄子彭启超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时，学院授予他上尉军衔并请示彭德怀，彭德怀就把侄子划进中尉军衔的名单中，理由是在级别待遇面前手要短。他还对自己一个多次向他诉苦要钱的亲戚回信说：从历次信中看出，你思想落后，不愿努力生产，自力更生，不想办法去克服困难……这种落后情绪，希望你加以反省克服。他没有给亲戚寄钱。

他从不愿突出自己。1954年9月，彭德怀被任命为共和国首任国防部长。在国庆阅兵仪式上，中央安排彭德怀以国防部长的名义发布向全军的命令。为保存资料，新华社要求彭德怀录音，他说：“我的声音不好听，也没有保存价值，不录。”经过多次解释他才同意，但要求过后一定要销毁录音，真

是个倔老头。

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的流走了，彭德怀在吴家花园住了好多年，尽管外面风吹云变，这里却总是平静，除了朱德、彭真、杨尚昆、杨献珍等人外，没人来看过他，彭德怀几乎每天都过一样的日子。

然而这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忘记了他。

素有党内理论权威之称的康生就屡屡窥视政治风向，不止一次地建议拿彭德怀开刀。1964年，他对毛泽东说：“主席在十中全会上讲过，现在风行写小说，利用写小说反党，是他们的一大发明。由此，我想到当时的一出戏，叫《海瑞罢官》，我考虑了近两年，觉得这个《海瑞罢官》跟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替彭德怀翻案，我这个想法，提供主席参考。”

江青也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

1965年初，经毛泽东默许，批判《海瑞罢官》的写作班子在上海投入秘密工作，批判理由就是它替彭德怀翻案，此项任务的负责者是江青、张春桥、柯庆施、姚文元。

尽管如此，毛泽东采取的行动还是出乎康生的意料，他让彭德怀去西南大三线工作。1965年3月，美国出兵越南，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

1965年9月，彭真代表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和彭德怀谈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彭德怀到西南领导大三线建设，任副总指挥。彭德怀没有答应。他的理由是自己这个样子不好出来工作，“三反分子的帽子还压在头上，又被批得很臭！”话说对了说错了都受怀疑，而且自己水平低，不懂工业，又早和军队脱离关系，自己也不想搞和军队有关系的军事工业。最后，他还是要求毛泽东同意他回乡当一辈子农民，并请彭真向毛泽东转达，同时自己也写了封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又收到中央机要局转来的彭德怀的信，决定亲自找彭谈谈。9月23日早7时半，毛泽东秘书给彭德怀挂电话让彭德怀前往中南海见他。8时15分，彭德怀乘车到达中南海。

颐年堂外，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双手再次紧紧握住，毛泽东看着彭德怀黑瘦的面容和斑白的两鬓，说：几年不见，你显老了。彭德怀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咯！然后他们走进屋内，长谈了五个多小时。

“你这个人真有个犟脾气，平时总不来，好长时间也不写信，写信不写则已，要写就写八万字，你累我也累，彼此都不满意。何苦？今天我们一起谈谈吧，吵架可以，骂娘也可以，你有话可以说，你还是政治委员嘛，还是我们的同志嘛。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一会都来。周总理要见西哈努克，可能来不了。”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还是合适的，李井泉为主，你为副，还有程子华，将来还可以带一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名誉！我不在乎。”彭德怀神情依旧，紧锁着眉头：“我还是不去好，背着这个臭身子，到了那里，接触群众不方便，人家接触我也不方便，再说我一直坚持做到自己说过的三条保证。”

“哪三条？”毛泽东边抽烟边问。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后面两条我还记得，老彭，会议已过去了，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作结论吧，等几年再说吧，不过去西南工作还是去吧，你去那里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你为副，还有程子华。

“我们革命到今天不容易，大家要团结，要齐心协力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我们共事几十年了，合作得很好，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对你的事批评过了，错了，真理可能在你手里，不过，你也不要记账，日久见人心。我们再一起往前走吧，我过去反对你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你也是诚心诚意的。对你老彭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怎么样，老彭，你还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个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让他来找我谈。

“最后，我送你几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作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去打仗，争取恢复名誉。”

彭德怀再次为毛泽东所打动：主席，我听你的，去西南。

中午，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都来了。颐年堂里，众人相聚，酒自然上桌，彭德怀喝了几大杯，满脸红光，他的所有委屈在同志间融洽的交谈和毛泽东的坦诚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宴毕，毛、刘、朱、陈、邓等中央领导送彭德怀出丰泽园，与他握手道别。

彭德怀兴奋地回到吴家花园，等候南下通知，他决没料到，仅仅过了48天，上海《文汇报》就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一看就知道是冲彭德怀来的。此时，他仍没得到南下的通知，经多次催促才得以成行。11月28日，彭德怀一行乘33次快车起程。30日到成都，然而就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文汇报》刊登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2月4日，彭德怀看到了这张报纸，气得他一拳擂在桌子上：他娘的，刚让我出来工作，就批判起我来了，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娘的，批吧，我才不怕呢！我早知道我的事没完，无非再一次搞臭嘛，我等着。实际上哪一个人真会批臭，只要自己不腐烂就好，只要毛主席不下令撤我，我就干到底，谁也压不垮我！”

彭德怀依旧是彭德怀，他抛却个人的利益，全身心地投入到建设大三线的工作中。“不要管它，我们干我们的，明天继续听各局的汇报，过两天我们就出发去工地。”建委工作汇报一完，彭德怀就到各地视察检查工作去了，直到第二年七月“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他奉命返回成都止，他几乎全部在建设工地上转。他走遍了从四川西部的金沙江到贵阳之间的广大地区，看过这个地区每一个重要的工厂、矿山、水电站，他口问笔录，从单位的原料、燃料、产品、运输等情况一直问到职工的思想、工资、住房、家属安置、子女上学等各方面的情况。

此时，大三线处在初创阶段，到处是一片竹席工棚或干打垒的土房。彭德怀总是去这些地方去问、去看、去听意见。也给大家讲西南大三线建设的战略意义和灿烂前景，鼓励大家把三线建设搞好。他每到一地，都是和工人们住一样的房，吃一样的饭；哪儿最艰苦，他就到哪儿去亲身体验一下：正在打炮眼的高崖上他去过，随时可能塌顶的深洞工程他去过，头上一股股大



水流着、脚下是深泥潭的隧道工地他也去过。每当他被人们认出来，就引起工地一片欢腾。一位铁道兵的干部就挥臂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的彭老总历来是走到哪便把胜利带到哪！这回，我们大三线的会战一定胜利，大西南一定会很快成为祖国强大的战略后方。这话颇动人心，连彭德怀都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

他的警卫参谋劝他注意身体，年纪毕竟大了。彭德怀回答很轻松，农村里，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还在犁田哩。参谋也不好再说什么。

但此时的中国毕竟不是搞建设的年代，政治风越刮越强，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和“四家店”等，都联系到了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的问题。彭德怀纵然可以骂他们是“奴才！挑拨是非的奴才！陷害忠良的奴才！”来解恨，却也清楚自己的工作将难以继续下去了，为了争取时间，他跑得更急、干得更多了。他还有一点“个人心愿”，在北京时他就说过“到西南，一定要去看看那些老地方，看看长征路，看看旧战场。”他到了会理和凉山彝族地区，到了安顺场，到了贵州的万山丛中和遵义城。在安顺场，彭德怀找到了一位当年为红军摇船渡河的老船工，倾心交谈。临别时，他给了老船工一点钱并再次握紧老船工的手，以当年红军的代表深表谢意。没想到此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个人揭发成“彭德怀在四川收买人心”的案子，把彭德怀气得勃然大怒：“混账话！收买人心！我们给了人家什么？给什么能把人家收买了？当年人家把我们多少人送过河去？人家是拚着一条命给红军干的。我们给什么也酬谢不了人家呵……！”

但是，彭德怀的行为被归纳成十条罪状上报，他不仅不能看中央文件，还遭受围攻批判，但他坚持不检讨，也不服气：“叫我认罪，叫我低头，无论如何办不到！我总算建委一名成员吧。为什么中央文件不发给我？我要告你们，我要给李井泉（建委书记）写信，给李大章（四川省委书记）写信，我要向毛主席告状。”

彭德怀仍寄希望于毛主席，但他不知道在他的身后，正在酝酿着一场席卷中国的、以批判吴晗为罢官海瑞——彭德怀翻案为发端的政治风暴——“文化大革命”。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谈话时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德怀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1966年5月下旬，他奉命返回成都，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即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每天除看看书和下下棋外无所事事。后来，棋也下不了，书也读不下去，心事重重，从北京蔓延到四川的红卫兵们也不断地到彭德怀的住所质问他，批判他，要他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和邓小平、贺龙等人的“罪行”。本来，彭德怀还很高兴，认为毛泽东主席发动群众进行大辩论伟大，可以实现自己分清是非的祈愿，现在却是这个样子，彭德怀那瞬间出现的兴高采烈又被苦苦的冥思所代替。

在北京，受江青、康生指使的戚本禹正动员革命小将来四川揪斗彭德怀。他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封献策信，说：“我们觉得，分配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三线建委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因此，我们再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

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过渡是不行的……”

对此，中央文革表示同意，并不断在毛泽东的耳边吹风说，不能让现代化海瑞在西南过神仙日子。结果可想而知。

有了尚方宝剑，戚本禹便亲自给名噪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韩爱晶打电话，告诉他现在“文化大革命”深入，可以派人去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江青也有意将军，她对地质学院红卫兵的头头王大宾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呢？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精神，将来好回来造反！”

1966年12月25日凌晨，住在成都市永兴巷七号的彭德怀被翻墙而入的北京红卫兵强行绑架，他的警卫员和秘书同奉中央首长特别命令来川揪彭的红卫兵进行了激烈交涉，最后经西南建委办公室负责人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恩来知道这是江青策划的，非常气愤，但又阻止不了便答复如下：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就是这三条，就是这三条里出现的“同志”字样，使彭德怀激动地抽搐，热泪不止。

就在他们交涉时，彭德怀被关在成都地质学院的一个大教室里。他没戴帽子，脚穿着他弟媳做的已经穿洞的棉鞋，双手操在磨得发亮的棉衣袖筒里——这棉衣是他在抗美援朝期间一次回国时为外出方便买来穿上打掩护的，质料一般，外头也没罩衫，他穿了十多年。低头坐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冻得全身簌簌发颤。

警卫员赶到地质学院，把自己的大衣给彭德怀披上，却被他一把甩开：我不要！冻死、饿死、打死、杀死、都一样！我不会喊叫一声！你回去，我随他们的便，怎么办我都不怕！

彭德怀被转移到省地质局。

当时，从北京来了两支“专揪彭德怀战斗团”，如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派的“专揪彭德怀战斗团”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派的“赴川揪彭敢死队”等，他们都争相控制彭德怀，以回京邀功。

12月28日，彭德怀坐上成都军区联系的一个软席车厢，在与红卫兵的共同押送下到达北京。

到北京后，彭德怀先被送到北京地质学院，经过艰苦的谈判和工作，才交给北京卫戍区，由卫戍区和北航、地院派出的4名红卫兵共同看押管理。

次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指示他必须做到保证彭德怀的绝对安全，要对住处保密，不许武斗，不许游行，不允许搞逼

供信。

到了北京，彭德怀自然想起了毛泽东主席，他在元旦给毛泽东写信（这是彭德怀最后一次给毛泽东写信），希望毛泽东能知道自己的处境：

“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实为25日晨）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实为25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实为28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彭德怀，1967年1月1日。”

由于周恩来的指示和傅崇碧的安排，彭德怀在卫戍区里的待遇一开始还不错，但在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和批判“二月逆流”后，彭德怀的处境就开始变了。中央文革小组独揽大权，取代一切，江青也更加骄狂，她要显示她手中的权力，看看她的话有多大分量。关注点选到了彭德怀。在人民大会堂，江青接见了韩爱晶等红卫兵头头，下达了批判彭德怀的动员令：“彭德怀这个人被卫戍区保起来了，把他养得胖胖的，想干什么？为什么不批斗？老不批斗干什么？你们去找傅崇碧要人，就说是我说的！让彭德怀到小将中接受批判教育。要把他批倒批臭呵！”

戚本禹也在一旁打气：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就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戚本禹还对彭德怀专案组训话说：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戚本禹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谁给他的权利？

实际上，彭德怀决没得到舒心的休养，而是被监禁着写交代材料。“揪来北京，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我工作上的缺点不少，革命方法上也犯过个别错误，但我自问无愧，在任何风险危急的关头上我没有动摇过，我诚不知要我交代什么罪行……”他难以忍受看守关押，屡屡高喊“快放我出去，我要憋死了！”彭德怀终于被放了出来，但不是给他自由，而是遭受批判。

1967年7月19日，彭德怀被送到北京航空学院六系楼里一间大教室接受批判，面对60多个红卫兵骨干、年轻闯将们提出的“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你为什么要打百团大战？老实交代在朝鲜害死毛岸英的罪行！”等等质问，彭德怀不卑不亢，据理力争：“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贡献巨大，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比我有学问多了。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还不知要吃多少亏。但是我不同意喊那么多万岁、不同意喊那么多红太阳、大救星，这不好？毛主席也不赞成！你们说我这是反毛主席，我不同意，你们没有事实呵，我希望你们不要毫无根据地妄加罪名，给自己人胡乱定罪，那会使我们党毁灭呵，那会导致天下大乱呵！”

彭德怀安详的态度激怒了“革命小将”，韩爱晶走向前去一把把彭德怀从座位上拉起来，接着就是一拳，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其他人也蜂拥而上，桌倒椅翻。彭德怀被打倒后又被揪起来，接着又被打倒，连着多次，还摁着他的头往墙上撞，彭德怀头破血流，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闷哼一声昏晕过去。批斗会结束后，教室门口堵着一堆人，彭德怀走出时，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他们一边打，一边还喊着毛主席语录。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革命的犯罪。最后彭德怀

被抬上汽车送回卫戍区。

对这场情景，当时的原始记录这样记载：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五条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是最新指示，他们只听中央文革的。”

北京卫戍区监护日记的记载如下：

“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欲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屋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他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很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我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折断，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北航批斗会之后，彭德怀问题公开化了，《人民日报》选登的《解放军报》批判文章公开点了彭德怀的名。7月26日下午，北航红卫兵和地院红卫兵又联合在北航操场举行约10万人的批彭大会，张闻天等人也被拉来陪斗。会前，周恩来嘱咐卫戍区解放军战士保护彭德怀，一不能打人，二不能弯腰，三不能污辱，但不为红卫兵所理睬。

那时的批斗会是任何人都能够想象得到的场面：年轻的批判者们给彭德怀和张闻天等人脖子上挂一个又大又重的牌子；牌子上用黑体字写的名字全部被划上“×”，他们低头弯腰，任凭红卫兵捏造罪名，而且不能申辩。临结束批斗时，又强制彭德怀和批斗者们从人群中两人相对平举双手筑成的狭巷中低头穿过，经受显示人们义愤的各种方式的折磨。很多人朝彭德怀、张闻天打着巴掌，他们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和唾液，长时间的劳累使他们走不到一半就瘫倒了，嘴里渴求地喊着喝水……其景何惨！韩爱晶还仗人多从卫戍区警卫战士手里抢走彭德怀，拉胳膊拖腿地拥上卡车开到城里游斗，彭德怀的身上又多了烂纸片和西红柿汁，两个多小时之后，可怜的老元帅已不能走路、不能进食，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对这些近七十岁老人的折磨，是“文化大革命”中迫害狂潮中的一斑，此时，是很难见到人道主义的。

然而对彭德怀来说，这仅仅是个开始。建军节刚过，彭德怀又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尔后又送到工人体育馆受“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的批斗，批斗彭德怀似乎成了时髦，各个单位你争我抢，以至二个月不到，彭德怀就被批斗了100多场，然而他不屈不让的头颅虽一次次被按下去，又一次次昂起来，倔强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又一次次站起来，愤怒的呐喊一次次被截断，又一次次响起来。最后，已是风烛之年的彭德怀身体和精神几乎全垮了。

他所在的监护所也频频更换，以防止彭德怀和警卫战士建立感情。先有五棵松，后转到罗道庄，接着是什坊院、木樨地政法干校，最后被送到301解放军总医院，因为彭德怀已被诊断为直肠癌。

在这期间，他被审讯200余次。

与此同时，1970年7月2日，彭德怀问题专案组向黄永胜起草了《关于

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言：“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生剥夺公民权利。”

黄永胜大笔一挥，签上“同意”二字，与建议判处王光美死刑的报告一起上报。但毛泽东阅后指示：“暂时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犯人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后，专案组的人还不死心，于9月17日再次上报对彭德怀“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意见。11月2日，专案组第三次呈报同样的意见。彭德怀的命运就这样定下了。

一个在最危险的时刻加入共产党、抛弃高官厚禄参加革命且忠心耿耿的人，竟然在革命成功后失去了做党员的权利！一个为缔造新中国血雨腥风几十年，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帅，竟然在新中国里永远失去了做公民的权利！

1972年新年刚过，彭德怀就觉着肚子不舒服，他不知道，致命的癌细胞已开始侵蚀他的生命。

由于周恩来曾专门指示案犯若有病要住院治疗的，彭德怀专案组把彭德怀送到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4月18日晚，彭德怀正式“住院”。

在301医院的日子也不好过，按彭德怀自己的话说，是比生孩子的月子还难受。他所在的病房不足10平方米，所有门窗都紧闭着，而且全部被糊上了报纸，一点自然光线都见不到，为限制他的活动，裤带也被人抽走了。想写字，不给笔，想听广播，收音机又被人故意弄坏了。除了少数书籍和按规定看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外，只有冷清、空旷、死寂。而且，门口还不时晃动着守卫人员的身影。

彭德怀常常仰天长叹，却又无可奈何。

1973年4月22日，为了保住他的生命，医院提出彭德怀必须做手术，但遭到他的坚决拒绝：问题不搞清楚，我决不做手术，我要见毛主席。他的侄女彭梅魁遵照要求来劝说时，彭德怀谈了自己的顾虑：“我从来没有怕过死，只怕一上手术台可能下不来，耽误了大事！我要求他们快审查，查清楚了，我再做手术。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没查清楚，难道让我带着莫须有的罪名去见马克思？我留着这条命，就是想再见毛主席一面，把我的看法讲清楚，也算尽到了我最后的一份责任，死了我也心甘！”“背了一身黑锅，莫须有的罪名，死了也不甘心。”

彭梅魁无言来安慰她伯伯那颗已被伤透了的心，她只好搬出周恩来总理来增加话的分量，“您还是先做手术吧，等养好病，会有机会再见毛主席的。您的手术是周总理批准的，您不做手术，总理晓得也会不高兴的。”

彭德怀一向佩服敬重周恩来总理，他同意做手术。26日7时15分，手术开始，301医院外科主任陆维善大夫主刀，13时40分手术完毕。

但是，手术之后，彭德怀的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扩散到了肩部、肺部、脑部。他疼得咬着被单时或大叫大骂，没有瘫痪的右手右脚乱撕乱扯乱揣，却没有人给他打止痛针。

1974年6月后，彭德怀便常常处于昏迷状态。

此时，他的话已变得含糊不清，但依然掷地有声：“我这一生有许多缺

点，爱骂人，骂错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对革命同志没有搞过两手，我从来没有搞过那种阴谋，这方面，我可以挺起胸膛，大喊百声，我问心无愧。

“我能活到今天，就是长寿了，已经可以了，我仔细地想过了，我这一生是值得的，对革命，对人民，我做了一点工作，尽了我的责任。虽然我个人的下场不怎么好，可是我不埋怨，更不后悔。

“我死以后，你们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去埋起来，在上面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历史是最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历史将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

9月16日以后，彭德怀失去了痛觉，进入了昏迷状态。但他还是顽强地与死神抗争了两个多月。

1974年11月29日，14时左右，彭德怀的脸上突然出现一阵红晕，随之鼻口出血，很快，76岁的彭德怀停止了呼吸，身旁没有亲人，没有同志，他带着全部的希望与失望，孤苦伶仃地到了另一个世界。

窗外北风呼号，大地犹如呜咽。

彭德怀逝世后，专案组给中央写了报告，说：“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批示：照报告所提办法办。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由301医院送北京火葬场火化，申请表上写着：“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女，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00一二六九0。”火化后，专案组的人带着骨灰盒和介绍信抵达成都，向四川省委、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的三位主要负责人段君毅、李大章、刘兴元说明了骨灰的由来，要他们绝对保密，骨灰盒放在一般公墓即可。同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地方，以免查找时弄错。已经身患癌症的周恩来考虑得多细致周到！

令人凄然的是，火化遗体的费用，是从彭德怀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支付的。

1944年，毛泽东为追悼张思德写的《为人民服务》中说过：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但彭德怀却没得到这些最普通的待遇：没有追悼会，没有灵堂，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哀乐，更没有吊唁的人群……

两年后，毛泽东与世长辞，举国上下，一片悲哀。

他们都走了，走过了生命的历程，给我们留下的是辉煌的业绩、刻骨的怀念、沉重的历史。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

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给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探索更长时间……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上面这些话，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评价。

当然，这个权威性的决议也谈到了彭德怀。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实际上，在此前三年的彭德怀追悼会上，邓小平副主席已经肯定了彭德怀是一位为党为人民利益献出了一切的真正共产党人：

“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曾担任过党政军的许多重要职务。他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彭德怀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彭德怀同志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军长、三军团总指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长征后期担任过以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委员的陕甘支队司令员；到达陕北以后，担任过红军前敌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65年，担任建设大三线的副总指挥。他曾任党的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他还当选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

“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彭德怀同志永垂不朽！”

这才是最后的结局，尽管他们两人争吵过，碰撞过，但毕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他们生前是合作者，同吃一锅饭，死后也是合作者，共处一墓室。本来，他们的遗骨应共同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但因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而改变了结局。

